

【理论探讨】

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张萌萌 梁爱强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新质生产力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但赋能中面临精神文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及供需不匹配等难题,数字鸿沟、收入差异导致资源获取与消费不均,还引发职业焦虑等个体精神困扰等挑战。基于此,需以科技驱动创新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模式与质量;通过精准化、动态化、共享化供给优化精神产品分配;加强全民数字素养培育,助力不同群体适应数字时代,最终为实现大众精神生活富足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支撑。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124;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03-0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足,更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前,我国物质生活水平显著跃升,而精神文明领域的发展仍需持续深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发展,将成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引擎,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一、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生活迈向富裕的基石,而物质层面达到一定水平,又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生产力范畴是一个复杂的概

念,想要透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要从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视角下展开探究。

(一)马克思劳动“三要素”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表述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是传统生产力的“三要素”。在新的历史阶段,新质生产力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实现生产力“质”的提升。

首先,劳动者素质迈向新型发展范式。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从传统的单一专业知识向跨学科、综合性知识体系转变;在技术水平方面从单一且依赖重复性动作的技能向高技能、创新性技能提升,更加注重培养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与道德素质。这种转变推动了人才结构优化,要求劳动

收稿日期:2025-03-03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ZSZ03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萌萌(2000—),女,河南漯河人,河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梁爱强(1967—),男,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者拥有持续学习能力,自觉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其次,劳动资料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传统机械设备转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智能化设备,依托云计算、物联网发展数字化经济,既扩大优质精神产品普惠性,满足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又减少重复性劳动,助力工作生活平衡,提升幸福感。

最后,劳动对象步入多元拓展新阶段。在政治经济学里,劳动对象是劳动中被采掘和加工的事物,作为生产的基础条件,其不同会影响劳动产出的规模与产品品质。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数据、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新的劳动对象,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创造物质财富与就业机会,还推动文化产业繁荣,为精神生活富足提供物质基础并满足多元化精神需求。

(二)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

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性与包容性为特征、以渐进协同为路径的复合型发展目标。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保障、文化传承、技术创新等手段,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质的提升”与“量的均衡”。

第一,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目前,我国物质发展与精神进步不匹配,物质超前与精神滞后的结构性矛盾亟待改变。因此,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要加大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投入,打破“先物质后精神”的线性发展观,协同推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富裕”。

第二,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导向,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凝聚社会共识,提升精神境界,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文化认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能够让人们对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思想基础。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共同富裕的

主体的必然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锚定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尊重其多样化需求并关注精神生活幸福感,提升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现

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变革为核心驱动力,正深刻重塑精神生活供给与体验方式。它不仅拓宽了优质文化资源的覆盖边界,让多元化精神产品更普遍惠及大众,还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激发个体精神创造活力,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关键动能。

(一)数字赋能:强化个体精神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个体是精神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体现在个体身上。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新质生产力凭借新技术、新模式革新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模式,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海量且多样的精神文化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养分,丰富个人精神世界,满足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借助新质生产力提供的便捷学习平台与海量学习资源,人们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文化素养与专业知识,助力人们迈向更高层级的精神追求。

(二)传承与创新:为社会文化繁荣注入双引擎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前提在于文化传承,而推动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是文化创新。文化繁荣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的协同发力,二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有传承而无创新,文化便会沦为时代的桎梏,在历史浪潮中渐失活力;有创新而无传承,会使文化失去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内在精神支撑,降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导致民族凝聚力下降。因此,新质生产力确保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文化创作带来了全新的技术与理念,激发了文化创新活力,推动文化产业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还打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拓宽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强化其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升了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助力社会文化繁荣发展。

(三)构建数字普惠生态,助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数字普惠生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使偏远地区的群众和弱势群体能够缩小因地域、经济等因素导致的精神文化生活差距，更便捷地获取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其均衡分配。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凭借创新技术与多元化业态，搭建起覆盖广泛的文化创作与传播平台，赋予每个人平等参与文化创作、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有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使不同阶层、群体都能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受益，有力推动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更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物质财富空前积累，人民精神生活持续改善。然而，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精神产品质量与供需双失衡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新质生产力大幅革新了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与传播模式，但也带来诸多难题。一方面，从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来看，新质生产力催生海量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质量问题愈发凸显，部分创作者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内容打磨，导致作品缺乏深度与价值性；难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精神需求。另一方面，精神产品供需适配度不足。大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然而大量迎合低俗趣味的内容充斥市场，反映时代精神、符合大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质量精神产品却一作难求；部分精神产品创作者缺乏对受众群体需求的精准洞察，导致产品与消费者的期待存在较大落差。

（二）精神生活存在分化风险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让全体人民都能共享精神文化发展成果，但当下不同地区、城乡及群体之间在精神生活的追求取向与质量水准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与落差。其一，数字鸿沟导致精神产品获取不均；不同地区、群体在数字技术的

接入与使用能力上存在差距。受东部优先发展及城乡二元化策略影响，精神文化资源布局不均衡，西部地区因网络设施差、部分群体数字技能缺乏，在获取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精神产品与服务方面处于劣势。其二，收入差距影响精神消费：新质生产力依赖先进技术与创新能力，这可能会导致低技能者、传统产业从业人员与欠发达地区群体的收入降低或停滞，低收入群体可能会因经济压力，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支出，而高收入群体有更多资源用于精神消费，精神生活贫富差距明显。

（三）引发精神困境与压力

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给个体精神生活带来多重困扰。其一，易引发职业焦虑问题。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竞争加剧且对劳动者的要求提高，劳动者为维持就业竞争力需持续提升新技能、延长工作时长、增加工作强度，易产生精神疲惫和焦虑，引发精神困境。其二，加剧信息爆炸带来的精神压力。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迭代升级，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爆炸时代。社交媒体等平台信息海量且更新快，人们难以筛选有价值的内容，还因怕错过重要信息而花大量时间浏览，长期易产生焦虑、烦躁等情绪，分散注意力并降低思考深度和专注力，不利于精神生活品质提升。其三，存在隐私信息泄露风险。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个人信息在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易被收集和利用，若部分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隐私信息易出现泄露，进而引发用户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严重时会影响日常生活，给用户带来精神困扰和安全隐患。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推动力。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以创新为基点，提升精神产品质量与供给效率、增强公众数字素养和技能，多维度、多层次地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加大创新力度，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精神资源领域的核心问题已经从数量多寡转向质量优劣，大众对高品质、个性化且富有内涵的精神滋养诉求渐成主流。应依托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优化精神产品生产

结构、提升质量,打破同质化僵局,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方面,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的转化与开发,催生出数字影视、数字音乐、数字游戏等新型文化业态,同时创新文化体验形式,如构建沉浸式文化展览空间、举办互动式文化演出等,丰富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加大内容创新力度以提升精神产品质量。依托新质生产力发展精神文化时,不能只注重技术而忽视内容,要把内容深耕摆在文化创作的首位;坚持人民立场,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打造更多优质作品;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化生产各环节,把控思想方向,深度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思想内涵与价值引领力。

(二)推进精神资源有效供给,促进精神文化资源均衡共享

保障精神资源供给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优化精神资源供给,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精神产品分配不均、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产业和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也为精神文化资源的均衡共享带来了全新契机。

一是强化精神资源精准供给。精神资源精准供给不仅为精神资源突破传播局限、实现深层次拓展筑牢根基,更是引领全体人民迈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通过数字技术搭建精神文化需求分析平台,整合多渠道数据以精准匹配不同群体需求;同时建立数字资源靶向扶持机制,通过设备补贴和技能培训等方式增强老年、低学历等群体的数字资源获取及操作能力。二是促进精神资源动态供给。精神需求的发展具有自身规律,个体多元

社会联系不断滋养着精神世界,使其保持着持续开放的生成态势。随着民众对精神文化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客观上倒逼精神资源供给进行适应性改革。因此,需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精准把握群众思想动态与需求,持续优化供给内容,实现供给模式动态化。三是优化精神资源共享供给。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地域与载体限制,推动优质文化内容、公共文化服务、精神体验产品的标准化与普惠化,同时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精神需求,构建“按需匹配、高效流转”的共享体系,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

(三)提升个体数字素养与能力,增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力

为应对复杂的数字风险,要加强数字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变革的新兴力量,全方位赋能个体数字素养与能力进阶,夯实民众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征程中的主体力量。

一是着力提高个体对数字信息的敏感度以及分析判断能力。通过加强对公众的数字技术教育和培训,提高其数字素养和信息识别能力,助其摆脱被数字工具“类”化和“符号化”的困境,降低陷入“信息茧房”的危险,避免因过度依赖数字工具而导致的“数字异化”。二是激发老年群体参与数字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发挥“数字反哺”功效,化解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感知难题,以家庭代际互动讲解数字产品功能;同时在老年大学增设趣味与实用性兼具的数字技能培训,消除老年人对数字产品的排斥心理。三是依托场景实践提升全民数字应用技能。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多维度拓展新型数字生活场景,围绕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智慧出行等领域优化服务,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数字技术投入,拓宽公共服务和便民场景的覆盖范围。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01).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 [4]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2021(20):4-8.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7-48.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理论探讨】

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马 仟 范映渊

(宁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全过程,开辟了一条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发展同质、同向、同步的特色之路,构成了二者在本质属性、显著特征、内生动力等方面理论、历史与实践的多重逻辑关联。具体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特色人本理念等廓清了中国式共同富裕的本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先富带后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共同富裕新“三步走”路线图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而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纲要,指明了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07-05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是对资本主义逻辑下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新超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中

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多重关联,深刻领会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理论逻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效规避了贫富差距巨大和阶级分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理论一致性,是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特

收稿日期:2025-03-12

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夏新画卷研究”(项目编号:23NXZX03)阶段性研究成果;宁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宁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自信’示范研究”(项目编号:CXXM2025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马 仟(2000—),男,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范映渊(1975—),男,宁夏银川人,宁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色人本理念的高度统一。

(一) 共同富裕根植于马克思资本批判论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共同富裕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共同富裕思想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之中。一方面,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表现为两极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导致了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不公平性必然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人”的根本利益,从而导致“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所有的人富裕”“所有人共同享受”的构想成为空想,严重妨碍共同富裕的发展。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恰如其分地规避了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带来的种种桎梏,成功走上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构成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二) 共同富裕接续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将共同富裕置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当中加以整体性地展开的,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底蕴。一方面,共同富裕体现了传统文化经典的大同思想。“大同”一词始见于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孔子云:“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构想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压迫、友爱互助、平等和睦、安居乐业的理想世界,勾画出一个近乎“乌托邦”的社会形态,促成了共同富裕观念的萌芽;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小康社会的追求。《诗经·大雅·民劳》提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理念,主张保障民生、富庶于民,强调了安乐舒缓的小康社会对天下民众的非凡意义。与此同时,墨子认为社会上一切祸乱的罪魁祸首都根源于“自爱”,而“自爱”的实际内容是“自利”,所以墨子主张“兼爱天下”,即要解除饥、寒、劳三患,使“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以此解决人民的衣食不足问题,展现出共同富裕追求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的强烈人文关怀。不可置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共同富裕思想根基的建立,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公本位”的特性,是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和魂。

(三) 共同富裕立足于中国特色人本理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稳固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实现所代表群体的利益。按照中国执政党价值论的逻辑,只有“人”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存在。人民群众既是党的力量之源,也是党的智慧之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光辉实践,始终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丰富的力量源泉。共同富裕的实质是解决某些阶层和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不断把占有最低财富和收入的人群提高到相对较高的程度。实际上,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本身就决定了我国共同富裕既不可能是平均主义,也不可能是同步富裕,而是同方向走向富裕,其发展速度有快慢,发展程度略有差别。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始终牢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饱含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开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局面。

二、历史逻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七十余年的整体发展历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二者实现了历史逻辑的同向性。

(一) 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式现代化所有制体系的构建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无可辩驳,资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创造

了巨大生产力,但资本生产的两极分化无法消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主体、按资分配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差别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土地的公有化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化,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彰显了公有制对共同富裕的强大推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强调基本经济制度,既是政治需要,又是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需要。要坚定不移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结合市场经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总体上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二)先富带后富: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构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的实际特点,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给共同富裕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规定了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占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二者共同决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属性,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显然不同于“同步富裕”,它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其目标在于“富裕”,但富裕的“次序”是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下,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方式不能弱化,更不能偏离,要统筹效率与公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生产力基础。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构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不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精神贫困的现代化,而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遵循,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扩张,导致人被工具化,丧失了其作为人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破除资本逻辑,以民本逻辑为发展指向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和要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热切期盼,创造性地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发展的价值旨归问题。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过程。其目标在于,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后达成超过全面小康基准的充足和富裕,实现一种初级或者初中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定量角度来看,就是全国范围内收入和财富的基尼系数或者是家庭净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降低,进一步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享发展。归根结底,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充分彰显着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是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遵循。

三、实践逻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并行不悖、协调统一,明确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了实践逻辑的同步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富裕新“三步走”路线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起来”的伟大征程。

(一)202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普惠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用刚性体制机制进一步谋划共同富裕,提升“十四五”规划民生建设成效,体现了党和国家以民生福祉为出发点考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保障。一方面,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步伐。农村地区固有的经济人口结构和发展环境决定了其共同富裕之路的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强化乡村发展动能，既要关注重点人群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更要在产业振兴上下苦功夫，强化连带发展，优化乡村经济发展整体结构；另一方面，持续巩固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方式。共同富裕贵在“共享”，重在“共享”。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东中西部统筹发展，着力打造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区域发展、群体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基本战略保障，有力打破了发展过程中“非此即彼”的定性格局，逐步形成了普惠性与差异性相互统一的共生态势，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经济保障。

(二)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立足阶段性成效，紧扣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主线，彰显党和国家以共享发展引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考量。一方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更为明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小康是经济内生增长性、社会全面进步性、成果共享共建性的综合展现，但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所以，“更为明显”强调牢牢把握实现富裕程度内在质的跨越，综合考虑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强烈愿望与需求，让富裕成效更加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实质性进展”。“实质性进展”所针对的是目前共同富裕发展阶段性承

压、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更加强调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质的飞跃。在现代化发展实践中，既要把握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量化指标的提升，又要兼顾好对人民高质量文化供给、高品质道德建设的需求，推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取得显著成效。共同富裕的基本战略引领，有力打破了发展总体“萎靡不振”的状态，逐步形成了全面性与重点性相互协调的良好态势，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民生保障。

(三)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基本实现”意味着现阶段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有效缓解，体现了党和国家以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考量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擘画。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然过程，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的量的规定性。高质量发展是全民、全域的全方位发展，要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均衡充分发展，以新发展理念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打造量的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发展的质的规定性。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的发展，人民性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特性。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着力推进取“势”、抓“实”，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作为、有突破、有成效，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大成果。共同富裕的战略擘画，内在规定了共同富裕整体发展走势，逐步营造了稳定性与发展性相互统一的新格局，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机制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2、146.
- [2]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8.
- [3]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9).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7.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265.

The Internal Logic of Solidl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 Qian, Fan Yingyua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reation of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has opened up a distinctive path where common prosperity and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re of the same nature, direc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It constitutes multiple logical connections in terms of essenc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between the two. Specifically, Marx's theory of capital critique, the genetic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humanistic concepts have clarifi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style common prosperity;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leading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through the more developed one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has provide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new "three-step" roadmap for common prosperity moves in tandem with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providing an action outline for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indicat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styl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l logic

(上接第 6 页)

The Key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Empower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Zhang Mengmeng, Liang Aiqiang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23)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jects new impetus in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quality, homogeneity, and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come disparity lead to unequal access and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also trigger individual mental distress such as career anxiety. In light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drive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quality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with technology;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s through precise, dynamic and shared suppl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for all, helping different groups adapt to the digital age, and ultimately provide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abundance of the public'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all-round progress of socie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digital technology

【高职教育教学】

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现实困境和治理策略

饶旭鹏 马婧文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人工智能是赋予机器以人类的智能,同时不断契合时代需求的技术工具,其赋能精准思政的形态经历了从专用人工智能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横向变迁。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在落实资源整合、个性定制、靶向推送、学情刻画等功能的同时,仍然面临思政内容智能供给失当,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以及传统师生交往关系弱化等困境,引发了技术理性与育人价值的冲突与碰撞。因此,坚持人技协同赋能精准思政,搭建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并举的内容供给系统,筑牢思政引领和技术实现并轨的协同育人理念,构建人技互联与人文关怀兼具的主体间性交往,已经成为人技优势互补推动赋能作用优化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人工智能;精准思政;形态进阶;困境;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12-05

随着语言大模型、多模态模型、智能体(含具身智能)等技术的接续创新,专用人工智能发展走向深向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年)》指出:“人工智能正处于迈向通用智能的初始阶段”,“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协同优化,实际应用多场景适应性稳步提升。继法律、金融、医疗、汽车行业和教育等领域之后,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补齐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粗放的短板,助推构建智能化精准思政的发展新样态。但是,迭代更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价值与人工智能技术理性间冲突的复杂性,必须树立人技协同理念,在平衡二者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实现人工智能与精准思政的深度融合,既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

也要正视赋能过程中的风险挑战,真正把精准思政的育人目标落到实处。

一、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形态进阶

精准思政是把精准思维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象、过程、方法和场域精准化的育人活动。从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呈现规模可扩展、多任务适应和能力可塑三大特征,其赋能形态表现为多场景适应性、高认知性及智能涌现性的进阶态势。

(一)初级阶段:专用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

当前赋能精准思政的主流人工智能属于专用、弱人工智能,仅能根据使用者的输入性指令完成特

收稿日期:2025-04-16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兰州理工大学)”(项目编号:21SZJS62010731)。

作者简介:饶旭鹏(1976—),男,甘肃庆阳人,兰州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马婧文(1996—),女,甘肃庆阳人,兰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定领域内的单一场景任务。专用、弱人工智能能够获取互联网现有的原始数据并添加标注,将其整合为有意义、结构化的训练数据,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粗分类。在辅助教育者完成热点识别、知识搜索、框架梳理、学情追踪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育人目标、教学大纲和受教育对象的兴趣偏好,定向推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但是,由于流式数据技术尚不成熟,算法优化不足,且算力资源紧张,专用、弱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存在数据吞吐量低、应用延时长和投入成本高的问题。与此同时,专用、弱人工智能存在缺乏自主意识,依赖标注数据,难以打破预设的训练程式和界限等局限性,其赋能精准思政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还比较低。

(二) 深入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跨模态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根据使用者的输入性指令转化输出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在内的新内容,已经能够完成从归纳到演绎的整体过程。相较专用、弱人工智能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 Transformer、扩散模型等,提升自身序列内远距离元素捕捉能力及样本多样性和生成平滑性,其数据处理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显著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占据海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精准生成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需求、受教育对象身心特点和兴趣偏好的动态内容。通过深度学习优化算法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参数微调,提升受教育对象的分类触达能力和反馈强化质效。凭借潜在注意力机制模拟人类情感认知全过程,推动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阐释与情感关联的匹配更加精准化,深化受教育对象的共情转化和情感认同,构成数据、算法、算力合力作用的精准思政闭环。

(三) 未来展望: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

通用人工智能在理解、学习和执行任务方面的表现已经超越人类智能,但在复杂任务处理方面,二者相较仍有不小的差距。通用人工智能并非取代人类,而是锚定解放人的目标,持续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多领域、多场景应用边界。未来社会和产业势必按照三个世界(物理、心理、人工)之大模型展开,并按照 Pareto 法则组成一个由 80% 以上的数字人、15% 以下的机器人、5% 以下的生物人共同构

成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形成以生物人为主导,数字人、机器人协同辅助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生物人远程指导数字人和机器人协同完成教育教学资源整合、课堂实时信息处理、受教育对象学情刻画、受教育对象自主学习平台搭建等思想政治教育辅助工作。思政教师之生物人得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当中去,专注于“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人师角色。

二、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现实困境

算法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无法脱离场景特殊性实现真正的通用性,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依次完成受教育对象的信息采集、学情画像刻画、兴趣偏好预测、辅助生成方案及个性化和定制化推送等环节。这一过程中,切实存在思政内容智能供给失当,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以及师生传统交往关系弱化等现实困境。

(一) 思政内容智能供给失当

人工智能在实践活动检验和双重否定运动中守正创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感知、识别、供给、施策与评估等环节的精准化发展走深向实。但是,其赋能精准思政的供给环节存在思政内容固化、泛化和非理性等问题,最终导致思政内容智能供给失当。第一,思政内容智能供给固化。思政内容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可公开查询的网络平台,数据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思政内容的多样性开发。模型架构微调对齐人类的兴趣偏好,大语言模型选择统计概率高的词汇或表达模式生成内容并完成推送,思政内容同质化倾向显著。第二,由于缺乏针对受教育个体的差异化分析和集成数据,我国现行的思政内容智能供给仅能精准到“类”,尚未达到精准到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差异显著的“人”的供给水平。第三,思政内容供给非理性。伦敦大学学院开展的对最先进的语言大模型采取心理学测试的研究显示,对于同一问题的反复提问,大语言模型的回答多有不同,大语言模型的答案输出仍然存在非理性现象。与此同时,Transformer 应用的幻觉问题和深度伪造技术的大众化,导致数据造假现象弥散在数字空间,受教育对象极易受到主观化和虚假思政内容的侵蚀。

(二) 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

人工智能融入精准思政的过程,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性与精准思政的育人性相互交融的过程。二者之间技术理性与育人价值的碰撞,表现为技术工具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冲突,致使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第一,技术瑕疵削弱了精准思政效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常常难以精准识别自然语言的微妙差异,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尚未消除输出偏见或虚假信息的弊病,智能辅导系统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动机和效果的实际效能受到使用周期、教育环境和受教育对象年龄等因素的影响,皆深刻影响精准思政的实效性。第二,人技协同作业偏离预设目标。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引发“技术滥用”问题,人技协同顶层设计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思政教师主体地位消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技术素养参差不齐,皆不利于实现人技协同以推动落实精准思政的育人目标。第三,技术逻辑操控下的错误意识形态传播风险。“技术并非价值无涉,而是承载着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志”,难以脱离意识形态属性。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实施过程,呈现出传播扁平化的特征。部分人工智能技术易于遭受资本逻辑和平台机构的不良操纵,从而演变成成为错误意识形态或特定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造成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播风险。

(三) 师生传统交往关系弱化

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到人工智能赋能的精准思政,教育者与受教育对象进行人机交互和虚拟交往的权重占比与日俱增,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态势从单一单向转向多元互动。伴随而生的是教师权威性弱化、学生情感极化和师生情感分化等问题,师生传统交往关系弱化并逐渐隐匿于数字身份和虚拟空间背后。第一,师生间虚拟交往挤压现实交往空间。人工智能技术打破教师教授知识的垄断地位,为学生提供获取知识的新途径,推动师生交往关系由“传统的‘人—人’沟通模式转化为‘人—AI—人’三角交互模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师生双方的交往中介,师生双方的直接交往频次降低,隐匿于数字身份背后的、间接的虚拟交往频次持续增加。第二,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减弱。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存在情感表达障碍等问题,仅能推动受教育对象情感认知和理论阐释匹配更

加精准化,不能替代教师承担言传身教和道德引领的“现实的人”的教育教学活动。但是,随着虚拟交往频次的持续增加,师生情感分化现象日渐严重,二者间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交流被高度数字化的虚拟交往所取代,思政教师以文化人的实际效能弱化。第三,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降低。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越高,对教师的信任度就越低,教师的权威性遭到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精准思政,向学生提供迎合其需求的定制化内容,加重其认知省力和认知极化倾向,有悖于思想政治教育多元视角和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追求。

三、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治理策略

人工智能是试图模拟人类认知过程的复杂系统,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和神经网络架构持续提升推理和决策能力,技术特征显著。其作为人类创造的非人的智能伙伴,打破了人类作为唯一智能体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垄断地位,但这并不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完全能够取代人类。厘清人与技术的安全边界至关重要,如何破除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现实困境,充分发挥人技协同优势以推动精准思政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搭建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并举的内容供给系统

人工智能作为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延伸,历经推理期、知识期两个发展阶段,已经顺利过渡至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神经网络架构等实现“仿生智能”的学习期,尚未产生主体性或拟主体性。因此,绝不能将其基于海量训练数据和算法、算力技术支持而生成内容的机械性工作,等同于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创新活动。即迄今为止,人始终是在创新活动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唯一智能体。

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必须坚持以人为主导,以人工智能为辅助,搭建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并举的思政内容供给系统。坚持守正创新,切实解决思政内容供给不足的问题,要做到一手抓理论创新,一手抓技术突破。支持和引导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能力,汇集已经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形成可持续供给的优质数据资源库。基于深度学习融合模型,深入推进多智能体联合协

作研究,减少作业过程中的数据丢失或减损,实现少样本或零样本迁移。针对人工智能赋能过程中存在的鲁棒性差、可解释性差和数据依赖性强等问题,搭建多模态数据编程一体化框架,突破自动知识发现和自动模型生成性能的瓶颈,完成超大规模、多模态数据集上的可靠性验证。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坚持人的创新主体地位,以技术促发展,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新体系。

(二) 筑牢思政引领和技术实现并轨的协同育人理念

人工智能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既有数据实现精准思政赋能,既有数据由人产生,受人影响,数据训练价值遭受污染,且成为特定群体意志延伸的可能性有所升高。人工智能作为表现和传播特定群体意志的技术工具,受到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人”的操控,本身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其赋能精准思政的实施过程必然受到价值立场的影响,从而偏离预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目标,最终导致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

为攻克人工智能的价值偏向难题,必须树立人技共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从技术解蔽的视角出发,坚持自我革新,站稳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立场,充分发挥教育者的思政引领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层面,首先,布局深耕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前瞻性、关键性及多场景适用性的共性技术研发,攻克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难题,降低算法偏见、算法操纵、算法黑箱等问题的衍生影响。其次,加快推进精准思政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的大模型开发与建设,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语料库,推动实现海量优质数据集自主可控。最后,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海量数据的捕捉、储备和处理,多模态理解和生成,个性化定制和推送,以及人机交互和智能辅助等功效。坚持铸牢思政引领和技术实现并轨的协同育人理念,在充分发挥思政价值引领优势的基础上,把主流价值作为技术代码嵌入精准思政的前中后阶段,推动落实精准思政场景下人与技术的双向赋能和深度融合。

(三) 构建人技互联与人文关怀兼具的主体间性交往

人工智能凭借超强记忆力、海量数据处理等在

特定领域超越人类的能力,成为受教育对象互动学习、解答疑惑的新选择。人工智能开始承担师生交往的中介职能,师生交往关系向包括教育主客体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三角互动模式演化。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不断解构传统师生交往关系,从而衍生出教师权威性弱化、学生情感极化和师生情感分化等问题。

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背景下,师生交往关系由紧密转向松散。为应对人工智能侵入人类交往关系所导致的师生传统交往关系消解困境,必须从主体间性视角切入,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单向模式,注重双主体间的情感激发和价值驱动,构建人技互联与人文关怀兼具的主体间性交往。坚持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主导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不忘“利用人工智能等外物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之初心,明确界定教育者与受教育对象之间的任务分工,合理分配二者间现实交往和虚拟交往的比例,持续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安全边界。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教师为主导的人文关怀机制,畅通师生情感交流通道。教育者通过倾听和掌握受教育者的情感动态,补齐人工智能的“情感思维”“共情认知”等短板。坚持“以精准思政的价值理性驾驭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引导受教育对象在共同理想信念、价值判断和民族情感的基础上,感悟文化魅力,体悟精神价值,领悟人生真谛。

四、结语

文章从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和瓶颈突破的角度切入,梳理从专用到生成式,再到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形态演进历程,锚定当前阶段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现实困境,针对思政内容有效供给不足、精准思政效能不达预期及传统师生交往关系弱化等问题进行剖析。坚持人技协同的发展理念,从内容供给体系、精准思政框架和师生交往生态三个方面提出治理策略。直至今日,专用人工智能发展已趋于成熟,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可期。未来,整个世界将按照包括物理、心理、人工等在内的三个世界之大模型变化发展。基于 Pareto 法则,5%以下的生物人引导并推动 15% 以下的机器人和 80% 以上的数字人共同从事生产实践活动,思政教师之生物人得以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

出来,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和立德树人等具有情感流动的创造性工作。人技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精准思政高质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智能性和感召力得以充分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年)[R].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
- [2] 缪青海,王兴霞,杨静,等. 从基础智能到通用智能:基于大模型的 GenAI 和 AGI 之现状与展望[J]. 自动化学报,2024(04):674-687.
- [3] 赵建波.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现实挑战及实践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2023(03):85-90.
- [4] 王岩,高天赐. 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辩证理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4(12):28-35.
- [5] 林明惠. 数字时代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机遇、挑战与路径[J]. 中国大学教学,2024(09):58-64.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of Empowering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ao Xupeng, Ma Jingwen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dows machines with human intelligence and is a technological tool that constantly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Its form of empowering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horizo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specializ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n to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mplementing functions such as resource integration,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targeted push, and learning situation depi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intelligent supply of ideological content, unmet expectation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is has triggered conflict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educational value.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for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building a content supply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consolidat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echnological real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 that combines human-technology connec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have become important links in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mpowerment effect through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vanced form; dilemma; strategy

【高职教育教学】

AIGC 赋能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应用模式 与实践路径研究

高佳燕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逐渐显现。文章通过分析 AIGC 的技术优势与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的现状及需求,构建 AIGC 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师生互动等方面的应用模式,并从工具选择与整合、教学方法创新、评价体系构建等维度探索了实践路径。研究表明,AIGC 能够为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实现 AIGC 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效果。

关键词:AIGC;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应用;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17-04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构教育生态与产业格局。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技术赋能与产业需求的双重驱动,用 AI 技术赋能教学改革势在必行。AIGC 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自然语言生成和内容创作能力,能够为解决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资源更新滞后、教学资源实践教学场景有限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从而推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一、AIGC 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一)课程教学应用模式

个性化学习资源生成。AIGC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学习风格和兴趣爱好等,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资料。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中,不同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存在差异。例如,在会计课程中,针对会计专业基础薄弱的学生,AIGC 可以生成由浅入深的理论讲解文档,从基础的会计概念、会计科目开始讲解,逐步深入到复杂的会计分录和财务报表编制。同时,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如添加一些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实际案例,或者将其融入当下热门的财经新闻进行分析,使学习内容更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

智能辅导与答疑。作为智能辅导助手,AIGC 能够实时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

收稿日期:2025-03-15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4 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4SZX743)。

作者简介:高佳燕(1981—),女,陕西西安人,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数字营销、创新创业、数字经济。

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的课程学习中,学生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在学习市场营销课程时,学生可能对市场调研方法、营销策略制定等方面存在困惑。AIGC 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理解学生的问题,并从海量的知识库中提取准确的答案进行回复。它不仅能够提供问题的直接答案,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相关的知识点和原理,为学生提供更详细的学习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主学习能力。

(二) 实践教学应用模式

虚拟实践场景构建。利用 AIGC 技术模拟真实的财经商贸工作场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受到实践场景的限制。例如,在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中,AIGC 可以模拟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环境,包括店铺装修、产品上架、订单处理、客户服务等各个环节。学生可以在这些虚拟场景中进行实践操作,如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进行上架销售,制定营销策略提高店铺流量和转化率,处理客户咨询和投诉等,增强实践能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弥补传统实践中实践场景有限的不足。

项目式实践指导。AIGC 可以协助教师设计基于实际项目的实践教学任务,并为学生提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建议。在财经商贸领域,项目实践是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重要方式。例如,在商务谈判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设计一个商务谈判项目的实践教学任务。AIGC 可以根据项目的进度和学生遇到的问题,生成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优化策略。在谈判准备阶段,AIGC 可以为学生提供目标市场的调研报告、竞争对手分析、谈判策略建议等;在谈判过程中,它可以实时分析对方的谈判策略和需求,为学生提供应对措施和谈判技巧指导,帮助学生顺利完成项目实践,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三) 师生互动应用模式

智能讨论引导。在课堂讨论和在线讨论环节,AIGC 可以作为讨论引导者,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参与度。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的课程讨论中,教师往往希望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问题。例如,在财务管理课程中,讨论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AIGC 可以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如不同融资方式的优缺点、适用场景、案例分析等,引导学生从企业的财务状况、市场环境、发展战略等多个维度

进行思考和讨论。同时,它可以引入不同观点的案例,促进学生之间的深入交流与互动,提高讨论的质量和效果,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反馈与评价优化。AIGC 能够快速收集和分析学生对教学的反馈信息,为教师提供详细的数据支持,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感受和需求,从而优化教学方法和内容。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学生对课程的难易程度、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AIGC 可以通过在线问卷、课堂互动等方式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并对反馈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例如,多数学生反映对某一章节的内容难以理解,AIGC 可以将这一信息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可以根据反馈调整教学进度和方法,增加对该章节的讲解时间和案例分析。同时,AIGC 可以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评价和建议,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成长,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优势和不足,制定更合理的学习计划。

二、AIGC 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一) 工具选择与整合

调研与评估。在实践路径的起始阶段,教师需要对市面上各种 AIGC 工具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国内外市场上有许多优秀的 AIGC 工具可供选择。例如,国内“文心一言”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色,能够生成流畅且逻辑性较强的文本,适用于课程教学中的智能辅导与答疑环节,为学生提供实时的学习指导。通义千问在多模态理解和生成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处理各个领域的问题,包括常见、复杂甚至是少见的问题,适合用于生成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和实践指导。智谱清言基于 ChatGLM 中英双语大模型开发,具备通用问答、多轮对话、创意写作、代码生成等能力,能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学辅助。此外,还有讯飞星火、360 智脑等工具,它们在不同领域和应用场景中也具有独特的优势。教师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工具的功能特点,结合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评估其在教学中的适用性和潜在价值。

系统整合。选择合适的 AIGC 工具后,需将其与学校现有的教学平台和资源管理系统进行有效整合。教师可以将 AIGC 工具生成的学习资源直接嵌入课程页面中,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访问和使

用。同时,通过建立数据接口,将学生在 AIGC 工具中的学习数据(如学习时长、提问记录、生成内容等)同步到资源管理系统中,以便教师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这种整合不仅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还能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面跟踪和评估。

(二)教学方法创新

项目式学习融合。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 AIGC 的实践指导功能,设计基于实际项目的实践教学任务。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完整的营销策划项目,要求学生为某一真实存在的企业产品制定营销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AIGC 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例如,在市场调研阶段,AIGC 可以根据学生确定的目标市场,快速生成相关的行业报告和消费者行为分析数据,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方案制定阶段,AIGC 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初步方案,进行逻辑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指出潜在的问题和改进空间,并提供优化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在 AIGC 的辅助下,更好地完成项目任务,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拓展。案例教学是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AIGC 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拓展案例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在传统的案例教学中,教师往往受到案例数量和多样性方面的限制。而 AIGC 能够根据教学需要,快速生成大量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财经商贸案例。以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为例,在讲解直播带货的课程内容时,AIGC 可以生成不同平台、不同品类产品的直播带货案例,包括详细的直播脚本、主播话术、活动策划、推广策略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AIGC 则可以为每个案例提供多角度的分析思路和优化建议,帮助学生拓宽思维,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AIGC 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讨论结果,生成总结性的报告,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

(三)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多元化评价指标。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往往过于注重考试成绩,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在 AIGC 融入教学后,需要建立多元化教学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考试成绩,应增加对学生在 AIGC 辅助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评价。例如,在

课程教学中,可以将学生使用 AIGC 工具的频率、生成内容的质量、对智能辅导的反馈等作为评价指标;在实践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在虚拟实践场景中的操作表现、项目完成的质量和创造性等纳入评价范围。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励学生在各个方面积极发展。

过程性评价强化。AIGC 的数据记录和分析功能为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有力支持。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 AIGC 工具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行为。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在学生使用 AIGC 进行店铺运营模拟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 AIGC 工具记录学生每天的操作时长、决策次数、业绩增长等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某些学生在选品环节花费过多时间,导致整体运营进度滞后。教师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反馈,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查看自己的学习数据,进行自我反思和总结,明确自己的学习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规划后续学习。这种过程性评价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还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三、AIGC 应用于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的应对策略

(一)技术可靠性与稳定性

AIGC 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生成内容的准确性、逻辑性有待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不够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的正常开展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应对这些问题,在选择 AIGC 工具时就需要选择技术成熟、口碑良好的 AIGC 工具供应商,同时建立技术保障团队,及时处理技术故障和问题,确保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

(二)教师数字素养不足

部分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师对 AIGC 技术的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难以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优势。因此,需要加强教师的数字素养培训,通过组织专题培训、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帮助教师掌握 AIGC 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教学应用技巧,提升教师将 AIGC 与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

(三)学生依赖风险

当学生过度依赖 AIGC 提供的答案和解决方案时,可能会削弱其自主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为避免这种情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正确使

用 AIGC 工具,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甄别能力。鼓励学生在参考 AIGC 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和创新,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四、结语

AIGC 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师生互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给教学带来诸多积极影响,如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增强实践能力培养、促进深入互动交流等。然而,在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教师素养和学生依赖等方面的挑战。通过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如加强技术保障、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引导学

生合理使用等,可以有效克服这些挑战,实现 AIGC 与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

随着 AIGC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关注 AIGC 与具体课程的深度融合细节,以及长期应用效果的跟踪评估,为持续优化教学应用提供更丰富的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推动高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更好地满足财经商贸行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 [1] 宋萑,林敏.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的工作变革:机遇、挑战与应对[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07):78-90.
- [2] 胡伏湘,陈超群,肖玉朝.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31(04):91-95.
- [3] 郑艳.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应用场景与推进策略[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23,36(03):57-62.
- [4] 韩飞,郭广帅.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突围路径[J].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40(04):33-36.
- [5] 姜良琴.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价值与实践路径[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5,44(03):85-88.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Model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AIGC for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e and Commerce Disciplines

Gao Jiayan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AIGC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mands of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e and commerce-related majors, and constructs the application models of AIGC in course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t also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ool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IGC can bring multiple positive impacts to th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e and commerce-related majors, but it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Appropriate response strategies need to be adopted to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GC and teaching,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ffec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vanced form; dilemma; strategy

【高职教育教学】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

徐丹 叶萍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42)

摘要: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链接教育系统与产业体系的重要平台。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切入,可系统揭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机制;从价值维度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兴起既源于功能重构,也体现理念转型与人才培养创新。为破解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机制协同、权益整合、资源匹配与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挑战。应从顶层设计、资源配置、协同育人、信息联通等方面优化路径,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推动共同体由碎片化合作向系统化整合迈进,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产教融合共同体;价值意蕴;应用机理;现实挑战;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21-04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提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一战略任务,明确支持由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行业性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产教资源,制定教学评价标准,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与实践能力项目,研制推广教学装备。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11项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其中之一。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探索,对于推动产业升级、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培养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意蕴

(一)场域塑造:内在需求催生多元主体合作新愿景

在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教融合不再仅仅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简单合作关系,而是演变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彼此嵌套、共建共享的复合型“合作场域”。在这一场域中,高校、行业组织、企业、政府乃至社会公众,作为各具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被共同卷入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全过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正是顺应这一复杂系统需求的产物,其诞生源于

收稿日期:2025-04-24

基金项目:2024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实践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24GXSZ191)。

作者简介:徐丹(1995—),女,湖南常德人,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叶萍(1972—),女,广东广州人,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教育与产业之间内在功能互补的紧迫诉求。一方面,教育系统迫切需要以产业实践为依托,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产业发展面临技术迭代与人力资源错配的双重挑战,亟须教育系统输送具备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由此,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权力与责任,共同构建协同育人的“行动场域”,成为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高效衔接的重要路径。正是在这种内在需求的催动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运而生,成为产教双元结构向多元共治结构演化的关键节点。

(二)理念演进:多措并举铸就产教供需对接新机制

随着教育现代化和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产教融合理念逐渐从“配合式”走向“融合式”,从“部门合作”迈向“系统协同”。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突破了传统“校企合作”范式的局限,将产业界纳入核心推动力量,引导其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共育等方面深度参与,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这一理念的演进,不仅体现为政策推动层面的改革创新,更体现在各类主体之间逐步形成的制度化协同机制中。部分地区已初步建立以行业龙头企业为牵引、行业协会为纽带、高校为支撑的联合治理平台,推动人才标准共建、资源共享、成果共评等机制落实落地。同时,数字化手段和平台化治理工具的应用也在重塑产教对接模式,通过智能匹配和数据驱动显著提升合作精准度与运行效能。可以说,伴随理念持续进化,产教融合共同体正逐步摆脱“形式大于内容”的局限,走向以实质性供需对接为核心的深层融合新格局。

(三)视野拓展:产业振兴引领谱写共建共享新篇章

在国家战略导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驱动下,产教融合共同体正从单点式合作走向系统性重构。行业作为联结教育与经济的关键枢纽,其自身的结构转型和功能拓展对共同体建设既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产业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人才供给层面,更体现在技术转移、标准共建、平台协同等深层维度。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共享技

术平台、协同开发课程体系等形式,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的企业与高校打破原有壁垒,推进资源跨界整合与多主体利益协同。在此过程中,产业视野的拓展促使教育系统跳出单一“人才培养”的局限,走向以服务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的全方位创新。这一趋势标志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由“校企互动”向“产业引领、多元共建”的新阶段跃升,其根本价值在于推动教育与产业的双向奔赴、互为支点,共绘高质量发展的共享蓝图。

(四)蓝图铸就:多元主体共筑人才精准培养新生态

面对日益复杂的人才供需结构和不断变化的产业发展格局,构建精准对接、协同高效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成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目标。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信合作与责任共担:高校负责教育资源配置与教学改革,企业提供产业实践场景与真实岗位需求,行业协会作为中介协调组织推动标准制定与对接评估,政府则提供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这一生态系统不再以单一教育主体为中心,而是转向“合作治理、共建共育”的模式,通过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贯通人才成长路径,实现育人链条的系统优化。具体而言,行业需求成为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源头,企业导师与高校教师协同授课成为常态,实习实践贯穿教育全过程,人才评估体系趋于多元开放。这种以共建机制、共育路径和共评标准为基础的新生态,不仅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契合度和适应性,也使得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合作中实现价值共赢,共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双轮驱动。

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挑战

(一)合作机制稳定挑战:共同体协同发展需更稳定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共同建设的合作机制,其稳定性与持续性直接关系到共同体的运行质量与发展潜力。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共同体建设仍面临机制运行不够稳固的问题。一方面,合作多依托阶段性项目,缺乏系统制度保障与顶层设计支持,使校企合作易因外部环境变化或人员调整而中断,呈现“合作时紧时松、

重启动轻维护”的状态;另一方面,参与主体在合作目标、行为逻辑与治理方式上差异较大,如高校注重教学规范与育人目标,企业更关注经济效益与人才适配,缺乏有效协调机制易导致协作效能下降,影响项目推进的节奏和质量。此外,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的桥梁作用仍显不足,以项目推动为主,缺乏常态化合作平台支撑。总体来看,合作机制的稳定性是共同体发展的基础保障。未来,应完善协作机制制度框架,推动形成基于长期合作意愿、权责清晰、具备监督反馈机制的稳定合作关系,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 权益协调整合挑战: 共同体合作利益需求更均衡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涵盖了高校、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等多方主体,如何实现合作各方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权责平衡,是关系共同体运行效率与内在凝聚力的关键。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不同参与方由于目标导向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合作中往往面临一定的协调难度。高校更注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学科专业的发展与学生就业的匹配,而企业则关注生产效益、人才使用效率与企业文化的匹配度,双方诉求虽有交集,但在资源投入、时间周期与成果评价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张力。与此同时,行业协会在协调标准、组织合作方面的能力不一,有时难以有效平衡资源分配与责任划分,导致某些参与主体在合作中处于“边缘”地位或“被动”角色。尤其在涉及课程开发、实习安排、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时,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共建与风险共担机制,可能影响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与长远规划。因此,推动权益协调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多方参与、共同决策的治理机制,借助合同约定、平台协商和绩效激励等方式,提升合作的公平性与吸引力,为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加稳定的动力与合力。

(三) 产教资源匹配挑战: 共同体供需对接需求更精准

行业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实现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精准衔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之间的有效匹配。当前,在共同体建设实践中,供需对接的精准性仍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部分高校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专业设置方面,仍以学术导向或传统岗位为主,与行业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数字产业等领域的用

人需求之间尚未形成高度契合,导致人才供给“跟不上、对不准”。另一方面,企业在资源共享方面的参与度仍不均衡,部分企业出于人力、成本、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在岗位开放、导师派遣、实训条件提供等方面尚未完全到位。此外,不同行业领域对技能标准的设定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岗位能力评估标准,使高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时难以做到针对性强、适配度高。资源匹配不精准还可能导致学生的实习体验和就业结果出现预期偏差,影响学校声誉和企业招聘效益。因此,构建精准高效的产教资源匹配机制,需要加强信息对接平台建设,推动行业与院校共同制定岗位标准、课程内容与评价指标,强化校企联合育人的系统设计,逐步实现从“供需靠近”到“供需契合”的转变。

(四) 信息共享隐私挑战: 共同体信息流动需求更安全

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过程中,信息的及时、准确与安全流动,是保障多方有效协作的重要条件。但由于涉及主体类型多、信息类别广、利益关系复杂,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一方面,企业可能出于商业机密保护的考虑,在共享生产技术、岗位需求、人才评价等核心数据时持保留态度;而高校在涉及学生数据、教学成果等方面,也常常因隐私保护和数据使用规范不明晰,而限制对外共享的范围与内容。这种“谨慎态度”虽有其合理性,但在缺乏统一信息标准、共享接口和数据治理规范的背景下,容易造成资源割裂、信息壁垒甚至重复建设,降低了协同效率。同时,当前部分平台的技术支撑能力尚未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可能存在数据泄露、身份滥用等风险隐患。在多主体共建共治的大背景下,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共享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未来,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数据边界与使用权限,引入区块链、数据脱敏等新兴技术手段,同时建设统一开放的信息平台,在安全前提下实现有效共享,从而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部信息的顺畅流通与有序协作。

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路径优化

(一) 健全顶层设计体系, 激发多元主体共建动能

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是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顶层设计体系,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提供战略引领与制度保障。应从行业视角出发,明确共同体的发展定位、合作目标与运行规则,推动产教融合从项目驱动向机制牵引转变。首先,在政策支持方面,需出台专项文件或建设指南,对行业共同体的组织架构、职责划分、合作模式等内容进行制度性设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框架。其次,在治理机制方面,应建立以行业协会牵头、院校和企业参与的理事会或指导委员会,设立常态化协商与决策机制,强化多元主体在规划制定、项目遴选、过程监督和成果评估中的共同参与。同时,推动共同体内部建立“任务导向—协同执行—过程反馈—绩效评估”的闭环管理体系,提升组织运行效率与合作稳定性。此外,还可探索“行业+区域”的联合共建模式,推动地方政府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纳入区域教育规划与产业布局,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政策统筹与资源协调,全面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二)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产教要素高效流动

实现资源的有机整合与高效流动,是提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效能的关键所在。可从共建机制、共享平台、激励政策三方面入手,构建系统完备、高效联动的资源配置体系。首先,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产教融合中心、科研转化平台等实体载体,实现“空间资源”与“功能资源”的同步整合;鼓励企业以设备捐赠、岗位开放、技术支持等方式嵌入教育环节,提升资源供给的行业属性与实践价值。其次,打造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对接课程内容、教师资源、技术成果、岗位信息等要素,打通数据孤岛,形成资源联动、供需协同的信息化网络。同时,推动平台资源动态更新与智能匹配,提升服务精准度。再者,完善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专项经费支持、资源置换政策等方式,激发企业和高校对资源开放的积极性。还可建立资源评估与使用反馈制度,优化资源使用效率,避免资源闲置或重复建设,推动产教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与高效流动。

(三)深化跨界协同育人,构建全周期人才培养体系

推动构建覆盖人才成长全过程的协同育人体系,应从制度联动、标准共建、路径融合三个维度着力,打造系统化、多层次、跨阶段的育人新机制。首先,制度联动方面,由行业组织牵头,联合院校、企业及第三方机构,明确协同育人的目标体系、权责关系与运行规范,保障育人过程的制度连续性与执行力。其次,标准共建方面,推动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与课程体系,将企业岗位能力要求融入专业教学,开展“岗课赛证”融合改革,增强人才培养的岗位适应性与行业契合度。同时,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教学全过程,如担任兼职导师、开发实训任务、参与教学过程考核,实现校企共育共评。再次,路径融合方面,应构建人才成长的“多学段贯通、多类型协同、多渠道支持”机制,推动中高职、本科、继续教育等纵向贯通,并强化“就业—进修—再培养”的横向衔接,形成“招生—培养—就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闭环。通过机制嵌套、路径融合、标准统一,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的行业适配性与可持续成长力。

(四)构建信息联通网络,提升融合发展整体效能

信息流通是产教融合共同体高效协同的基础工程,可以从平台搭建、标准制定与机制保障三方面,构建全面联通、安全高效的信息支持系统。首先,平台搭建方面,应建设统一的信息集成平台,整合高校教学计划、学生画像、企业岗位信息、行业标准、项目进展等核心数据,实现信息的一体化展示与动态更新;同时,应支持平台向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开放接口,便于跨部门数据对接与任务协同。其次,推动制定统一的信息格式与共享标准,明确数据归属、使用权限与安全边界,推动数据治理向规范化、透明化、法治化方向发展。再者,应建立信息使用反馈与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数据使用效果进行评估,推动信息平台迭代优化。在技术层面上,可引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数据加密传输、智能匹配与隐私保护,提升平台智能化水平和使用信任度。通过构建联通共享的信息网络系统,不仅可以提升校企沟通效率与协同质量,还能为战略决策、教学改革、人才匹配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撑,全面增强校企共同体的运行韧性与发展效能。

【高职教育教学】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设计与实践探索

丁欣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广泛应用,会计工作从传统核算向价值创造转型,这些对会计人才的综合能力都提出新挑战。与此同时,国家大力倡导教育信息化,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为会计教育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文章通过会计职业能力构成与在线开放课程的契合分析,设计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并以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为例,开展了新型教育模式建设的实践探索,为院校提供可操作的教学范式。

关键词:在线开放课程;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设计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25-05

为主动适应“大智移云物”时代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挑战,针对信息化、智能化催生会计专业育人新需求,由于会计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发展具有生成性、整体性、养成性、个体性等特点,需要新形态课程资源支撑,而当代大学生习惯和善于用“互联网+”的方式学习知识、捕捉信息,这就要求会计职业教育要突破教学时空限制,用“互联网+”、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一体化多样化的课程教学资源,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应用为主要抓手,推进和领跑世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

一、会计职业能力构成与在线开放课程的契合分析

会计职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其能力要

求随时代发展不断升级。在线开放课程的兴起,为会计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培养提供了新路径,二者在核心需求与供给模式上存在深度契合。

(一)会计职业能力构成要素

会计职业能力是多素养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四大核心要素:

一是专业知识能力。会计专业知识能力是职业根基,涵盖对会计准则与财税法规的精准掌握。需熟稔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规范,能准确处理账务与编制报表。同时要精通税法,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制细节,确保税务申报合规。还需掌握财务分析、成本核算等管理会计知识,理解区块链、大数据在财务中的应用逻辑,以便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账务场景,为决策提供专业依据。

二是实践操作能力。会计的实践操作能力是

收稿日期:2025-3-28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25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建设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SZX527);陕西青年职业学院2025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建设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5SP0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丁欣(1983—),女,江苏无锡人,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学、管理学教学与研究。

专业知识落地的关键,体现为解决实际财务问题的执行力。需熟练操作金蝶、用友等财务软件,快速完成凭证录入、对账结账等流程;掌握 Excel 函数嵌套、数据透视表等工具,高效处理批量数据。还需能独立编制三大报表,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异常波动,如通过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化预警坏账风险。在智能财务背景下,还应会使用 RPA 工具简化重复性工作,将理论转化为精准高效的实务成果。

三是职业道德素养。会计职业道德素养贯穿所有能力维度,是职业立身之本,核心在于诚信与责任的统一。它要求从业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处理账务,杜绝伪造凭证、操纵利润等违规行为,如面对企业粉饰报表的要求时,需坚守会计准则底线。同时,需严守商业机密,不泄露客户财务数据、成本结构等敏感信息。在复杂交易中,还需具备伦理判断力,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众对会计信息的信任,这是行业存续与发展的生命线。

四是综合能力素养。会计综合能力素养是多元能力的聚合,体现在跨场景应用与协作中。它要求具备清晰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将复杂财务数据转化为业务部门易懂的信息,如用图表解析成本结构。同时需有数据分析思维,借助工具从报表中提炼经营问题,辅助战略决策。面对政策变动或系统升级,要快速适应并协调团队调整流程。此外,跨界学习能力不可或缺,需了解业务链条以实现业财融合,这是会计角色从核算向管理转型的核心支撑。

二、在线开放课程对会计职业能力养成的支持机制

在线开放课程通过灵活的设计与资源整合,精准对接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需求,其支持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 动态更新的知识供给,强化专业知识能力

在线课程能快速响应会计准则、税法等政策变化,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例如,当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调整时,平台可迅速上线解读课程,帮助会计人员掌握最新规定。此外,国内外优质课程的共享(如清华大学“会计学原理”、Coursera 上的 IFRS 专项课程),让学习者能接触到前沿知识体系,弥补传统教育内容滞后的短板。

(二) 沉浸式实践场景,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许多在线课程嵌入虚拟仿真实验,如模拟企业全流程账务处理、电子发票报销系统操作等,学习

者可通过云端完成从凭证录入到报表生成的全流程练习。部分平台还与财务软件企业合作,提供正版软件的限时使用权,使学习者在课程中就能熟练操作用友、SAP 等工具,缩小理论学习与岗位需求的差距。

(三) 个性化学习路径,适配综合素养培养

在线课程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学习者根据自身短板定制学习计划。例如,职场新人可侧重基础账务课程,而管理层会计人员可选择战略预算、财务分析等进阶内容。同时,课程中的案例讨论、小组协作任务,如模拟审计项目,能锻炼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而职业道德专题课程,如会计诚信与舞弊防范课程则能直接强化学习者的职业操守意识。

综上,会计职业能力的多元化需求与在线开放课程的灵活性、时效性、实践性等高度契合。在线开放课程不仅为会计人员提供了便捷的知识获取渠道,更通过场景化、个性化的培养模式,助力其实现从“知识储备”到“能力输出”的转化,成为会计职业发展的重要赋能工具。

三、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设计

在线开放课程以其便捷性、资源丰富性和灵活性,为会计职业能力培养提供了创新路径。构建适配会计岗位需求的教育模式,需从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四个维度系统规划,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一) 课程目标定位

课程目标需构建“三维进阶”体系,精准对接会计职业发展需求。基础层旨在夯实专业根基,使学习者掌握会计准则、税法等核心知识,能独立完成账务处理;进阶层聚焦实操能力,培养财务软件操作、数据分析等技能,可胜任报表编制、预算管理任务;高阶层侧重综合素养,提升职业道德判断、跨部门协作与战略思维,助力向管理会计转型。同时,需融入智能财务、跨境财税等前沿内容,确保目标兼具岗位适配性与行业前瞻性。

(二) 课程内容体系设计

采用“模块化+动态化”架构搭建内容体系。专业知识模块涵盖财务会计、审计、税法等核心课程,配套案例库,如上市公司财报舞弊分析;实操技能模块嵌入虚拟仿真实验,包括金蝶软件操作、Excel 数据处理、Python 财务分析等,提供工具实操环境;素养提升模块设职业道德、沟通技巧等专题,结合情景模拟,如应对企业违规要求。内容需实时

更新,如税制改革后 72 小时内上线解读课程,确保与行业实践同步。

(三)教学方法与策略

实行“自主学习+互动赋能”教学模式。将知识点拆解为 10-15 分钟微视频,搭配随堂测验强化记忆;建立在线学习社群,开展案例研讨,如分组模拟审计项目,由行业导师实时点评;采用“任务驱动法”,布置真实企业财务问题,如成本控制方案设计,学习者提交方案后获专业反馈。同时,基于大数据分析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如针对实操薄弱者推送专项练习,实现精准教学。

(四)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建立“过程+结果”双维度评价机制。过程性评价占比 50%,包括在线作业完成度、社群讨论参与度、虚拟实验操作规范性等;终结性评价占比 50%,采用“实操考核+综合答辩”形式,如独立完成某企业季度账务处理并汇报财务分析结论。引入行业专家评审,重点考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评价结果与初级会计职称考试知识点相衔接,增强评价的公信力与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该模式通过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的协同设计,使在线开放课程与会计职业能力需求深度契合,既保障知识传递的系统性,又强化实践能力的培育,为会计人才成长提供高效路径。

四、教育模式建设实践探索

在数字经济加速渗透的背景下,会计教育正面临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范式转型,在线开放课程成为连接教育供给与行业需求的重要纽带。陕西青年职业学院通过整合优质线上资源、重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互动机制,将虚拟仿真实验、行业导师在线指导与岗位需求深度融合,有效破解了传统会计教学中实践场景不足、知识更新滞后等难题,为推动会计教育数字化改革、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提供参考。

(一)教学模式建设

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立足职教实际,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加强与企业密切协同,从目的、任务、载体、平台、渠道、路径等方面对高职院校学生会计职业教育类课程资源进行顶层设计与系统开发。

“引”“擎”驱动:以省级课程思政精品课程《会计学基础》为“引擎”,课程与专业文化融合。

构建“立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完成《会计学基础》《管理会计》等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管理会计》

省级职业技能培训优质课程以及《管理会计》校级课程和思政示范课程等“多层多类”课程体系。

(二)教学实施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采用 BOPPPS 有效教学模式设计整个教学过程。以《管理会计》省级精品在线课程为例,课前,要求学生登录学堂在线网络课程平台,观看预习教学内容短视频。课中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实现知识内化,依次为 Bridge-in 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引出该堂课的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 Outcome,通过前测 Pre-test 引发思考,突出重点,同时全程贯穿参与式教学 Participation,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借助于案例讨论、实训项目、“做中学”等系列课上的“活动”设计,融入课程思政,巩固课堂知识作为后测内容 Post-test,实现了“知识内化”和“价值引领”的统一。最后 Summary 归纳总结,强化记忆。课后通过学堂在线网络平台发布课后练习题及相关学习资料,学生完成自测练习和扩展知识的学习。

以“管理会计的概念及特征”教学任务为例,本课教学重点是能够准确理解管理会计的概念和内涵,难点是能够通过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对比,明晰管理会计的特征。

课前:要求学生登录学堂在线网络平台,观看预习内容“管理会计认知”。

课中:第一阶段,让学生观看视频“从华为的管理会计中体会爱国强国梦”,引发学生思考“如何理解管理会计工作”,学生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通过总结引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管理会计概念及特征”。第二阶段,讲授管理会计的概念,通过分析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让学生明晰管理会计的内涵和特征。第三阶段,分析视频内容带给我们的启示。

英国经济学家对华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课堂上,教师通过华为的“四统一”标准和“四化”标准启示学生:一把尺子量到底,才是公平公正的。只有做到公平公正,企业才能长远发展,组织才能健康强大,个人道路才能走得越来越远。

课后:教师通过学堂在线网络平台发布课后练习题及相关学习资料,学生完成自测习题和拓展知识的学习。

(三)教学效果评估

新型教学模式实施以来,通过“资源+平台+线上线下”的教学实施,有效提升了教师对会计课程

教学的积极性和针对性,由“善教”变“乐教”,同时,基于会计类课程线上线下的移动学习,依托个性化学习服务,有效提升了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使学生真正由“学会”变为“会学”,由“知学”变成“乐学”,不但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而且对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养成提供了科学支撑。

运用本新型教学模式建设完成的省级在线课程《会计学基础》获得教育部的肯定,已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运行展示,精品课程资源全国共享,截至目前运行11学期,累计选课人数3,960人,选课学校15所,公众学习者所属学校32所,累计互动87,612次;建成的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管理会计》,已面向全国高校和社会学习者连续运行4期,截至目前累计服务学员596人,累计浏览55,860次。

同时,新型教学模式建成的两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已面向多家企业全面推广应用,作为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陕西通汇物流有限公司以及陕西万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入职培训课程,获得企业高度认可。

新型教学模式实施以来,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近五年就业率保持在92%以上,学生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逐年提升,形成了“入口旺、出口畅”的局面。

(四) 总结与反思

一是促进高职学校课程教育教学观念的转变。通过研究制定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教师重视新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主动适应信息化教学的发展趋势,不断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在线开放课建设及课程应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发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引领高职院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综合考察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活动与评价、教学效果与影响、团队支持与服务等要素,努力实现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教育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结合时代要求和学生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在线开放课程辅助教学,减少理论课堂教学学时,增加在线教学学时,根据教师、学生的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开展教学改革。

三是推动优质高职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构建适合高职专业发展特点的精品在线开放课共享课模式,在校内试点的基础上,开发、收集、组织一批丰富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形成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课程资源库,向其他高职学校及社会推广应用。

五、结语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会计职业能力养成教育模式,通过系统性地设计与实践,有效打通了会计职业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从模式构建到具体案例落地,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在线平台为纽带,实现了课程目标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教学内容与行业动态的实时联动、教学方法与学习规律的深度契合,既解决了传统会计教育中实践场景不足、知识更新滞后等痛点,又为学习者提供了个性化、场景化的能力提升路径。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课程资源的动态优化机制,深化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完善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让在线开放课程在会计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效能,为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会计人才持续注入动力。

参 考 文 献

- [1] 盛丽颖. 学生中心 德育为先 理实结合 职业胜任[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2):18-23.
- [2] 牛慧. 远程会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研究[J].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2(03):32-36.
- [3] 李芳, 付莉, 花双莲. 利用混合线上教学模式, 打造立体云端课堂[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03):15-18.
- [4] 王辉. 会计职业能力与“嵌入式”教学模式研究[J]. 财会通讯, 2021(10):55-60.
- [5] 秦荣生. “互联网+”时代会计行业的发展趋势[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12):67-72.
- [6] 李晓慧. 基于OBE教学模式下会计专业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研究[J]. 财会通讯, 2021(12):20-25.

Design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an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ormation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Online Open Courses

Ding Xin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accounting work has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accounting to value creation. These changes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ntry has vigorously advocated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open courses, providing a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composition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online open courses, designs an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cultivation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online open courses, and takes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ducational model, providing an operational teaching model fo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Key words: online open courses;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education model; design and practice

(上接第 24 页)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2022-12-21)[2023-10-0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12/t20221222_1035691.html
- [2]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 (2023-7-11)[2023-10-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307/t20230717_1069319.html
- [3] 郭媛媛,王帅.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内在机理、实然困境和应然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23,44(22):41-49.
- [4] 朱倩谊.融合创新的现代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共同体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J]. 教育科学论坛,2023(24):53-57.
- [5] 谭容杰,姚中进.从“碎片化”迈向“整体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治理困境与路径突破[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5):34-41+81.
- [6] 蒋丽平.数字化赋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与实践路向[J]. 教育与职业,2025(06):48-55.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Xu Dan, Ye Ping

(Gu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42)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link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industri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it can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From the value dimens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is not only due to functional reconfigur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innov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uch as mechanism coordination, rights integration, resource match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we should optimize the path from top-level design, resource allo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 the community to move from fragmented cooperation to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y.

Key words: stakeholder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value implications; application mechanism; practical challenges; path optimization

【高职教育教学】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涉农高校校史育人的逻辑、价值与实践

吴琪 刘瑞明

(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校史承载了学校的历史沿革,蕴含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育人资源。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运用校史开展育人是贯彻落实文化育人的必然要求、开展思政教育的创新载体,也是发挥独特校史资源的具体行动。某涉农高校充分运用学校厚重的校史资源,通过强化校史教育阵地建设、开展特色校史教育活动等创新举措,探索形成了适宜的校史教育模式。未来,还应从校史教育阵地建设、创新活动载体方式和校史思政课程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校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乡村全面振兴;涉农高职;校史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30-04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中进行安排部署。乡村全面振兴是在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过渡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基础上的深化,更加强调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乡村五大振兴的统筹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涉农高校青年学生是乡村人才的重要来源,必须充分运用高校校史培育涉农高职学生的知农爱农意识,提升学生向农从农本领能力。高校校史以实物、声像、口述、文献等多种形式为载体,记录着一所学校创立分合、发展壮大的历

史过程,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涉农高职校史既具有高校校史的一般特征,又具有特色优势,对于培养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具有独特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高校校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史与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校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等方面,缺少立足乡村全面振兴背景探究涉农高职校史育人实践探索及实效。涉农高职校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于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涉农高职校史的育人价值,分析涉农高职运用校史育人的实践做法,提出增强校史育人实效的现实路径。

收稿日期:2025-04-22

基金项目: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4年度课题“全过程育人视角下高职校史育人现状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GH24Y3372)研究成果;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2024年度统战与实践课题合作研究项目“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HZ116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琪(1995—),男,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

刘瑞明(1974—),男,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一、涉农高职校史育人的深刻逻辑

(一) 贯彻落实文化育人的必然要求

文化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能够以潜移默化方式培育时代新人。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优化校风学风,繁荣校园文化,将校园文化置于“十大育人”体系中进行安排部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发挥校园建筑景观、文物和校史校训校歌的文化价值。这些都对高校开展文化育人提出了具体要求,也为高校发挥校史育人作用提供了基本遵循。高校文化育人作为新时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重要抓手,需要从组织运行、内容供给、资源整合和载体创新等方面发力。而高校校史作为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呈现载体,承担着育人的重要使命。尤其是作为涉农高职院校校史来说,记录着农耕文化在高校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因此,从这个维度来讲,涉农高职校史育人是贯彻落实文化育人的必然要求。

(二) 高职开展思政教育的创新载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作,涉及学生学情分析、教育方式载体创新等内容,再加上涉农高职思政教育的向农性特征,决定了提高高职思政教育质量必须要有依托载体。涉农高职校史记录了学校从创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包括创办背景、历史变迁、重要事件等,蕴含着以农为本、服务“三农”、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等教育理念,体现了学校在农业教育领域的独特优势和办学特色,展示了学校为区域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影响力。同时,涉农高职校史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影像资料、实物、校园文化活动等多样的表现形式。涉农高职院校以校史作为思政教育资源,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农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承,以及蕴含的勤劳、智慧、坚韧和创新等品质,激发学生的向农情怀,增强对农业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教育引导学生在未来择业时向农从农,进一步增强思政教育实效。

(三) 发挥独特校史优势的具体行动

历史蕴含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承载着文化的时代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体现了创新精神,因此,以史育人具有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批判思维、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等独特优势和特色,对于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农高职校史既具有高职院校校史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其独特表征。涉农高职充分运用校史资源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文化育人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历史育人的具体行动。芜湖职业技术学院挖掘校史红色文化,助力文化育人,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校史育人作用,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好“荷子老师”的职教好故事等都充分展示了涉农高职发挥校史育人的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

二、涉农高职校史育人的价值意义

涉农高职校史既具有高校校史的一般特征,也有涉农高职校史的特殊性。涉农高职校史具有真实性,涉农高职在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实用技术、工具实体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经过人为干预加工,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涉农高职校史具有唯一性,涉农高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记载、图像资料、实物展示等具有非常浓厚的农业特色,这种独特的农业特点区别于一般的高职校史,具有唯一性,这种真实性和唯一性决定了涉农高职校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和优势。

一是涉农高职校史能够培育师生爱校荣校情感。涉农高职以校史形式开展各种育人活动,能够让师生深入了解学校的办学历史,认识到一代代先辈艰辛办学创业的动人故事,进而增强师生爱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通过系统的校史校情教育能够让师生以优秀前辈为榜样,传承弘扬农业专家教授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二是涉农高职校史能够增强学生学农向农情怀。从涉农高职学生生源结构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农村普通家庭,对农业较为熟悉,但不愿意未来从事农业。对涉农高职学生开展校史校情教育能够让其看到优秀前辈从事农业科研的优秀事迹,并从这些事迹中,感悟农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增强学生学农向农情怀。

三是涉农高职校史能够激发师生勇敢自信和担当。涉农高职校史记录着办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专家教授的成熟做法,以校史为蓝本采取多种形式的校史育人,可让师生从这些历史中增强自信,进而在工作岗位中敢于担当作为,为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三、涉农高职院校校史育人的生动实践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

考察时强调,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陕农大”)作为西部地区涉农高职院校,自合院组建以来,高度重视校史的挖掘、整理和运用等,落实“三全育人”理念,充分挖掘学院厚重的历史资源,注重发挥校史育人价值,遵循“三全育人”理念,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师生开展校史育人活动,增强了广大师生爱校荣校意识和向农务农情怀,并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成功做法,为高职院校落实文化育人要求提供了思路。

(一)挖掘校史资源,建强校史校情教育阵地

陕农大是一所具有深厚红色历史的涉农类高职院校,其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934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建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职。学校三所中职并行、高职时期的发展,均与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专师生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红色历史,为学校办学事业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学校依托这些丰厚的校史资源,不断建优校史教育基地,为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提供了有力基础。一是建成学校校史馆。学校充分挖掘办学过程中蕴含的丰厚校史资源,注重以史育人,学校建成了学校校史馆,校史馆分为序厅、领导关怀、追本溯源、沃土新韵和耕耘有成等部分,全面展示了学院的发展脉络、办学特色和育人成果。不仅展现了学校的办学事业发展,也见证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这些历史成为学校进行校史校情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文化记忆的独特资源。二是建成附设高职党支部活动旧址,学校深入挖掘90年办学的红色文化资源,修复重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职党支部活动旧址,该旧址主要展示1938年附设高职党支部成立之后,带领广大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创办进步壁报、护送60余名进步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号召15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解放军建设新疆等投身革命的历程,教育引导广大师生传承弘扬先辈们的红色基因和拼搏奉献精神。三是组建校史宣讲团,为了让广大学生能够沉浸式、体验式地深入了解校史,学校在全校招募校史讲解员,并采取理论讲解、实际操练等形式开展培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校史宣讲团,进一步发挥宣讲团的组织化优势,构建起学生有序参与、多维宣讲的格局。

(二)聚焦立德树人,开展特色校史教育活动

全过程育人作为“三全育人”理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强调时间范畴上的全过程,其本质是在强调“三全育人”之整体过程,这一过程也涵盖了全员、全方位育人的要求。陕农大在落实“三全育人”理念过程中,注重发挥全过程育人作用,对学生开展全过程化的校史校情教育。一是注重全过程周期性教育,在新生入学阶段,组织学生分批次到校史馆上一堂校史校情课,在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场景中,感受学院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辉煌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对学校发展历史有整体性认识,从心底明确大学阶段目标,进一步增强理想信念。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期间,推动校史校情教育走进课程教学,学校充分发挥思政课关键课程作用,用活用好校史馆的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思政课教师组织学生在校史馆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采取历史宣讲、史料展示等形式引导学生切身感受学校的艰辛发展与国家发展命运紧密相连,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在毕业阶段,为进一步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择业观,组织毕业生到校史馆接受毕业教育,再次重温入学誓言,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二是聚焦关键节点深化校史教育,在学校建校90周年之际,学校组织开展“学校史校情,庆九秩华诞”师生系列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分批次参观校史馆,通过集体宣誓、参观学习、观看宣传片等形式,回顾学校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发展的历程,学习学校的文化传承与革命传统,培养广大师生知校、爱校和荣校意识,增强广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导广大师生勇担强农兴农使命。

(三)注重分类精准,不断激发职工干事动力

学校在聚焦落实“三全育人”理念的基础上,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教职工等不同群体分类开展活动。一是注重凝聚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学校在建校90周年之际,组织党员干部参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馆、学校校史馆,回溯两校共同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深入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前辈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重温学校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荣耀,增强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永守强农兴农初心,担起职业本科、新双高建设和新校区建设的重任。二是注重激发教职工勇于创新活力,学校组织新入职教师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活动,并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开展“知校史 明校情 铸校魂 履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引导教师秉持“明德强能,言物行恒”的校训,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开拓创新,

努力为学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聚焦思政课教师关键群体,在校史馆挂牌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修基地,加强思政课教师对校史和耕读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将校史校训文化精神有效融入思政课堂教学,切实增强学生的学农爱农情怀。

四、结语

涉农高职校史作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五育并举”理念的重要资源,对于培养学

生的爱校荣校意识、增强集体荣誉感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陕农大充分挖掘厚重的校史资源,通过强化校史教育阵地建设、抓实校史教育系列活动、聚焦校史思政课程建设等方式,多措并举、分类精准开展校史校情教育,增强了全体师生的使命责任与担当。

未来,包括陕农大在内的涉农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充分发挥独特的校史资源育人价值,以探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为契机,扎实开展校史校情教育。以系统扎实的校史教育增强学生的知农爱农情怀,引导其积极投身“三农”事业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2-04(001).
- [2] 张贵礼,程华东.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04):90-93.
- [3]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J].党建,2022(05):4-6.
- [4] 周如东,王梦娜.习近平“全过程”育人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与价值引领[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3):84-91.

The Logic, Value and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u Qi, Liu Ruiming

(Shaanxi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school history records the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and contains diverse and rich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the school history for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cultural education, an innovative carrier for conduc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 concrete action to leverage the unique resources of the school history. A rural-oriented university fully utilized the rich resources of its school history and, through innovativ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conducting distinctive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activities, explored and formed an appropriate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model.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nature of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history education platforms, innovating the ways of activity carriers, and building school histo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lated to agri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school history

【高职教育教学】

探索 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屈婉聪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其面临的学业、就业与人际关系压力使得心理健康教育需求显著增加。然而,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手段在覆盖面、及时性和个性化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全面满足学生需求。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进步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文章在探讨 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际应用的基础上,梳理其创新路径,并针对 AI 技术应用中的数据隐私、伦理规范等挑战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

关键词: 人工智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85(2025)03-34-04

高校学生需要应对来自环境适应、升学就业、同侪竞争和人际恋爱关系等方面的挑战,容易遭受心理问题的困扰,是心理问题的高风险群体,高职学生表现得更为明显。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AI 通过情绪识别、个性化干预等技术手段,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学生的心理状态,提供智能化的干预方案,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效率与覆盖面。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前景广阔,可以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有效支持。

一、AI 技术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概述

(一)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需求分析

高职学生处于心理和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但

同时面临学业、就业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压力。相比于普通高校学生,高职学生在心理韧性和应对压力的能力上较为薄弱,容易受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心理健康问题上的应对支持较为缺乏,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表现和职业发展。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升自我调节和应对压力的能力,还能有效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概率。随着学生心理健康需求的增长,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供给却相对不足,传统的心理干预和咨询方式难以覆盖所有学生,尤其在心理咨询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为每位学生提供及时帮助。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创新,要通过引入新技术手段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和深入。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202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立项课题“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B69)。

作者简介:屈婉聪(1991—),女,陕西蓝田人,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二) AI 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概述

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逐渐拓展,以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计算为基础, AI 能够有效辅助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和干预。AI 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两个方面。在心理评估方面, AI 可通过对学生数据的情感识别和模式分析,快速获取其心理健康状况,并辅助咨询师进行心理筛查和风险预警。在心理干预方面, AI 能够通过个性化定制服务提供适合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针对其情绪状态提出有效的改善建议,确保心理服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此外,在国内外高校的实践中, AI 技术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取得显著成效,学生通过心理健康监测系统可以随时进行自我评估,系统提供个性化反馈和支持。这些应用有效缓解了资源不足的困境,提升了心理健康服务的覆盖面与响应速度,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三) 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潜在价值

AI 技术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潜在价值,首先在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方面, AI 可通过智能化系统实现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反馈,学生无需排队即可通过智能平台获取心理健康服务,从而提升了心理健康服务的便捷性。同时, AI 能够利用数据分析、情绪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心理健康服务的个性化,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和支持,满足个性化的心理需求。此外, AI 作为辅导员和教师的有效助手,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快速识别出高风险学生,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帮助辅导员和教师实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及时采取干预措施。这种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化服务不仅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也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化、智能化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二、AI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一) 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在心理评估中的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分析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够有效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NLP 在心理健康筛查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学生自我报告和问卷

的分析中,通过解析文字中的情绪和态度倾向,识别学生潜在的心理困扰或风险因素。语言往往反映一个人的心理状态,通过处理学生的语句和词汇, NLP 能够识别出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在此基础上, NLP 进一步为个性化心理咨询提供支持,通过分析学生的语言特征,辅导员能够更加精准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NLP 在情绪和语言表达分析方面的应用,使得心理健康评估更加细致和深入,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二) 机器学习与情感计算技术在心理健康检测中的应用

在心理健康检测中,机器学习和情感计算技术通过对学生情绪状态的精确识别和分析,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利用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进行预测分析,提前识别出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从而在问题发展之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通过情感计算技术,系统可从学生的表情、声音、行为等多方面捕捉情绪变化,准确判断其心理健康状态。基于大量学生数据的分析,机器学习还可以揭示群体心理趋势,为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这种基于情感计算和数据分析的心理健康检测方法,确保了心理健康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 虚拟现实(VR)技术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沉浸式体验,通过 VR 技术创建的场景区模拟,可以帮助学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学习应对心理压力的方法。在心理健康教育场景模拟中, VR 能够再现真实生活情境,模拟社交压力或焦虑场景,帮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学习调节情绪和处理压力的技巧。同时, VR 技术在心理干预方面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放松和冥想的沉浸式体验,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缓解压力,增强心理韧性。未来将进一步探索 VR 与 AI 结合的沉浸式心理治疗方式,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实现更为深层的心理干预效果。这种基于 VR 技术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仅丰富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还为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全新的解决途径。

三、AI 助力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 建立基于 AI 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监测与评估系统

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引入 AI 技术,建立了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心理健康监测系统,能够通过多源数据实时监测学生心理状态。该系统通过整合问卷、情绪分析和行为数据,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持续追踪。例如,使用情感识别模型对学生的日常交流文本和表情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识别出其潜在的焦虑或抑郁倾向。结合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系统可以在数千名学生中快速筛查出心理高风险人群,为辅导员提供提前干预的依据。研究表明,AI 监测系统的准确率可达到 85% 以上,有效提高了心理筛查的效率。在数据支撑下,系统能够自动生成个性化心理健康报告,包括情绪波动趋势图、心理健康评分和预警信息,帮助辅导员及心理咨询师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这种智能监测系统不仅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还实现了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与干预,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二) 开发智能心理咨询机器人

智能心理咨询机器人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工具,能够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心理支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机器人能够理解并回应学生的情感需求。智能心理咨询机器人在与学生交流时,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分析学生的语言情感和情绪波动,进而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服务。情感识别技术让机器人能根据学生的语气和词汇使用,识别其情绪状态,如焦虑、愤怒或沮丧等。机器人根据用户情绪状态调整对话方式,并给予相应的心理调节建议。机器人咨询平台能够处理数千次会话,覆盖率比人工咨询提高了 60% 以上。学生在通过机器人进行初步咨询后,如仍需更深层的帮助,系统会自动引导其预约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从而优化心理资源的配置。

(三) 利用 AI 辅助教师和心理辅导员的专业发展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中,AI 不仅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也在辅助辅导员的专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情感计算技术和行为

数据分析,AI 可以帮助辅导员及时掌握学生群体的心理趋势和情绪变化。系统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分析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数据,生成情绪热力图、心理压力分布图和行为模式分析,帮助辅导员识别心理需求集中和变化的区域。AI 数据分析平台还提供辅导员的专业培训模块,其中包括应对焦虑、压力管理等情绪问题的最新研究和实用干预方法,系统的反馈与建议为辅导员的判断提供了科学依据。基于数据分析的风险预警系统还会为辅导员提供实时预警,当学生情绪数据达到预警值时,系统会发送通知,确保辅导员在第一时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AI 技术的应用有效提升了辅导员的工作效率,使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更加系统化、精准化。

四、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创新发展趋势

(一) 基于 AI 的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

AI 技术的发展使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创新方向。通过收集学生心理健康数据,AI 系统生成心理健康画像,深度学习模型则用于分析学生的情绪、行为和压力,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心理干预。心理健康画像整合了情绪波动和学习行为等数据,为辅导员提供直观的个体化信息支持,提升干预的准确性。研究显示,个性化干预方案的有效率比传统手段高约 40%,在心理维护和情绪管理上也取得了明显成效。该方法不仅聚焦高危学生,也能动态关注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提升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精准度。

(二) AI 与跨学科合作的多领域应用

AI 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推动了心理学、教育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的融合。AI 结合心理学理论,帮助系统更精准地识别学生的心理需求。数据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使情感识别和压力分析更为准确,情绪识别的准确率可达 90% 以上,显著提高了心理服务质量。教育学的配合使系统能根据心理学模型调整内容,适应不同情绪的干预需求。AI 的跨学科合作不仅使心理健康系统更契合高职学生的需求,还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 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创新趋势

AI 在全国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已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情绪监测和危机管理方面。通过大数

据共享、辅助和预警机制,构建学生成长伴随线等,实现心理建档全覆盖,提升心理危机预警的精准度。同时,提供引导式自助语音服务、聊天机器人等基于网络的咨询服务方式,扩大心理健康体系服务的对象范围,借助虚拟辅导、AI 陪伴、个性化心理训练游戏等形式,以贴合学生自身需求的方式提供帮助。

AI 技术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展现出显著的应用潜力,以其在个性化心理支持、情绪识别和早期干预中的突出优势,有效弥补了传统心理健

康教育的不足,提升了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高职院校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心理需求,为其提供更精准和动态的支持,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智能化、系统化发展。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与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将在技术和人性化服务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助力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郦子莹. 心理行为训练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中的应用[J]. 镇江高专学报,2024,37(01):60-63.
- [2] 孙桔云. 浅谈积极心理学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 现代职业教育,2023(22):37-40.
- [3] 王位,刘淑英. 基于 ROS 机器人和阵列式传感器的心理健康监测技术研究[J].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4(09):248-252.
- [4] 田育娟,田花妮. 面向心理健康监测的多视角机制与虚拟现实融合技术研究[J]. 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4(08):113-116.
- [5] 惠晓翠,周云飞.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设计与实现[J]. 西部素质教育,2024,10(12):98-101.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I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Qu Wancong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academic, employ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essures they face have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have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coverage, timeliness and personaliz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its innovative path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address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privacy and ethical nor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virtual reality

【高职教育教学】

多元协同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蒋梦园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是双向互动、互助发展的时代课题,职业院校和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实现纵横联合,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不同行动主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是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基于多元协同视角,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并聚焦于角色定位、发展动因、协同关系三个维度,厘清多元主体彼此间的嵌合关系,从目标协同、利益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四个维度分析多元主体间的运行逻辑。并且在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聚合力、引领力、创新力、保障力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实际效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多元协同;运行逻辑;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38-05

一、多元协同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一)政府层面:发挥自身职能、优化执政方式的内在要求

在多元主体立足职业教育共同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能够通过完善机制、出台政策等方式,强化自身的服务效能。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不同主体间存在着利益差异、需求差异以及供给差异,这就需要作为顶层制度体制设计者的政府,

关注多元主体的内在需求,发挥其自身的制度供给功能,为多元主体提供有效的协同运行制度体系。为此,政府需要主动承担起机制构建、管理调控等责任,而这些也正是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公共保障职能,不断优化执政方式的体现。

(二)学校层面: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就整体的社会系统来看,职业教育和乡村社会同属于社会的子系统,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在二者的关系中,职业教育相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提供着培养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发展新型乡村产业、重塑乡村生

收稿日期:2025-04-03

基金项目:2025年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协同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JCV2025D09)。

作者简介:蒋梦园(1995—),女,湖北襄阳人,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态和创生乡村文化的功能。服务乡村振兴既是职业院校解答时代课题的内在要求,也是针对社会新需求推动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职业院校可以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切入点,适应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需要,因势而新地改革专业课程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新模式,积极赋能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发展。

(三)企业层面:实现利益诉求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由此可知,乡村产业的升级发展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企业又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推动产教融合发展,实现职业院校的技能供给与乡村人才需求相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链相契合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企业作为社会成员集合体的代表,需要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承担着反哺农村、回馈社会的时代责任。另一方面,企业在借助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资金补贴、信贷支持等现实的利益,是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

二、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乡村振兴发展是一项复合型的工作,涉及乡村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生态建设以及组织振兴等多个方面。为此,就需要不同的行动主体在其中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明确自身参与“职教兴农”的发展动因,厘清“我能行动什么?”“我如何行动?”的问题,才能使得多元协同机制发挥出最优效能,整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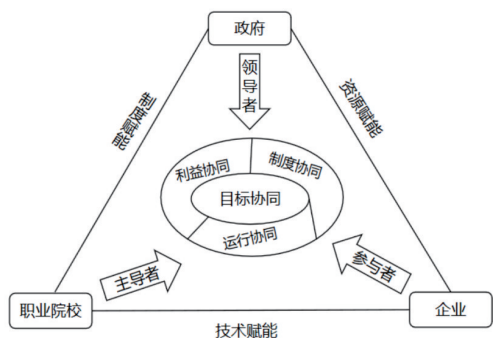


图1 多元协同分析框架

(一)多元主体在协同推进“职教兴农”中的角色定位

在多元主体立足职业教育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对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应的职责予以明确,形成“目标统合,责任分担,利益共享”的高效协同运行模式。

在多元协同主体中,政府是领导者,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机制建设、政策引导,从而实现制度赋能,并在过程中承担起规划设计、协调管理等职责,发挥着统筹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整合资源的作用。职业院校作为主导者,为乡村发展提供专业技术和人才支撑,从而实现技术赋能。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者,既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农产品销售渠道,又可以联合职业院校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为农村发展输送专业人才,主要通过资源流入的方式承担自身职责。

(二)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职教兴农”的发展动因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一种“外部推动”与“内源驱动”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对于不同的参与主体而言,发展动因具有多样化的表现。

首先,政府寻求其他主体参与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主要是为了提升乡村振兴效能。由于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行动力主要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推广,而职业院校和企业等主体在资金、人才、平台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只有联合其他多元主体,使各方主体各显其能、各尽其责,才能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发展效能。其次,职业教育参与协同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是为了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在参与协同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既能够与企业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实现人才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课程内容与乡村产业标准精准契合,又可以借助乡村提供的实践场所,提升实践教学质量。最后,企业参与协同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是为了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和获取经济效益。企业在联合职业院校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利用自身的平台、资金反哺乡村发展,承担起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企业也能够在此过程中享受到政府部门合理的优惠政策,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需求。

(三)多元主体推进“职教兴农”的协同关系

在协同机制下,政府、职业院校、企业之间原有的种种壁垒被瓦解,以利益协同为牵引,运行协同为动能,构建了一个以实现乡村振兴为统一目标的多元协同有机系统。该有机系统中,政府作为领导者,其政策及体制的完善能够为系统提供制度赋能,职业院校作为主导者,其所具备的知识人才能够实现技术赋能,企业作为参与者,自身所具备的资金及产业技术都能够为乡村振兴实现资源赋能。多元主体间始终是多向增能的关系,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相互激发内在优势,不断增强达到预期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彼此间环环相扣、互利协同。多元主体间依据各自的角色功能,在利益嵌合的协同网络中,互相激发内在效能,最终迸发出集体行动力。

三、多元主体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

(一) 目标协同为导向,共筑“职教兴农”共识

多元主体之所以能够主动参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因为他们在某一公共议题下享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和未来愿景。乡村的振兴发展目标与各方主体自身的发展目标相互关联,使得多元主体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指向乡村振兴发展的统一目标。在协同机制中,只有依托于共同的发展目标,才能够更好地调动各方主体的行动积极性,发挥出更大的效能。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在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以目标协同为导向,培育协同精神,共筑协同服务的合作共识。

(二) 利益协同作驱动,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动力

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在协同助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由于彼此间在角色、功能等方面各有不同,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而实现利益协同是达到目标协同的现实条件。共同的利益点是不同行动主体能够达成协同行动的关键纽带,因此,在协同系统运行的过程中,要主动纾解多元化的利益冲突,寻找不同参与主体间的最佳利益契合点,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内在动力。在完善利益互嵌的基础上,促使多方的单一行动力凝结成为更大的聚合力。

(三) 制度协同为支撑,调节多元主体行为

“制度是其所在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规则,确切地讲,它是为了明确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制定的一些约束。”在多元协同合作机制中,多元主体间呈现出多重的利益协同关系,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来规范多元主体的行为,进而促使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一方面,构建科学的对话协商制度。在政府的领导下,依据职业院校、企业、乡村三方的发展需求,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瓦解跨部门协作的壁垒,形成协同决策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利益平衡制度。从本质上来看,多元协同主体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取决于多方主体能否通过博弈在协同过程中实现自身最关切的利益,并最终达到多元主体间利益的相对平衡状态。因此,在充分了解各方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需要健全利益平衡制度,促使高校、企业和乡村的利益实现程度呈现均衡状态。最后,还要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利用常态化、动态化的考核方法,将协同参与主体的主体参与度、目标完成度、群众满意度纳入考核评价范围,逐步构建以“职教兴农”考核结果为导向的奖励和问责机制,进而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发展成效。

(四) 运行协同为纽带,提升系统运作效能

在协同推进“职教兴农”的过程中,想要达到整体系统高效的协同运行,就需要多元主体间达成多向互通的信任状态,并且都自觉促使自身嵌入集体行动的网络之中。首先,依据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做好责任分担。依据图1,政府作为领导者,承担起供给公共服务的职责,职业院校作为主导者,要承担起专业化人才培养的职责,企业作为参与者,要积极提供资金及产教融合平台,形成多方主体各司其职,高效协同的有机系统。其次,搭建平等协商、协同运作的平台载体。可通过创建“乡村振兴协商议事会”“职教兴农行动”等组织平台,来推进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交流,达到互信共赢的关系状态。最后,搭建多元主体集体行动的协作网络。依托“美丽乡村建设”“万企兴万村行动”等政策行动,在项目合作中探索项目共建、利益共享、经验共推的多样化的协同运作路径,形成多方主体间集体行动的链合关系网络,不断提升协同系统的运作效能。

四、多元主体协同助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 以目标协同为核心,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聚合力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复合型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其本身蕴含着宏观的总体性目标,指向产业、人才、组织、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振兴;另一方面,对于“职教兴农”来说,乡村振兴在现实发展中又蕴含着“微观的目标体系”,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建设美丽乡村等等。因此,在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多方主体自身的行为目标与实现“职教兴农”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在横向联动的过程中找准目标衔接点,强化目标协同意识。在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多元主体要在具体的项目合作中不断优化一个个阶段性子目标,在一次次的通力合作中形成共同的目标价值导向,从而发挥出多元主体助力“职教兴农”的最大聚合力。

(二)以组织协同为重点,发挥党组织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力

在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和乡村的多元协同关系构建中,最重要的驱动主体和联合载体就是党组织,多元主体间基层党组织的对接与联合是实现纵横融合的黏合剂。依据现实需要,以联合党支部作为“职教兴农”的实践载体,按照“党建引领,多元共建”的思路,通过共建“校地党建共同体”,发挥党建引领政、校、企各方协同作用,开展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合作。依托协同共建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输出、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功能,职业院校在农业技术支持、人才供给方面的潜力,企业在盘活乡村资源、带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在赋能乡村振兴发展上实现从单向输出转变为多向循环。其中,职业院校作为“职教兴农”的主导者,要结合乡村振兴的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院校内与时俱进地设立综合性的领导机构,积极搭建大学生乡村振兴“党建+创新创业”红色产学研基地等。进而,充分发挥各类平台载体的组织力、引领力。

(三)以要素协同为抓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力

在政府、职业院校、企业、乡村等多元主体间涌现着多种要素,不同要素之间要实现互嵌融合才能更好地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创新力。在实践中,需要建立平衡供需各要素的协同系统,在

推动“三农”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于农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职业教育作为供给方,其专业设置、实践育人模式等教育要素需要依据乡村发展的新需求而不断优化调整,真正做到精准供给。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中,科技创新是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生产力,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要联合推进“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既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协同系统中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又要发挥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中加速器的功能。只有多元主体在人才、资源、技术等核心要素的供给方面做到协同共享、高效整合,才能真正提升“职教兴农”的適切性和创新力。

(四)以机制协同为支撑,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力

机制是否健全、是否具有协调性,是检验和衡量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发展质量的强有力抓手。职业院校要立足于当地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协调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的实效性出发,不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力。一是要健全纵横贯通的协调机制。凭借政府的领导力,依据客观需求调动高校、企业与乡镇基层党组织的结对共建,建立“1+N”的党建协作机制,优化多元协同合作网络。二是构建激发人才流动的激励机制。高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智囊团,需要激发院校内部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最大动能,这就需要将服务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效纳入高校职能部门和党建的各类考核和规划之中。三是构建多维度的评价机制。对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成效的评价应该坚持多维度的评价标准,既要凸显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又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功能。从职业教育与乡村经济发展需求匹配度、服务贡献力、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维度创新评价指标,以“去中心化”的理念搭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实践育人模式的改革、职业资格证书的开发等,多维度优化“职教兴农”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各类协同机制,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调动内生积极性,助推资源要素多向流动,不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

参 考 文 献

- [1] 刘瑞明. 涉农高职院校助力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与实施路径探究[J]. 陕西农业科学, 2024, 70(7): 1-6.
- [2] 彭洪莉, 朱德全.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多维演进与未来图景[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42(19): 31-40.

- [3] 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2024-07-21) [2025-06-20] <http://www.xinhuanet.com/20240721/62ea30d40ef44ef7af63449446179b86/c.html>.
- [4] 卢飞,赵闰. 村企协同与双向增能: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4):26-36.
- [5] 黄巨臣,刘畅. 地方高校促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协同机制构建[J]. 教育科学,2024,40(6):88-93.
- [6] 彭小霞.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J]. 湖北社会科学,2019,32(9):58-65.
- [7] 年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战略的演进特征及其内在机理[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7(4):29-38+51.
- [8] 陈文海. 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的协同创新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39(12):29-31.
- [9] 陈包.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实践困境和行动路向[J]. 当代职业教育,2022,12(1):73-80.

Logical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ynergies

Jiang Mengyuan

(Zhejiang Tongj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two-way interac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issue in the era.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various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achiev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to play the unique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action entit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oving towa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From a perspective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Focus on three dimensions: role positioning,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to clarify the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arty entities. Analyze the operational logic among multi-party entit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goal collaboration, interest collaboration,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oper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enhancing the cohesion, leadership, innovation, and guarantee capabilit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multifaceted synergy; operational logic; realistic paths

【高职教育教学】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育人现实挑战与对策探究

刘泽原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变革在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文章通过对高职学生在信息获取方式、价值观冲突以及网络主体行为等方面思想行为特征的分析,揭示了当前思政育人工作在传统教育模式、网络空间引导、舆情应对以及教师队伍素养等方面存在的挑战,探索搭建“互联网+思政”全媒体教育平台,以网络媒体工具为手段,将思政育人工作与全媒体深度融合,推进思政育人工作信息化发展,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全媒体;高职院校;思政育人;现实挑战;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43-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全媒体时代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高等院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命线。对于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而言,思政育人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对于成长于互联网环境、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高职学生而言,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学习习惯、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都深受全媒体环境的影响。这促使传统的高职思政教育工作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与转型。然而,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在生源结构、学生学习特点、育人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其特殊性,这使得其在应对全媒体冲击时面临的挑战更为独特和复杂。

一方面,传统的单向灌输及课堂说教模式导致教学效能衰减;另一方面,多元、海量、即时的网络信息极易对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冲击和误导。因此,全媒体时代对于高职院校传统的思政育人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的推进应以构建多维协同育人体系为核心,以网络素养教育和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为抓手,加强思政育人工作创新内容探究,充分完善舆情引导机制,提升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有效性与针对性,为高质量开展思政育人工作夯实基础。

一、全媒体时代高职学生思想行为特征分析

(一)信息获取碎片化

全媒体时代,高职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客户

收稿日期:2025-04-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双高计划”背景下“五大工程”文化育人模式的实践和探索——以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群学生为例(项目编号:2024XKTI8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泽原(1991—),男,陕西西安人,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端、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快速浏览信息,而不是通过传统的书籍或深度报道来获取信息。这种信息获取方式虽然快捷方便,但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学生往往只能获取到零散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导致知识体系不完整,难以形成全面的认知和深刻的思考。许多学生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获取新闻资讯,但这些平台上的信息往往经过简化或加工,缺乏背景信息和深入分析。学生可能会了解到某个事件的表面现象,但对其背后的原因、影响和复杂性知之甚少。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不仅影响了学生的知识积累,还可能导致他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片面化,缺乏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 价值观多元化冲突

在全媒体时代对学生思想观念影响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网络带来的信息爆炸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学生作为网络的高频使用者,在接收海量信息的过程中,其认知模式、价值判断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特征使得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中交织碰撞。高职学生在接触这些多元化的价值观时,容易产生认知困惑和价值取向摇摆。一方面,他们受到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自由主义思潮等的冲击。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化冲突可能导致学生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上出现困惑和矛盾。一些学生在网络上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可能会对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怀疑,或者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不仅影响学生的思想稳定,还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缺乏明确的立场和判断标准。

(三) 网络依赖与行为失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高职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部分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虚拟世界。这种网络依赖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还可能导致学生行为失范。一些学生表现出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等不良行为,影响了网络媒体环境的健康和谐。网络成瘾问题在高职学生中尤为突出,许多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媒体上,忽视了学业和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他们可能会因为沉迷其中而逃课、熬夜,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身体健康受损。此外,网络成瘾还可能导致学生与现

实社会的脱节,影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

二、全媒体背景下高职思政育人工作的现实困境

(一) 传统教育模式滞后性凸显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单向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教育方式在全媒体时代显得尤为滞后,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互动化的学习需求。全媒体背景下,学生作为信息与内容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更加习惯于自主获取信息、互动交流和即时反馈,而传统的教育模式缺乏灵活性和互动性,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不高。这种单向的灌输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可能会因为缺乏参与感和互动性而对思政课程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学习效果。

(二) 全媒体空间主体性困境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内容的创作者和接受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学生在网络媒体空间中的主体性增强,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行使主体权利,避免行为失范,成为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的重要课题。一些学生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当言论,甚至参与网络暴力行为。这种网络行为失范不仅影响学生个人,还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影响网络环境的健康和谐。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加强对学生的网络行为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规范网络行为。

(三) 舆情应对能力不足

全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受众的一体化,放大了个体传播的话语权。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载体,全媒体的即时性、多角度、范围广等特点使得网络舆情事件频发,高职院校在面对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时,往往反应迟缓,缺乏有效的引导和处置机制。这种应对能力不足可能导致舆情事件升级,影响学校声誉和学生稳定。近年来,高职院校学生之间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相关视频和言论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广泛关注。由于学校未能及时回应和处理,舆情迅速发酵,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情绪稳定。这种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高职院校中较为普遍,亟须加强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建设。

(四) 教师队伍教育手段单一

全媒体时代,思政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新媒体工具使用水平,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开展思政教育。然而,一些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思政育人工作。具体体现为思政课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其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教师本身的人格魅力以及教师所具有的亲和力等。并且一些思政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开展在线教学等方面存在困难,难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和技术手段提升教学效果。这种媒体素养的短板不仅限制了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效果。由此,高职院校需要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媒体应用的培训,以适应全媒体时代的教育需求。

三、“互联网+思政”全媒体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维协同育人体系

全媒体时代,构建多维协同育人体系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效果的核心。通过搭建融媒体育人平台整合校园网、公众号、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构建集信息发布、思想引领、学习互动、服务保障于一体的校级融媒体中心,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同时,利用大数据开展精准化智慧思政,分析学生网络行为、消费习惯、课堂表现等数据,精准描绘学生“数字画像”,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困惑和异常动态,实现个性化、预警式的精准干预和辅导。在日常教育管理中推广项目式、场景化教学模式。围绕社会热点、校园事件等设计思政项目,引导学生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调研、创作和传播。将育人场景从教室扩展到宿舍、实训室、企业,实现思政教育的生活化、场景化。通过“线上+线下”全媒体教育模式,形成全方位育人格局,从而有效提升思政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创新内容供给方式

全媒体时代,创新内容供给方式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效果的重要手段。网络媒体信息丰富多彩,获取起来也非常便捷,因此逐渐成为高校不少教师教学内容的重要补充来源。思政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开始不断加速,并且变得愈发有效。通过运用微课、慕课、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发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的思政教育内容,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参与度。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

技能教学、实习实训、工匠精神培育、职业生涯规划中,讲述职教故事、宣传劳模事迹、弘扬工匠精神,增强内容的亲和力和归属感。通过大力开发思政微课、思政短视频、动漫、VR实训等融媒体产品,使思政教育“活”起来、“动”起来。同时增加设计话题讨论、投票评选、主题创作等互动环节,引导学生从被动接收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和内容共创者,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和价值内化。

(三)强化网络素养教育

全媒体时代,强化网络素养教育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效果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对高职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批判思维和自我管理能力。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全媒体网络媒介素养课程,将其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网络媒介素养知识,包括网络信息的特点及传播规律、网络道德、网络安全、信息辨别等。有效帮助大学生筑牢思想防线,抵制新媒体负面信息及不良媒体错误诱导,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能力,强化大学生思政知识学习自主意识,提升大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习思辨能力。由此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网络素养,也能极大促进网络环境的健康和谐。

(四)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

全媒体时代,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效果的重要方式。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师要树立“四全媒体”理念,构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媒体平台矩阵,拓展新媒体的多维功能。例如,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支持和鼓励优秀教师、辅导员、学生骨干成为“网红大V”,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声,凝聚粉丝、引导舆论,打造校园正能量“网红”矩阵。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可以在多媒体课件制作、在线教学平台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等方面提高教师使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思政育人的能力,从而提升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五)完善舆情引导机制

全媒体时代,完善舆情引导机制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效果的重要保障。首先,通过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和筛选体系,构建安全的舆论环境,牢牢占据网络舆情高地。其次,学校要做好全媒体信息管理和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舆情监测机制,成立舆情应对团队,负责监测网络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和应对舆情事件;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正面引导等方式,及时回应学生关切,加强正面引

导力度,从而不断提升学校舆情应对能力。

四、结语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对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而言,既是“冲击者”,更是“赋能者”。全媒体时代的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工作应在有效分析学生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做好教育模式及教学方法的优化,充分推进思政育人实践工作高效化开展,进一步借助全媒体发展的信息优势及平台优势,为高校思政工作的实践提供技术手段支持,发挥新媒体平台、新媒体技术在育人培养方面的应用优势,强化全媒体时代高

校思政教育实效性,满足全媒体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育人创新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总之,高职院校绝不能抱残守缺、被动应对,而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刻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和新时代高职学生的成长规律,勇于进行自我革命。要坚持理念创新、内容革新、方法更新、队伍升级和生态优化多管齐下,推动思政育人工作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切实提升思政育人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培养出大批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2019(06):5-6.
- [2] 姜永航,吴瑶.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A].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 铸魂育人·融合创新:思政、党建与文化文艺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 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2024.
- [3] 叶琪瑛. 网络语言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及思考[J]. 武夷学院学报,2011,30(04):90-92.
- [4] 王玉良. 新形势下有效开展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20):120-121.
- [5] 唐林萍. 融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工作创新路径探析[J]. 新闻研究导刊,2024,15(05):194-196.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ra of All-media

Liu Zeyuan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ll-media era characterized by "entire process, holographic, all personnel, and all efficiency" has arrived.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also presents unprecedented severe challe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ethods, value conflicts, and online behavioral pattern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llenges existing in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aspects such as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online space guidance,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ing staff. It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e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l-media education platform, using online media tools as a means, to deep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with all-media,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and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fostering talents.

Key words: multimedi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高职教育教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价值意蕴、 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程恩思 刘 前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66)

摘要:劳动精神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动力。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力量,对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既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生群体思想道德的升华,又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复合型人才。针对目前大学生在劳动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应从提高大学生自身培育的主体作用、夯实家庭培育的基础作用、发挥高校培育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培育的协同作用四方面构筑育人体系。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47-04

劳动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劳动实践过程中凝练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键构成,更是中国精神的生动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这一号召使劳动精神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其劳动精神的塑造,直接关系到个人成长,也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这一部署强调五育并举的有机融合。劳动精神培育对大学生的成

长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有效塑造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在劳动实践中能够主动提升劳动技能,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

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价值意蕴

(一)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新时代,中国正跨步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强化劳动精神培育已成为新时代育人范式转型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这一过程既是完善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育人框架的重要维度,更是建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的关键路

收稿日期:2025-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中华耕读文化融入涉农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3JDSZK02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2024年研究课题“新时期农林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4-NLZX-YB137)。

作者简介:程恩思(1985—),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刘 前(1998—),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径。当下,中国正意气风发地朝着“中国智造”目标前进,推动经济朝着高质量以及高水平层次发展,中国亟需一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力队伍。在此背景下,劳动者素质提升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发挥劳育的潜在效用,才能使得大学生既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又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新时代高素质劳动大军,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二)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高校作为履行育人使命的核心实践场域,其本质属性在于通过劳动教育的价值建构功能,培育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过程中,劳动精神的涵养功能为高校实现德育目标提供了具象化的实施路径。一方面能进一步强化思政教育的育人成效,另一方面为思政教育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提供了极具实效性的路径。新时代劳动精神源于社会生产实践,承载着求真务实、拼搏奋进等传统美德。高校进行劳动精神培育的目标是让大学生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念,使其有意愿地主动进行劳动创造,饱含激情地投身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开拓人生的广阔天地。

(三) 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时代的大学生已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对这一群体开展系统的劳动精神培育,既是落实“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德才兼备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精神的培育是联结人的全面发展的纽带,从道德品质、实践技能、创新思维等多个维度发力,为大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并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显著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能够锻炼动手能力,促使知识与技能实现高效转化,积累解决实际问题的丰富经验,持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生力量,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现实困境

(一) 大学生主体能动性不强

新时代的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象牙塔”中,辨别风险能力较弱、抗诱惑能力较差,部分大学生容

易受到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及奢靡之风的影响,扭曲了个体的劳动价值观念,产生了功利化的劳动意识,参与劳动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得奖金、学分以及有面子炫耀。若劳动实践活动没有上述“好处”,则出现学生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强等现象,即使要求强制参与,部分同学只是“走马观花”,更有甚者花钱找同学代替完成劳动课程或者劳动实践。由此可见,大学生在功利心驱动下,过度看重劳动带来的物质酬劳,缺乏积极学习劳动精神、践行劳动精神的内生力,未正确认识到参加劳动实践活动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 家庭劳动教育存在缺位

正确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对大学生劳动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多数家长认为“分数至上”“学而优则仕”,将子女成才标准简单异化为考好学校、找好工作。部分家长一味认为,体力劳动就是脏、累、赚钱少和社会地位低。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影响下,智育成为家长日常对孩子耳提面命的主要输出内容,在育人价值认知层面形成发展维度遮蔽,系统性地忽视了劳动精神培育对主体性建构和社会化进程的教育价值,实质造成了劳动教育生态位在个体成长谱系中的结构性缺失。此外,家庭代际支持体系的完善导致了学生的劳动实践机会减少,形成“四体不勤”的生存状态,使学生很难深刻领悟劳动的内涵,极大地削弱了劳动精神的培育成效。

(三) 高校培育力度有待提升

一方面,培育课程内容局限。部分高校在劳动精神培育的教学过程中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过度依赖说教式教学,忽视对劳动行为的引导与训练,使学生出现“知而不行”的现象。此外,对于劳动教育的实践课程内容仅停留在参与体力活动、卫生活动等简单层面,这类低层次的实践活动,对于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缺乏系统认识,劳动实践课程内容难以适应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培育实践场所缺乏。目前,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域多局限于卫生保洁、校园维护等传统项目,缺乏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的复合型实践平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受场地资源、运营成本等因素制约,现有基地普遍存在课程设计同质化,与教育目标相匹配的本土化和创新化的劳动实践基地供给不足等问题。

(四) 社会培育环境濡染不足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输出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动摇着劳动伦理的社会根基,使大学生陷入“为消费而劳动”的异化循环。各种社会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网络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通过“流量变现”逻辑重构了价值生产体系,使劳动价值判断趋向功利化。尤其部分不良网络媒体唯利是图,为了博得更多关注,鼓吹“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肤浅价值观念。同时,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形成信息茧房,强化对劳动价值的片面认知,使得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极易受到这些负面内容的影响,导致职业观和劳动价值观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其做出正确的劳动选择。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续发展需要劳动精神为青年一代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支持。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从大学生、家庭、高校以及社会四方力量协同持续为培育劳动精神注入活力。

(一)提高大学生在培育中的主体作用

在劳动精神培育体系中,大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对劳动精神的培育成果以及践行劳动精神的主动性影响显著。作为肩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命的大学生应深刻认识到劳动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觉学习劳动理论知识,构建系统的劳动理论知识体系。同时,要提升对现实生活中错误劳动观念的辨别和抵御的能力,需秉持反思精神,识别各类不良思潮和错误劳动观的别有用心,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交互过程中,汲取知识、积累经验,逐步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体系。

实践出真知,将劳动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是实现劳动精神深度认知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大学生应自发参加公益志愿服务劳动,让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服务社会。在此过程中,大学生能够亲身体验不同的劳动场景,深化对劳动精神内涵与价值的理解,在反复实践中提升劳动技能,增强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需自发参加日常生活劳动。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最广泛的日常生活劳动是家庭和学校所提供的,要保持家庭与学校的密切联系,让家长和老师成为学生进行劳动实

践的引领者和协助者,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生活技能,积累生活经验。

劳动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一致,涵盖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看法和认识,反映了劳动者的具体态度,影响着具体的劳动实践。作为新时代“劳动者预备役”的大学生,要在思想层面对劳动有高度的认同感,在规范自身的劳动行为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本质上是劳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具体表现,通过劳动场景中的知识应用,大学生可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性认知。

(二)夯实家庭在培育中的基础作用

迈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要重言传、重身教,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深刻映照出父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重要性。父母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得,将正确劳动观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孩子,自觉承担起教导大学生形成正确劳动观的重任。同时,鼓励孩子同家长一起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家长要秉持着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投身劳动实践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增强劳动技能。

建立正确的劳动教育理念一方面需要家长认识劳动的本质、明确劳动的作用、理解劳动的益处,摒除以往错误、功利的劳动观念,认同劳育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厘清劳动与学习的关系,不能将劳动简单视作体力劳动而摒弃。因此,家长须清晰认识到劳动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动员大学生积极参与到日常家庭劳动中来,身体力行感知劳动不易,增强对劳动的认同。另一方面,须重视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勤劳的家庭环境氛围是孩子养成良好劳动习惯的优质“孵化器”,这要求在日常生活家庭中,家长根据孩子的爱好与特长为其制定相适的劳动计划以及劳动机会。

家风是家族或家庭世代沿袭相传至今的风尚、作风和风气,优良家风有利于涵养大学生的高尚品德,更有利于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精神。一方面,营造浓郁的家庭劳动氛围。充分挖掘家族文化中的劳动教育资源,通过讲述家族劳动故事、展示祖辈劳动成果等方式,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融入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以家风化社风,

以家风树新风。另一方面,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个人性格品行的塑造,家庭环境起到了根基性作用,家长在劳动教育过程中需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分工,明白劳动从无高低贵贱之分,任何职业都闪耀着“劳动最光荣”的光辉。

(三)发挥高校在培育中的主导作用

要推动高校劳动精神培育走向规范化发展轨道,需从多维度构建彰显学科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一方面,高校应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坚持标准化原则,即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合适的教育内容、科学的学时学分、全面的考核评价等完备的课程标准。各类高校应结合学校特点和实践资源优势,成立专业的师资队伍,开发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另一方面,课外劳动活动是劳动教育课的补充及延伸,通过创设生活场域劳动项目集群的多样化形态,构建起浸润式劳动育人场景,使其在劳动情境中实现“劳动认知—技能—态度”的三维提升。

校园文化建设在劳动精神培育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充分利用校园硬件与软件设施,多渠道宣传劳动精神,营造热爱劳动的文化氛围,将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给学生。同时,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微博超话、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讲好劳动故事,引导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正确的劳动观熏陶。此外,深挖高校自身的劳动精神培育资源。各高校需深耕自身独有劳动文化,促进劳动育人元素的展现。通过挖掘校园中的先进榜样,将爱岗敬业的教师代表和热爱劳动的学生的优秀事迹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宣传,让学生认识到劳动先锋模范不仅在视频中也在自己身边。

高校劳动教育的组织管理机制需建立自上而下的校级、院级劳动教育管理部门,把握好劳动教育全盘统筹工作。高校应设立专项领导小组,制定匹配各类高校实际情况的中长期劳动教育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一方面,通过组建劳动教育名师教学小组以及开设劳动教育研究室等方式,确保学校劳动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序实施。此外,构建专职与兼职相互补充的师资体系。高校可吸纳企业骨干、先进劳动者参与到劳动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来,组建兼职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配齐劳动实训教师和实训设备,合理规划劳动教育相关经费,设立相关专项经费,积极为大学生参加生产性体验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提供劳动锻炼的机会。

(四)强化社会在培育中的协同作用

在新时代以文化人的浪潮之中,须以文化为载体,加大优秀劳动主题作品展播力度,引导学生积极向劳模看齐,自觉投身劳动实践,让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劳动精神。一方面,在受大学生群体欢迎的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兴媒体平台,充分运用技术创新传播媒介,弘扬时代主旋律,展现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精神的纯粹与坚守。另一方面,树立社会各行业劳模、工匠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网、央广网等官方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典型事迹,积极传播劳动主流价值观。

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培育劳动精神离不开尊重劳动的网络环境。一方面,加强对网络媒体平台的监督与管理。面对网络监管端的缺失,政府及网络媒体平台要做好信息准入的监管员,协力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严禁传播各类不良信息和低俗内容,从源头上阻断错误信息和内容的传播,纠正具有偏差的劳动价值观念,为大学生塑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增强培育劳动精神的主流舆论导向。创新劳动精神的表达方式,切实发挥主流传媒价值导向作用,弘扬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等主流价值观,借助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劳动榜样、弘扬劳动文化,引导大学生在学习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中锤炼尽职尽责、不屈不挠的劳动品质。

拓宽劳动的社会实践场域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场所是培育大学生劳动精神的必由之路,要推动政府支持拓宽劳动实践场所的政策落地,并为其在相关执行过程中保驾护航。同时,在加快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场域和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同时应最大程度上通过联合企业,需协同社区、医疗机构、公共文化机构等事业单位建立联动机制。另一方面,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需提供服务性劳动实践平台。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应大力支持大学生自主参加公益服务性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去敬老院、福利院、孤儿院及特殊教育学校等场所进行公益志愿服务,让大学生在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服务工作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强化劳动精神。

(下转第55页)

【高职教育教学】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挑战与对策

张婷婷 王尚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一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培育新质人才为核心、以资源高效配置为路径、以主体高度协同为关键的开放。为破解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合作环境复杂性、职业教育资源局限性和职业人才培养缺乏科学性等挑战。文章提出应通过构建国际合作新生态、丰富职业教育资源和完善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等策略,以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教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51-05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教育的开放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是国家教育实力的一种间接反映。而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教育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教育强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和资源配置,而是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实践性,强调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对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立足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内涵为根本出发点,剖析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挑战,积极为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对

策,推动职业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实现更高层次对外开放。

一、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

(一)以培育新质人才为核心

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第一,拥抱先进教育理念的开放。教育理念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理论引领,先进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个性化、多元化和终身学习,是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核心要求。第二,接纳严苛的教育标准开放。教育标准开放是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也是国家制度层面的要求,旨在确保学生具备既定能力素

收稿日期:2025-04-01

基金项目:2024年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社区教育在线课程设置与课程建设探究”(项目编号:JSS-C-2024028);2024年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生态学视角下教师共同体构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C/2024/01/95)。

作者简介:张婷婷(199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

王尚(1993—),女,河北保定人,江苏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养。我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实现与国际先进教育体系对接并推动职业标准互认,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显著拓宽国内职业教育学生国际认知及就业途径,还能够强化我国职业教育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国际影响力,助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三,对标国际化师资质量的开放。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涵盖教师学历背景、年龄结构、职称分布、名教师比重等重要内容。我国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并不断完善师资结构,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要求。

(二)以资源高效配置为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核心诉求转向高水平开放,关键在于实现教育资源配置与管理机制双重提升。一方面,高质量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资源涵盖人力、物力、财力等有形资源,以及教育政策、制度等无形资源。共享高质量教育资源对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意义重大,能加强与国际先进职教机构交流合作以引进优质资源,提升我国职教整体水平与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相关学校既要引进国外先进的职教理念、教学方法与管理经验,也要推动本土职教优秀成果走向国际,实现双向交流共享。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机制开放。教育管理机制是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建立的对教育组织管理的制度总和,是教育体制运行保障。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质是完善管理机制以推动国际化进程的战略举措,是职教机构融入全球经济与教育体系、提升竞争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职业教育借此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管理体系以保障国际交流顺畅,显著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影响力。

(三)以主体高度协同为关键

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突破传统单一主体局限,构建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素聚合系统,加速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第一,政府、学校与企业协同开放。新质生产力推动下,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紧跟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强调三方紧密合作。政府作为引领者,深化与国际职教机构合作并完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这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首要环节。学校作为参与者,引进国外先进课程与教学方法,提升教育质量,成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企业作为落实者,与职教机构合作培养符合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是职业

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步骤。第二,国内与国际协同开放。国内与国际职教协同合作是我国与不同国家、地区在教育领域交流、合作、分享资源的过程。各国通过这种合作实现职教理念、方法等方面交流互鉴,共同促进职教发展与进步,有效提升职教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家层面,高水平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意味着深化职教体系内部改革创新,能够提升质量与效益,为国际交流合作筑牢基础。在国际层面则要求我国职业教育积极融入全球教育体系,推动职教成果国际互认,提升我国职教国际影响力。第三,校际协同开放。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基于校际协同的深入开放模式,强调不同职教机构跨越地域、文化界限的紧密合作。各职教学校通过共享资源、互派师资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效率,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二、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合作环境具有复杂性

随着全球化推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合作环境愈发复杂。首先,政策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职业教育政策导向、法规要求及监管标准上差异显著,给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带来阻碍。各国为保护本国职教市场,可能出台更严格的签证政策以加大对外资教育机构限制,从而增加国际合作项目的难度与风险。其次,市场环境具有波动性。新质生产力发展促使全球职教市场竞争加剧,各国教育机构纷纷提升教育质量以抢占市场。发达国家国际职教机构凭借先进理念和丰富资源占据优势,给我国职教机构带来竞争压力。同时,产业变革使职教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新兴产业崛起对新型职业技能人才需求大增,导致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匹配难度增大。最后,语言文化存在障碍。不同国家和地区语言差异较大,使得语言障碍极大影响师生之间顺畅交流、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以及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使得职教机构开展国际合作时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语言培训和翻译,从而影响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此外,不同文化背景在教学方法、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易导致合作沟通出现理解偏差,影响国际合作效果,进而制约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二) 职业教育资源存在局限性

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局限性已成为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制约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因素。第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职业教育资源相对充裕,能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满足当地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影响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同时,城乡间职业教育资源分配差距较大,城市学校资金投入多、教学条件好,农村地区则因经济落后面临资源匮乏等问题,不利于职业教育水平提升,进而阻碍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二,教育设施与师资条件受限。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先进技术和设备支持,但目前职教机构的教育设施和实训设备普遍陈旧,无法满足学生发展需求,导致所学与实际产业需求脱节。此外,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教师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我国职教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短缺,影响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难以培养出符合要求的高质量职业技能人才,不利于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三,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滞后。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职业岗位内涵和要求不断变化,但部分职教机构未能及时跟进,课程设置陈旧,缺乏对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关注,难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使学生所学难以适应实际工作,不利于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三) 职业人才培养缺乏科学性

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对职业人才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目前我国职业人才培养缺乏科学性,难以满足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求。一方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紧密贴合产业发展需求,然而部分职教机构目标定位不准确,造成与市场存在脱节情况。学校制定培养方案时,未深入调研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致使学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就业难度增加,影响对外开放水平。而且,部分机构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技能培养,学生理论有余而实践操作能力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不利于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校企合作与产学研结合不紧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要求职教与产业深度融合,但我国职业教育在产学研结合上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企业认为参与职教会增加运营成本且短期难获经济效

益,所以积极性不高,使得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广泛,影响高质量职业人才培养。此外,职教机构与科研机构合作效率低下,职教机构科研能力弱、不重视科研创新,难以将最新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和实践,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效率低,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阻碍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对策

(一) 构筑全球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促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应推动构建国际合作新生态。首先,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有关部门应主动与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及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常态化政策沟通机制,通过政策沟通消除合作障碍并增进互信,共同研究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战略规划、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坚实政策保障,促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次,提升市场布局多元化。有关部门应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拓展国际合作领域和范围,构建多元化市场布局。我国职业教育机构应与国际知名企业、行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国际交流等活动,提升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最后,强化语言文化交流与合作。相关部门应积极举办国际文化节、学术论坛等活动,搭建中外师生交流与互动平台,增进中外师生之间了解与友谊,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促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 扩充优化职业教育国际化资源库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资源丰富程度成为直接影响职业人才培养质量与效率的关键。第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行业趋势,合理调配资金、设备等资源,特别是对具有国际竞争力或区域特色的优势学科和新兴专业给予重点扶持,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第二,提升教育设施与师资水平。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职业教育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引入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学习环境,从而推动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有关部门还应通过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教师海外研修以加强对本土教师的国际化培训,提升跨文化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和专业素养,为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动力。第三,更新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要求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因此,有关部门应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机构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知识和实用技能,以满足市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效果和学习成果,助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三)健全职业人才国际化成长体系

随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完善职业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实现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有关部门应通过积极引入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指导职业教育机构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打造既与国际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和行业要求,为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和监控,通过建立严格的质量监控与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为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另一方面,深化校企合作与产学研结合。有关部门应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机构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通过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结合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实现教育资源与生产资源优势互补,提升职业教育实践能力,助力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相关部门可以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机构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动建立校企共建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新型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和创新创业机会,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层次。

参 考 文 献

- [1] 强晓华.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路径研究[J].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24(2): 26-30.
- [2] 张慧波. 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与全球话语权的持续提升——2024年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新进展[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2): 49-54.
- [3] 李晓娟.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价值、逻辑与路径[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4, 39(5): 13-21.
- [4] 莫玉婉. 深化国际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J]. 北京教育(高教), 2025(2): 17-20.
- [5] 朱德全, 曹渡帆. 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数与区域比较[J]. 教育与经济, 2024, 40(5): 3-14.
- [6] 黄梅雪, 李俊. 我国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反思与实践进路——基于对职业教育服务中非产能合作的思考[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 64-71.
- [7] 门超, 方绪军. 高水平对外开放视域下职业院校在地国际化的三重逻辑、现实挑战、实践路径研究[J].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2(3): 100-105.
- [8] 李燕, 王校伟, 景蕾. 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三位一体”发展体系探究[J].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24(4): 53-56.

The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level Opening-up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Productive Forces

Zhang Tingting, Wang Shang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closely link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an educational power 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level opening-up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entered o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talents, based on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key to achieving high-level opening-up lies in the high-level collaboration of the main bod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the limita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ity in voc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faced by high-level opening-up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cosystem, enrich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vocationa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 level; education power

(上接第 50 页)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01).
- [3]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2018-09-11(01).
- [4] 习近平.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12-12.
- [5] 金梁,胡劲生.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略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6):81-83.

The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the Labor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heng Ensi, Liu Qian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66)

Abstract: The spirit of labor, a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is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s a solid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labor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le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of the student group, but also reserve a pool of versatile tal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lab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teaching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enhancing the main role of self-cultivation by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family cultivation, exerting the leading role of university cultivation, and intensifying 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social cultivation.

Key words: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spirit of labor

【青少年论坛】

当代青年“零糖社交”的流变逻辑与风险规避

刘大勇 朱悦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零糖社交”作为新兴的社交范式,逐渐成为现代青年碎片化时间的社交选择。随着生产生活方式演变及社会流动加速,人们从寻求他人认可转向自我认可,社会关系由“强关系”让渡“弱关系”,社交方式从“传统社交”向“轻量化社交”演进。“零糖社交”具有轻松、无压力、无复杂利益关系特点,但也有双面效应。青年若无法合理“控糖”,将会导致其社交圈层收缩、孤独感强化、自我中心与认知窄化、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固化等。因此,需正确认识并理性分析其不足,引导青年健康社交,树立开放包容的交友观。

关键词:当代青年;零糖社交;轻量化社会;强关系;弱关系;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56-04

随着时代变迁,青年社交呈现出“在场”到“在线”的转变、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迁移及从“沉重”到“轻盈”的转型。根据社交平台 Soul,Just So Soul 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当前“零糖社交”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热烈的追捧。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仅 7.5% 的年轻人不喜欢和他人互动、偏好独处,这也意味着,超过 9 成年轻人向往在一对一或多对多等场景,和他人互动,获得友谊和陪伴。而在与朋友相处时间方面,当下年轻人每周平均和朋友相处 8.25 小时。从城市上来看,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和朋友相处时间最少,约 7.94 小时。“零糖社交”虽能短期提升社交舒适感,但过度“零糖”易缩小社交圈、加剧孤独、引发自我中心与环境敏感、加固“信息茧房”与

加速“过滤气泡”。因此,解析其演变机制、评估潜在风险,对引导青年树立开放交友观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把脉:零糖社交的流变逻辑

随着养生理念的流行,零糖食品成为健康消费符号,青年“控糖”需求延伸至社交中。传统社交问题致青年倦怠,技术媒介赋能“零糖社交”,推动其传播并形成亚文化。

(一)从“强关系”到“弱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人际关系网络划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网络成员特质相近、关系紧密,以情感联结为主,弱关系则反之。中国传统社会以强关系为主,而当今社会生产方式变

收稿日期:2025-04-22

基金项目:2023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3KSC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大勇(197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朱悦(1999—),女,河南商丘人,东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革、城镇化推进及互联网发展,为弱关系构建提供新契机。

首先,生产方式发展冲破“强关系”血缘限制。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随着生产力提升与分工细化,逐渐打破血缘对生产的束缚;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人口流动,削弱血缘地域依赖;商品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关系多元化,打破血缘交往模式。其次,新型城镇化瓦解“强关系”地缘壁垒。人口流动重构以职业、兴趣为核心的“弱关系”社交网络;制度创新减少地域依赖,推动跨区域协作;技术赋能突破空间阻隔,形成虚拟社群。最后,互联网技术迭代强化“弱关系”。互联网降低社交成本,青年得以低成本拓展“弱关系”;算法推荐精准匹配趣缘,提升“弱关系”联结效率;互联网催生新型互动形式,为“弱关系”趣缘联结注入活力。

青年社交经历“血缘—地缘—趣缘”三重裂变,实现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转变。然而,过度倾向“弱关系”可能削弱青年对亲属的情感需求,弱化亲属情感纽带,甚至引发“断亲”现象。

(二)从寻求他人认可到注重自我认可

物质与精神生活提升,青年社交以自我满足为前提,追求个性化自洽,不再盲目求认同。“零糖社交”在青年中逐渐流行。

首先,从社交范围来讲,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形成封闭社交,个体压抑自我以适应群体;互联网拓展青年社交范围,青年随自我认同深化,倾向摒弃低效社交,转与同好深交。其次,从社交目的来看,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零糖社交”主要满足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等高层次需求。在“强关系”主导的社交中,个体生存合作重他人评价;现代物质改善,个体转而追求精神满足与自我提升。最后,从社交模式来讲,“熟人社会”以“强关系”为基础,他人评价对个体形象地位影响显著;而“弱关系”社交情感联结浅,个体受他人认可的影响小,对外部评价的敏感度较低。

青年转向自我认可推动“零糖社交”流行,此模式利于个体内心成长,但过度自我认可或致忽视他人,降低团队协作。

(三)从“传统社交”到“轻量化社交”

哈特穆特·罗萨以“速度”为核心考察现代社会,提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科技发展节省时间、推动社会变迁加速,使生活步调加快;加速生活又依

赖科技处理事务,形成科技、社会变迁、生活步调三者的循环。“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加速背景下,传统社交关系发生变化。“零糖社交”在数字技术迭代与个体主体性觉醒时代背景下产生。

首先,零糖社交是科技进步的自然结果。科技加速打破传统社交的“时空体制”,数字技术超越时空界限,交往依赖移动通信和数字平台,构建自我隔离的社交空间,为个体提供精神避难所。其次,零糖社交是社会变迁的客观反映。社会快速变化导致关系建立和维持时间缩短,社会关系流动更迭,速度文化影响传统社交实践。数字技术重构青年联结方式,部分青年转向“轻量化社交”。最后,零糖社交是生活步调加速的无奈之选。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和社会流动加快,生活步调加速使个体时间匮乏,青年为节约“社交体力”,压缩社交时间,寻求低成本的情感价值获取方式。“轻量化社交”迎合了加速社会的社交心理,是自然发展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时代铸就青年特质,青年反哺时代进程。社交受社会环境制约,青年渐脱传统“强关系”,重心转向自我认可,构建“轻量化”社交。

二、问诊:零糖社交的流弊

“零糖社交”强化了青年情感自主性,重构了青年社交形态,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过度自我中心倾向与环境敏感性突出

“零糖社交”强化了青年主体认知,有助于其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和发展方向,但青年若不能精准把控,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零糖社交”过度深化可能催生过度自我中心倾向。过度沉浸其中易陷入自我中心认知偏差,削弱团队协作效能,引发人际冲突;强调“边界感”可能导致共情钝化,形成“情感茧房”;注重个人空间和自我价值实现可能放大个人利益,使社交功利化,损害社会适应能力,破坏群体协作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零糖社交”过度泛化可能削弱青年社交适应能力,使其更加敏感。浅层低频沟通导致情感感知异化,对关系变化异常敏感;强化自我保护意识与边界管理需求,引发防御机制过载,损害人际关系质量,削弱情绪稳定性;长期缺乏深度情感交流阻滞社交能力发展,使青年在传统社

交中产生回避,陷入敏感恶性循环。

“零糖社交”为青年提供了新型社交方式与自我表达空间,虽有助于培养独立、增强自我认知和促进个性发展,但也可能导致青年自我中心与高度敏感。

(二) 社交圈的缩小与孤独感的增加

关系主义认为个体需要通过关系与他人和社会相连,人类对深度情感联结的需求从未消解。在健康的社交关系中,理应保持强弱关系的平衡。

一方面,“边界感”量化困境致社交圈缩小。过度“零糖社交”会筑高社交壁垒,减弱人际联系,加剧社会疏离感,缩小社交圈层。从社会学视角,广泛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体至关重要,强关系社交地缘中邻里亲友构建互助网络,地缘瓦解削弱社会支持系统,个体遇困时援助减少,社会化进程迟缓,资源获取渠道收窄,制约个人及社区发展。另一方面,浅层次社会互动会增强孤独感。“零糖社交”缺乏深层次情感交流,无法满足人类归属感与亲密关系需求,引发孤独感攀升。同时,“零糖社交”易引发信任危机,抑制深度关系建立,弱关系无法给予切实、持续且强大的支持,低效、脆弱的关系会增加孤独风险。若无法把控“边界感”,孤独感加剧个人主义风险,青年易形成封闭小圈子,个人主义普遍化会带来孤立,加剧精神内耗,导致社会人际关系冷漠、社会信任瓦解。

过度追求“零糖社交”会加剧社会疏离现象和个体孤独感,最终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淡漠化及社会信任基础的崩塌。

(三) 加固“信息茧房”与加速“过滤气泡”

“信息茧房”是指个人或群体被包含在一个信息壁垒之内,自主或不自主地把所进行的信息选择行为固定在对前述特定种类信息的选择之内,进而在思想和情感方面产生对这一类信息的亲近和对其他类型信息的排斥,久而久之,人们在信息选择上愈发局限。“过滤气泡”是指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随时捕捉用户的偏好,并据此自动过滤信息,以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会使得每个人都身处一个独有的信息世界。“零糖社交”带来的自我封闭,不利于接收多元信息,阻碍青年发展。

一方面,过度“零糖社交”会导致认知边界收缩与群体极化。一是其浅层化使青年接收同质化信息,通过“回声室效应”,加剧圈层认知断层;二是形成信息闭环,降低信息获取广度与深度;三是

加固信息茧房,阻碍认知更新,引发价值极化与圈层固化。另一方面,媒体时代“零糖社交”的低频化交流与同质化信息为“过滤气泡”滋生创造条件。信息来源单一加速其形成,缺乏观点碰撞稳固边界,算法推荐致其膨胀;“边界感”的建立和深度社交的缺失,伴随着网络用户价值观的不断固化让青年被困在“过滤气泡”当中。虽然过滤气泡有助于缓解信息过载等问题,但会加剧信息窄化,使得信息茧房纵深发展,引发“群体极化”。

马克思交往理论认为,交往作为一种关系性范畴,“是人对人的作用,是一种主体之间一定的联系和关系”。青年过度“零糖社交”会强化“信息茧房”、生成扩张“过滤气泡”,加剧信息窄化并诱发“群体极化”。

三、开方:引导青年健康社交

“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适当的“边界感”助力青年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关系,为深度社交带来高质量体验。“零糖社交”需多维度考量,引导青年健康融入。

(一) 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促进文化正向融合发展

新时代青年受主流与局部亚文化双重影响,易产生认知困惑,影响社交及价值判断。“零糖社交”亚文化可补充主流文化,二者应正向融合。因此,引导青年健康社交需社会、学校、家庭协同共进。

首先,社会营造文化生态与搭建责任实践平台赋能青年主流价值观引导。避免“说教式宣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观;组织相关实践活动培育青年社会责任感与团队精神。其次,学校课程赋能与教师示范强化了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内化。开发“主流价值观与社交伦理”相关课程,引导青年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推动教师转型为“价值观示范者”,以“言传一身教”影响青年。最后,家风代际传承与涵育青年健康社交观助推主流价值观浸润。通过组织家庭聚会,温度传承,强化青年对人际关系的信任与情义认知;树立积极参与家风,破除情感淡漠困境。

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关系,需社会规制、教育赋能、家庭涵育三维协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挖掘传统交友观,善用亚文化引

领青年社交。

(二) 平衡强弱关系, 克服社交疏离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社交疏离表现为个体情感联结弱化,阻碍青年健康成长。

首先,以平衡的强弱关系引导青年形成去功利化的“零糖社交”模式。社会应优化支持结构,通过制度与文化引领搭建弱关系平台;构建多元传播矩阵,以主流媒体塑造健康社交文化,为青年提供心理与文化支撑。其次,学校加强社交主体性培育,重构课程体系、创新活动场景,培育“去功利化”社交意识;最后,家庭通过代际沟通助力青年实现社交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作为青年社交认知的启蒙场域,应通过强化核心关系纽带助力青年健康社交。

在青年成长中,强关系提供引导陪伴,弱关系有利于青年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多元化。二者互补促进个人成长与社会协作融合。

(三) 圈层相互融合, 打破社交壁垒。

人在物质生产实践的辩证运动中,认识到人与社会剥离开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个体的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的终极追求是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我们应当克服社交窄化,摆脱“信息茧房”。

首先,规制治理数字空间,完善第三方监督。强化网络监管,穿透技术黑箱,实施技术审查与内容监测,营造健康网络环境;联合网信部门完善算法伦理审查,抵制不良信息,利用算法推荐多元内容助力青年了解“零糖社交”。其次,构建“校社协同”信息素养教育体系,提升青年信息素养认知能力。学校设置系统化信息课程,提升青年信息鉴别力;学社共建实践基地,设计“信息—认知—行为”三级干预活动,提升青年决策能力。最后,家庭助力青年突破“信息茧房”,构建高质量社交生态。驱动青年兴趣多元化以拓展社交圈层,引导参与多样化兴趣活动;培育青年网络素养,引导科学利用网络资源。

青年社交生态构建需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平衡强弱关系。打破“信息茧房”,促进圈层融合,引导青年正确认识“零糖社交”,打造良性健康社交生态。

四、结语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零糖社交”是顺应发展、贴合实际的社交方式。国家或民族的事业能否代代相传,中国梦能否实现,关键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国际竞争、赢得战略主动,需聚焦青年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激发青年创新实践能力,使其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助力实现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网财经:“零糖”社交、性价比生活,JustSoSoul发布《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EB/OL]. (2023-12-27). <https://finance.china.com.cn/roll/20231227/6066028.shtml>.
- [2]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05.
- [3]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毕竞悦,译[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2.
- [4] Pariser E.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4.

【青少年论坛】

青年群体的媒介实践与心态形塑研究

刘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文章从媒介平台角度入手,分析了青年媒介使用的现状及其背后折射的心态,发现社交媒体的依赖、关注短视频与直播、娱乐与消费深度融合、圈层化与“小众型”亚文化凸显等是青年群体媒介使用的突出表现,青年媒介使用折射出满足感、身份认同感、群体归属感与包容等心态。据此提出,借助媒介平台,做好研判工作,并对青年进行群体画像,探索培育健康、向上的青年社会心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青年;媒介使用;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G206;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6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培养造就规模庞大、素质优良的青年人才队伍,激发青年人才活力,有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及效能、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劲动能。

青年所处的环境日益多变,信息过载、虚假信息显现以及信息茧房现象等对他们的媒介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青年处于关键的心理和社会化发展阶段,对新奇、互动性强的媒介内容表现出更高的需求,这不仅强化了他们高频使用媒介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抖音、小红书等媒介平台的依赖。因此,深入研

究我国青年当前媒介使用的现状、特征,揭示其对青年心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新媒介环境下青年的行为模式,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而且可以为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提供有效策略。

一、当前青年媒介使用现状

作为数字原住民,当代青年从小便浸润在数字化的环境中,与各类数字媒介建立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互动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已成为青年获取信息、进行自我呈现和社交互动的主要渠道。这些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青年提供了专属的个人沉浸式体验,显著影响了他们的社

收稿日期:2025-03-06

基金项目:2025年首都青少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研究课题“数字时代青年婚恋观念的新表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BJSGQT2025026)。

作者简介:刘彦(1991—),女,山东济宁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

会心态、社会交往等。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型传播形式的针对性实时传播方式,影响着青年的社会认知和心态。

受到互联网普及和智能手机广泛应用的影响,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他群体有显著不同。研究发现,他们在媒介接触、内容消费和社会互动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模式,呈现出社交媒体的依赖、短视频与直播成为主流、娱乐与消费深度融合、内容消费的多元化以及媒介使用的圈层化、“小众型”亚文化兴起等特征。

(一) 社交媒体的依赖

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日益增加,社交媒体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交工具的功能范畴,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信作为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之一,整合了社交、支付、新闻、娱乐等多种功能,深度渗透到了青年的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在微信“朋友圈”中,青年通过分享生活点滴、转发新闻和表达观点,构建了虚拟社交网络。QQ 尽管受到微信的挑战,但在更年轻的群体中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二次元文化和校园大学生群体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社交媒体与内容分享的无缝结合进一步加深了其对青年的吸引力。

(二) 短视频与直播成为主流

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简短、形式多样、娱乐性强而广受青年喜爱。这些平台通过丰富的内容类型和强大的社交功能,使得短视频消费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短视频平台的低门槛和强互动性,使得大量青年用户不仅是内容消费者,还是积极的内容生产者。直播作为重要的媒介形式之一,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播带货、教育直播、健身直播等多种形式的直播内容,满足了青年不同的需求。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直播带货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深受青年群体的欢迎。通过直播,青年不仅可以实时观看产品展示,还能与主播互动,享受即时反馈的购物体验。这种实时互动和参与感显著提升了青年群体的消费意愿和品牌忠诚度。

近几年,短视频平台上的相亲直播间悄然兴起,一些“红娘”主播长期在直播间为适婚男女举办线上相亲直播会,成为网友热议的相亲新模式。

据报道,有一相亲直播间热度曾达到总场观众 50 万人次以上。为了尽快“脱单”,越来越多的单身青年选择扎堆直播间相亲。有新闻报道,“小城市里的男青年,涌入相亲直播间”其中也包括农村男青年,甚至“中国的相亲直播间,已经火到日本了”。

(三) 娱乐与消费的深度融合

电商平台如淘宝、拼多多等,通过引入社交元素和娱乐化的购物体验,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模式,使购物行为与社交互动紧密结合,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参与感和消费欲望。特别是小红书等“种草”平台,通过用户生成内容的分享,形成了以信任为基础的消费社区,影响了青年群体的消费判断。

随着数字平台的多样化发展,青年群体的内容消费日趋多元化。B 站(哔哩哔哩)作为以用户生成内容为主的平台,吸引了大量青年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和消费。青年在平台上分享和观看涵盖动漫、游戏、音乐、科技等领域的内容,影响着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这种内容消费模式不仅满足了青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还促进了新兴网络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此外,伴随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知乎、B 站、喜马拉雅等知识分享平台日益受到青年的青睐。这些平台通过问答、在线课程、播客等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满足了青年群体在职业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受到“内卷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上述平台进行终身学习,用以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四) 圈层化与“小众型”亚文化的兴起

在基于不同兴趣形成的青年群体内部,出现了基于特定话题或文化的社群,这些社群通常活跃于特定的应用程序或社交平台上。以二次元文化为例,B 站已成为这一文化圈层的重要聚集地,青年用户通过平台分享和讨论与动漫、游戏相关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亚文化群体。

“谷子”、街舞、嘻哈、滑板、潮牌等亚文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形式迅速传播,吸引了大量青年用户的关注和参与。这些文化现象不仅丰富了青年群体的生活,还通过与主流文化的互动,逐渐在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可与接受。这种小型亚文化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群体对个性

化、自主性和多样化文化的追求。

二、青年媒介使用折射出的心态

包含价值观在内的青年心态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研究方向。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社会心态具有动态性和消极、积极之分,主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情绪体验、社会认知及行为倾向等内容。社会心态可以通过以某种程度的赞成或反对评估特定实体来表达,这种评估实体可以是人们可能想到的从平凡到抽象的事物,包括事物、人、群体和思想等的任何现象。作为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社会心态就像“社会晴雨表”可以反映社会发展与运行的状态,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同时又可反作用于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运作模式。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所反映出的心态是多维度的,主要体现在即时满足感、身份认同感、群体归属感与包容心态等方面。

(一) 即时满足感

在数字时代,青年对即时满足的需求显著增强。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青年能够迅速获得信息和反馈。例如,社交平台上的点赞、评论和消息通知等机制,能够即时给予用户反馈,满足他们对快速奖励的心理需求。这种即时满足感加剧了青年对短小、即时性信息内容的偏好,例如短视频,这导致他们对长篇深入内容的耐性降低。值得关注的是,即时满足感的提升虽然能带来短期的愉悦,但是也可能导致部分青年的注意力分散、深度思考能力的减弱,以及对长期目标的忽视等。

(二) 身份认同感

在社交媒体上,青年通过发布照片、视频和状态更新等方式呈现自我,这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分享,更是探索和认识自我身份的过程。他们通过对在线形象的精心打磨,试图获得他人的认可,从而增强自信和社会归属感。通过社交平台的互动,他们可以构建和呈现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呈现行为虽然有助于增强自信,但也可能带来压力和焦虑,特别是当他们未能获得预期的社会认可时,这种心理需求使得青年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更新自身形象,进而影响他们的真实自我认同和心理健康。

(三) 群体归属感

社交媒体为青年提供了广泛的社交网络平台,

使他们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群体,获得归属感。通过在线互动,如评论、点赞、分享等,青年获得他人的关注、认可与回应,感受到被接纳的温暖和社会支持。这种互动不仅满足了他们的社交需求,还帮助他们在虚拟社区中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接。媒介平台也成为青年拓展社交圈、结识新朋友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维系现有的社会关系,还为他们找到了情感归属。

(四) 包容心态

数字时代,青年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和论坛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些平台让他们能够轻松获取各种不同的视角,突破地域、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限制,形成对多样化观点的开放态度。信息的多样性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还促使他们在面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时,能够更加理性和包容地去理解和接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价值观念塑造的重要工具,通过与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青年的包容心态得以深化,形成更为多元和宽容的价值观念。

青年群体的包容心态还体现在媒介对青年恋爱观等内容的影响上。例如,有研究发现,情感类短视频的内容呈现极具个性化、互动性和体验性强且注重日常分享、提供恋爱技巧指南等特征。情感类短视频对青年用户恋爱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亲密关系更加包容、恋爱动机的非理性化、注重回报、认知与角色分离以及恋爱模式的趋同化等方面。情感类短视频中营造的良好氛围极大程度上促进了青年用户恋爱的欲望,有助于破解当前青年恋爱意愿不强的困境。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积极向上、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个人进步、社会良性运行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青少年的主观感受,其心理状态可以反映社会发展与运行的态势,同时又可以反作用于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运作模式。关注青年群体的心态有助于从群体视角推动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据此,文章以媒介平台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青年的心态表现,发现青年在媒介使用方面,社交媒体的依赖、关注短视频与直播、娱乐与消费深度融合、圈层化与“小众型”亚文化凸显等是

其特征表现。青年媒介使用折射出的心态包括满足感、身份认同感、群体归属感与包容心态等内容。

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现状既反映了当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通过描述分析青年媒介使用折射出的心态表现,有助于在提升青年媒介素养的同时借助媒介这一路径引导其建立积极向上的心态,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

第一,在媒介平台的监管方面,搭建多平台数据采集系统,实时抓取小红书、豆瓣、知乎、抖音等平台的文本、图像及互动数据,采用NLP技术进行语义分析,结合关键词词库和传播模式识别算法,自动标记异常内容,通过情感极性分析、传播路径预测等模型,评估舆情风险等级。特别要关注AI换脸、深度伪造等技术制造的虚假信息,对不健康的信息内容进行实时、定向拦截。第二,在群体服务方面,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数据挖掘与信息整合功能,以媒介平台为依托,对活跃于平台上的青年用户进行群体画像,形成系统性、动态化和可视化的青年心理状态图像,用以呈现青年所思所想,

运用相关的专业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从而获取网络媒介方面的青年心理表现和诉求等内容,有效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干预对策,助力青年心理健康发展。第三,在活动组织方面。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采用心理学等专业领域方法,形成不同的活动方案,特别要打造榜样引领工程,邀请行业先锋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通过“奋斗者说”分享会呈现真实成长历程中的挫折与突破。学校和社区可尝试建立朋辈支持系统,持续提升青年精神素养,助力青年培育健康心理、涵养奋斗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社会精神气质的支撑和动力。青年群体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所思所想所盼又可作用于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运作模式。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有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青春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赵文龙,李知一.教育程度、媒介使用与青年群体社会信任[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3):86-96.
- [2] 胡冰.分裂、反噬与迷失:“玩乐劳动”视角下青年社交媒体使用异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126-135.
- [3] 姚敏,李凌鸥,陈新力.观看短视频对青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22(05):74-82+118.
- [4] 孙伟平,伏志强.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及其治理[J].江海学刊,2024(04):157-163.
- [5] 赵爽.“秋招人”的社交媒体表达与自我呈现——以小红书平台为例[J].全媒体探索,2024(05):146-148.
- [6] 刘桂茹.从审美共享到价值共创:数字媒介场域青年的国潮消费与认同表达[J].理论月刊,2025(05):91-99.
- [7] 刘彦,刘玮.情感类短视频对青年用户恋爱观的影响研究[J].全媒体探索,2024(11):127-129.
- [8] 刘彦,崔英豪.观念何以转移:社交媒体婚恋话题对青年恋爱观的形塑路径研究——以小红书为例[J].青年发展论坛,2025(04):16-27.

Research on Media Practices and Mindset Formation Among Youth Groups

Liu Yan

(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Youth represent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ope of the nation. They are the main

force in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platform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ng people's media usage and the underlying mentality it reflects. It discovers that the reliance on social media, the preference for short videos and live stream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emergence of segmented and "minority-oriented" subcultures, etc., are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young people's media usage. Young people's media usage reflects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identity, group belonging, and inclusiveness.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by leveraging media platforms,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creating group portraits of young people, effective paths should be explored to cultivate a healthy and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among young people.

Key words: youth; media use; social mentality

(上接第 59 页)

The Rheological Logic and Risk Aversion of "Zero-sugar Socialization"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Liu Dayong, Zhu Yue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Abstract: "Zero-sugar socializing" as an emerging social paradig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preferred social choice for modern young people in their fragmented time. With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people have shifted from seeking recognition from others to self-approval. Social relationship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strong relationships" to "weak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methods have evolved from "traditional socializing" to "lightweight socializing". "Zero-sugar socializing" features ease, no pressure, and no complex interests. However, it also has a dual effect. If young people fail to properly "control sugar intake", it will lead to a contraction of their social circle, intensified feelings of loneliness, self-centeredness and narrowed cognition, solid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filter bubbl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rationally analyze its shortcomings, guide young people to engage in healthy socializing, and establish an open and inclusive view of friendship.

Key words: contemporary youth; zero-sugar socialization; lightweight society; strong ties; weak ties; subculture

【青少年论坛】

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型特征、 主要冲突和应对策略

王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数字空间创造了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平台、新场域、新模式、新样态。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时空消弭、虚实融合、数据赋能等新型特征,深刻影响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数字空间,受教育者的能动性制约教育者的权威性,资本的逐利性制约教育的引导性,网络圈层的聚类性制约教育的求同性。因此,教育者应善用议程控制、资本规制、队伍建设等手段,重构话语权威,创新叙事方式,打造教育平台,提升算法素养,全面提升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数字空间;数字技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65-0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数字空间是一个由数字符号构成的虚拟环境,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多种形态。当代青年属于网络原住民,已经将数字空间作为重要栖息地和虚拟生活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青年。由此,思想道德教育需要从物理空间拓展至数字空间。这种拓展不仅是技术媒介的表层嬗变,而且是教育主体性和价值传播规律的深层变革。因此,文章以青年群体为分众化研究对象,从技术嵌入、主体互动、价值传导层面解构数字空间思想道德教育的运行逻辑,探寻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型特征

青年的生活场域由物理空间逐渐延伸至以数据为核心的虚拟空间,作为物理空间的虚拟延伸和外在补充,“数字空间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数字空间呈现三个特征:时空离散、虚实融合、数据赋能。这些特征深刻影响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有助于拓展教育受众范围、丰富教育互动形式、赋能教育效果评价。

(一)教育主体:时空消弭的离场对话

数字空间突破了场域和时间的束缚,创造了青年对话交流的全新平台。处于不同时空的青年均可以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受众。其一,数字空间摆

收稿日期:2025-03-21

基金项目:2022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究”(项目编号:B/2022/02/83)。

作者简介:王平(1984—),男,江苏靖江人,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脱了教育的场域限制。物理空间教育模式主要基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在场对话。然而,物理空间的有效容量限制了互动交流的效率和受教育者的规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数字技术创造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离场对话的条件,构建了无限容量的虚拟教育场域。此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可变成临时性、随机性、瞬时性、非正式性的虚拟存在。这种跨越空间界限的教育模式拓宽了社交圈,改变了物理空间教育模式的稳定型、长久型、正式型等关系,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受众范围。其二,数字空间延长了教育的时间效应。物理空间教育主要发生于共同的时间段或相同的时间维度,具有不可重复读取性。教育者也无法无限次数且原汁原味地重现已经输出的内容。数字空间教育具有历时性、当下性、交叉性和记忆性等特征,完美地解决了教育内容的“重现问题”。数字空间教育包含“输出”和“读取”两个既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的环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相对独立地完成“输出”和“读取”。双方既可以实时同步互动,也可以延时滞后互动,还可以循环重复互动。这种自主可控且重复读取的教育模式覆盖了处于不同时间维度的青年。

(二)教育方式:虚实融合的互动场景

数字空间无缝衔接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交互体验增强了青年的参与感和满足感。其一,互动的实时性和自主性。实时性和自主性是数字空间互动的首要特征,也是数字赋权的典型表现之一。数字空间允许青年利用文字、语音和视频等方式实时评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教育情境,以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二,互动的多元性和融合性。数字空间提供评论、点击、滑动、拖拽、面部识别、语音控制、手势挥舞、眼部跳动、指纹读取、腿部跳跃等多种互动方式。这些互动方式不仅丰富了青年的体验,而且融合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此,现实世界的动作控制虚拟世界的行为,能让青年获得近乎真实的感官体验。其三,互动的精准性和兼容性。主观偏执和个体差异一直是困扰物理空间教育的痛点。数字空间利用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技术,根据青年的兴趣和偏好,精准推送思想道德教育产品,有效权衡“统一标准”和“个案关照”的关系,提高青年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此外,数字空间具有跨平台兼容性。青年可以

随时登录不同设备和平台,并且保持一致的交互体验。这种跨平台兼容性保证青年随时随地接入数字空间,享受便捷的教育服务。

(三)教育评价:数据赋能的集成显示

教育效果评价是物理空间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最大痛点之一。物理空间教育效果评价往往存在标准单一、主观偏差、知识考核、结果导向等现实问题。数字空间是信息科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集成展示平台,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层次和精准化数据处理能力,可以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评价。其一,有效提升处理速度。数字空间依托先进的计算架构和分布式存储技术,能够快速处理收集、整理和分析网络购物数据、社交行为数据、信息浏览数据和科研实验数据。数据来源更加多维化、立体化和个性化,更有现实说服力。因此,数字空间成为处理大规模数据集的集合平台,有力支撑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精准化发展。其二,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数字空间运用复杂的数据分析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回溯并分析历史数据,从海量数据中提取高价值信息,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帮助教育者优化教育内容和形式,支持政府和学校科学决策,促进思想道德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三,全面优化效果评价。数字空间通过实时分析和预测数据,自动完成数据清洗、模型训练等繁琐的决策支持任务,帮助教育者评价思想道德教育效果。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降低了教育评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冲突

受制于权力、资本、技术、认知等各种因素,数字空间的运行机制与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着一些矛盾,阻碍教育者和青年的良性互动。在主体层面,青年的能动性制约教育者的权威性;在过程层面,资本的逐利性制约教育的引导性;在目标层面,网络圈层的聚类性制约教育的求同性。总而言之,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面临主体变革、价值异化、过程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一)教育主体:权威性和能动性的冲突

在物理空间思想道德教育中,教育者的权威具有“科层制传播”的特征。教育者往往基于自身权威,实施“单方向的话语传达”。从本质上看,教育者的权威是一种权力输出机制,通过控制和规范语

言的方式主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和教育情境。随着数字技术、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的普及,数字空间逐渐崛起并成为塑造教育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层制传播”变为“扁平式传播”。数字空间的每个青年都是主体性存在,不再受限于单一视角和话语权威。数字赋权激活和放大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赋予青年影响思想道德教育过程的权利,丰富了教育议题的讨论角度和内容。青年可以通过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功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创设丰富和多样的话语环境,引发更多讨论和思考。这不仅保证教育议题贴近青年的需求和兴趣,而且提高了话语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然而,这种数字赋权却挑战了教育者的权威,模糊了教育者和青年的角色定位。教育者由“中心”走向“多元”,教育者和青年的角色时常互换。此外,数字空间主体还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普通公民等。他们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数字空间话语网络,基于不同角度和立场输出和读取各类信息,面向青年呈现丰富、多元的观点。这种无节制的主观能动性挑战教育者的权威性,不利于塑造符合国家需求的主流话语。

(二)教育过程:引导性和逐利性的冲突

思想道德教育重在引导主流价值,打造良好社会秩序,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思想道德教育遵循一定的叙事框架和语言规范,把传达内容作为核心目标,重视故事讲述、逻辑说理、知识灌输、体系构建。这种规范性促使思想道德教育呈现特定的风格和形式,突出内容的严密性和系统性。然而,这种规范性也限制思想道德教育的多样性和创新性,降低教育内容吸引流量的能力。资本逻辑是一种经济体系运行逻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通过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来驱动经济活动。按照现代商业逻辑,关注度(流量)和利润回报具有正向关联性。因此,流量是资本变现和增值的密码,争夺流量就是争夺利润。受资本逻辑的驱动,数字空间被异化为控制工具和商业机构,主动迎合和塑造市场需求,竞相争夺关注度和点击率,打造收割流量的利器,注重流量积累和传播效果。受垄断资本青睐的平台占据流量端口,挤压弱势平台的生存空间。这种现象严重影响数字空间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忽视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总而言之,在奉行资本逻辑的数字空间,伦理判断、

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并不是必要环节。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导性与资本的逐利性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三)教育目标:求同性和聚类性的冲突

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是被社会广泛认同的观点、价值观和理论。思想道德教育遵循求同性逻辑,力图消除“个性”,努力实现“共性”,铸牢个体和群体共同认可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逻辑容易忽略青年的主观体验和内在意义,阻碍差异化和个性化表达,忽视其他异质性声音和猎奇性观点。数字空间则打着“尊重个体需求,促进差异表达”的旗号,走聚类的路线,寻找并强化差异,追求“异、新、奇、特、快”。简而言之,聚类就是利用算法推荐、聚类分析、过滤气泡等技术把青年自动划分成子集的过程。聚类行为是一种反权威和去中心化的行动逻辑,遵循“先求异、再求同”的技术模式。算法推荐、聚类分析、过滤气泡等技术根据青年的偏好构筑信息茧房。青年根据兴趣、观念、身份、立场等属性形成话语集群。在此,算法推荐、聚类分析、过滤气泡等技术成为青年逃离思想道德教育的精准保护伞,强化他们的片面性认知,不断加剧青年群体之间情感隔膜、价值缺失、行为固化,持续压缩对话和妥协的空间。聚类现象导致思想道德教育难以调动不同类型的青年。不同集群围绕同一话题开展激烈争辩,缺乏有效的认知融通,甚至逐渐走向对立和极化。

三、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应对策略

数字空间是新时代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最大增量,具有交互性、高效性、精准性、离场性等显著优势。教育者应充分利用数字空间的技术优势,完善监管机制,培养运营队伍,搭建教育平台,开发育人产品,健全投入机制,促进平等交流,丰富教育形式,实施精准思政,实现全程评价,全面提高数字空间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主体之维:重构话语权威

在重构教育权威之前,必须厘清教育权威的意涵。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并不等同于教育者的权威,虽然二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但并非完全一致。重构教育权威并不是赋予教育者不可置疑的权力。实际上,数字空间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一种虚拟存在。交互性和权力逻辑是消解思想道德教育权威的内在因素。为了克服这个内在矛盾,教育者和

青年需要在不同的层面协调互动,平衡数字空间互动关系,推动数字权力再分配。其一,教育者享有议程设置权。议程设置权是掌控爱国主义教育流程的核心环节,是重构教育权威的关键点。思想道德教育一般遵循“议程设置—话语生成—信息传播—交流反馈”的运行机制。教育者不需要全流程操控思想道德教育进程,重在控制信息源头和进程起点——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可以塑造青年群体的关注焦点,设定青年群体的关注范围。教育者应实时关注教育进程,以内容供给影响青年群体的态度,以理性话语分析社会现象、现实困惑和思想症结等。其二,青年享有自主控制权。按照主体间性理论,受教育者也享有主体地位。思想道德教育需要有效引导青年的主观能动性。青年有权控制学习进度,加入学习共同体,提出合理疑问。教育者需要根据青年的需要,传授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组织课程实践活动。

(二)组织之维:创新叙事方式

若缺乏有效约束,无节制的资本扩张可能演变为一种反噬性力量,形成新型“数字殖民”的风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有关主体需从制度构建与教育引导两方面协同发力。其一,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针对数字空间动态演进、边界模糊等特点,系统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立法空白并解决滞后问题,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加快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推动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促进信息互联互通与执法协作,从而提升数字空间治理效能。其二,开发数字空间育人产品。海德格尔曾指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因此,技术应用需注重人文导向。教育者要主动运用新技术、新平台,创新思想道德教育的话语表达与呈现方式;通过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生动展现历史事件、英雄事迹与红色文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育资源的个性化推送,增强内容适配性与用户参与感。

(三)技术之维:打造教育平台

精准性与技术逻辑的合谋正不断挤压思想道德教育的传统作用场域。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关主体需采取系统化策略,以价值逻辑引导和规范技术应用,遏制算法技术的无序扩张。同时,应积极借

助数字技术构建形态多元、内容充实的网络教育平台,有意识地运用算法突破信息茧房和圈层隔阂,增强青年群体的参与感与体验深度。各类网络教育平台也应依托数字化手段,面向青年提供优质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与服务。其一,创新展示方式。教育平台应综合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体手段,生动呈现国家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发展成就及未来愿景;可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构建融文字、图像、音视频于一体的沉浸式育人场景,从而提升青年对历史与文化的感知度和认同度。其二,融合线上线下。线上平台可完善红色教育资源的获取、观看与分享功能,定期开展主题教育与知识竞赛,有效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怀。线下层面可通过组织实地参观、红色研学等实践项目,引导青年切身感受红色文化的感染力。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互补,形成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与覆盖面。

(四)人才之维:提升算法素养

数字空间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取决于现实中人的素养与能动性。因此,政府、学校与企业要构建协同发力的人才支撑体系,打造一支兼具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与稳定性的数字育人队伍,涵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与平台运营等关键角色,同步提升青年群体的算法素养。其一,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路径。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投入,为专业人才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培养提供有力保障。学校教育要将理论课程与实践项目深度融合,着力强化未来从业者的数字技术驾驭能力。企业可通过提供实习实训岗位等方式,助力人才积累实战经验,缩短能力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差距。其二,确立有效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政府、学校与企业应共同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并配套以精神荣誉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多元激励措施。例如,设立专项奖金、授予荣誉称号、提供优抚待遇等,吸引更多广泛的社会力量投身于此。其三,着力提升青年群体的算法素养。算法素养教育应贯穿青年教育的全过程。教育者不仅需传授算法的基础原理与运作逻辑,还要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实践应用能力,使青年能够理解、审视并合理运用算法。通过构建多方协同、广泛参与的算法治理生态,共同营造健康、向善的算法文化环境。

(下转第73页)

【青少年论坛】

消费文化权力运作下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的生成机理与消弭路径

滕国鹏 谢登涵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是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青年不惜以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为代价,该现象的出现是消费主义对人异化的结果,来实现虚假的精致人设与展示消费。青年这种非理性的“伪精致”消费现象是对隐藏在背后的文化符号意义的刻意追随,其实质上是消费文化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和对青年的操纵。只有不断推动青年消费的主体意识觉醒,促使其以理性思考限制对精致的消费欲望,强化媒介传播的有效监管以净化网络消费文化生态等,才能使青年更好地摆脱消费文化权力的操纵,真正破解青年“伪精致”困境。

关键词:青年;消费文化权力;“伪精致”;消弭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5;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69-0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经济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政府宏观层面的引导与调控,同时需要激发以内循环为主的居民消费活力,可以说当今消费已超越了基本生存需求满足的话语范畴,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和经济牵引的重要发展力量。与此同时,在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袭下,中国消费社会各种复杂而艰巨的挑战接踵而至,消费异化问题变得格外突出,而“伪精致”的消费现象则是青年消费异化问题的典型代表,部分青年误将个体身份与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努力维系的“伪精致”生活假象却使得自己陷入了物质窘迫、精神匮乏的陷阱。从本质上来说,青年这种“伪精

致”的消费现象是一种错乱的、非理性的消费文化现象。因此,对青年这一消费现象进行深入探究,能够更好地把握青年消费心理,从而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助力青年个体健康发展与国家整体消费格局的再造。

一、消费文化权力下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的内涵阐释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精致”一词既可以用来形容物品的美观,也能用来形容人注重生活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穷”字的基础意思为“缺乏财物,处境恶劣”等,在现实中通常指生活贫困,经济实力较弱。消费主义浪潮的到来使得“精致”与

收稿日期:2025-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虚拟社区感启动下青年网络利他行为的持续演进与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2BSH027)阶段性研究成果;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网络过激言论对辽宁公众社会心态影响及风险预防研究”(项目编号:2025lslybwzkt-039)。

作者简介:滕国鹏(1978—),男,辽宁丹东人,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谢登涵(2001—),女,山东济宁人,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穷”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在当前青年的消费观念中形成了某种因果关联,生成了“伪精致”的青年消费样态。由于这种消费现象超越了个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后面所谓的“精致”也就成了虚假呈现,其伪装的特点尽显。在此将部分青年过度追求精致享受,通过刻意营造外在表象来模仿高品质生活状态,却在经济资本持续透支状态下维持“虚假精致”的行为称之为“伪精致”。当前,随着社会消费信贷与信用体系的推广与普及,加上我国传统社会“面子”消费的文化基因作用,中国社会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全方位刺激下孕育出了一套崭新的“消费准则”,将“人们的消费心理彻底转变为无限模式”,青年群体的消费在追赶潮流中逐渐发生异化,“伪精致”正是当前青年消费异化的一种综合表现。然而这种消费现象却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共谋的产物,在广告和社交媒体的造势下,青年在阶层流动的消费中自以为找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完成圈层构建的方式,实质上却沦为了消费主义编码的符号载体。

二、消费文化权力运作下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的主要表现

(一) 视觉包装:“精致人设”追求下的形象粉饰

“于中国人而言,面子是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本,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个人形象,成为人们竞相争取的符号资本,这在消费活动中亦是如此。”面子作为传统儒家文化中“耻感取向”的外化表现,通过“伪精致”消费成为青年展示自我形象、寻求社会认同的可视化表达。而作为面子追求衍生的符号产物——人设的打造,则在可视媒体的传播下沦为了消费的对象。受社交媒体中各类网红、博主精致人设消费景观的影响,“伪精致”青年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和视频将限量版奢侈品、网红打卡酒店以及小众时尚潮牌展示出来,以塑造其“精致人设”。从根本上来看,“伪精致”消费现象的出现是商品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控制着整个现代性社会的运行机制,“并内化为‘物化意识’来左右每一个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青年所精心构建的“精致人设”,不过是消费文化权力在现代消费社会运作的虚幻粉饰。

(二) 个性展演:自我意识膨胀下的品位重塑

21世纪人类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前工业文明时代地缘与

宗法的束缚正在为个体松绑,催生着青年对个体独特性表达的强烈诉求。而品味,这一带有社会阶层划分意味、能够在无形中输出独特形象信号的标签,似乎成为青年通过消费来展示其“精致”品位的重要选择。从实践来看,秉持“父辈的不讲究到我辈的不将就”理念,很多青年正通过“精致消费”展开一场从身体到行为,最终是独特风格的全方位个性化装扮。“伪精致”青年宁愿每月“吃土”也要“剁手”拿下能够显示“自我品位”的商品,从根本上来看,这是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义借助文化权力对青年意识操纵的自然结果,“消费即自我”“品味即身份”等扭曲的价值观念使得很多青年混淆了消费品位与社会地位、消费能力与自我价值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虚假的精致舞台上,“青年看似拥有着高品位商品堆砌起来的‘体面人生’,实际上却是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钱包‘四大皆空’的‘吃土’青年”。

(三) 生活虚演:消费符号操纵下的仪式追求

“仪式的出现是为了建立一定的秩序,如思维体系、等级、角色等,随着现代社会对‘自我’以及相关概念的强调,仪式感似乎更符合个人内在的情感需要。”而消费主义思潮通过资本逻辑不断将传统仪式解构为可量化的景观堆砌,尤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不确定性风险的蔓延,“使正处于自我意识觉醒、迫切寻求社会地位的青年焦虑情绪滋长,其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青年发现对未来的憧憬与自我身份的确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时,“精致消费”的伪装恰好为其提供了实现身份认同的方式。他们通过一系列旨在表达象征意义的话语、表象来构建自身的仪式性行为,而这种由表象所构建的符号形象一旦建立起来则需要青年源源不断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予以维持,至此,“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了符号操纵”。青年“伪精致”表象下的仪式化追求,“既缺乏了传统仪式活动的集体效仿和社会认同意味,更不能表征当代青年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延承”,其本质上是一种由消费符号操纵的“生活虚演”与“拜物教仪式”。

三、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中消费文化权力的隐形运作机制

(一) 符号象征:消费文化权力的表达方式

人类社会的符号构筑所蕴含的人为性与意识形态性使得商品符号化的过程演变为一场权力的

运作。在消费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下,个体追求的“精致”与阶层身份地位与消费绑定在一起,青年只有购买带有符号象征意义的物品才能明确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某种自我身份认同。因此,当下青年所渴望的“精致”实际上是商业与文化资本为迎合市场需求而精心打造的符号幻象,各种具有文化符号性的商品在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下不仅被编码为个体阶层身份的“视觉简历”,更是通过算法推荐、场景植入等方式将青年由“消费决策者”变为了“符号展演工具人”。另外,高度商业化的时代又为文化权力符号化运行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青年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愈发受到文化符号的深刻影响。在消费文化权力日益模糊真实与虚拟界限,尤其在抽象文化符号异化着青年消费观点和自我表达的今天,青年看似能够通过消费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却极易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文化权力操控的符号消费陷阱。

(二)广告与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权力运作的工具载体

大众消费时代,广告与大众传媒的功能不再单纯局限于信息传递、社会历史记录以及文化见证,而是深刻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其中扮演着权力控制者的角色。广告和大众传媒本身所具有强视觉效果以及隐喻特征使其成为消费社会文化权力意向的主要表达载体。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那样,“后现代社会中媒介已变成拟真的工具,从而为符号象征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当下,文化权力主体借助广告和大众传媒,通过具有强烈意向性的隐喻手段操纵着文化内容的生产,以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话语左右着青年的消费选择,致使消费观尚未成熟的青年群体更容易成为文化权力控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广告和大众传媒的单向传播与扩散使得青年在消费社会中逐渐失去了理性思维能力,而这为文化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软性暴力创造了可能的空间。部分青年在文化权力操纵下的广告和传媒中逐渐迷失自我,沦为消费文化权力运作的牺牲品。

(三)青年认同:消费文化权力运作的心理基础

文化权力要想实现对他人的真正控制,就需要赢得主体在心理上的认同。因此,消费文化权力“若想使消费者从被动地接受转化为主动的认同,就不能忽略他们在心理上的积极响应”,这对于青年来说尤其重要。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权力通

过把握青年消费心理,以一系列“口号宣传”培养青年对消费生活的默认和无意识认同,而这种认同是消费文化权力在青年群体运作中稳固的心理根基。在文化权力的运作下,青年无形地接受消费主义传达的价值观,实现着消费文化对青年的心理渗透。同时,其还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来制造“信息茧房”,使青年在同质化的内容中不断强化既有认知,进而逐渐丧失对消费主义逻辑的批判性反思,从而实现青年心理认同的隐性控制。在“伪精致”消费热潮带给青年狂欢的背后,消费文化权力的运作和实施已经深入到了无法被察觉的地步,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消费文化权力构建下的“自愿”参与者。

(四)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权力运作的终极动力

消费在资本增殖中的作用决定了资本逻辑必然要求鼓励和倡导消费。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其通过符号生产和意识形态渗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与人们的价值重构,将消费从单纯的经济行为转化为文化权力的实践场域;同时又借助社交媒体等方式向人们传达着商品符号堆砌是获取群体优势地位的重要方式这一价值理念,青年为了实现旧圈层的区隔与新圈层的融合往往会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符号差异,从而不断生成新的消费欲望,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社会中“物”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了人际关系层面。总的来说,青年“伪精致”消费欲望的生成是资本逻辑对文化领域的殖民结果,在资本的运作下,“仪式感”“个性化”等消费主义话语诱导着青年对符号价值的盲目追随并使其获得心理满足,最终难免会陷入消费主义牢牢捆绑且缺乏批判意识的困境之中。

四、青年“伪精致”消费现象的消弭路径

(一)以自我意识觉醒形塑青年消费素养

在当下,以自我意识觉醒形塑青年消费素养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消费观念、抵御消费主义侵蚀的重要路径。消费主义依托全球化态势,借助广告与大众传媒不断以精心设计的隐喻和煽动性话语刺激着青年的无意识消费欲望,在“伪精致”消费中,青年的消费理性在一次次看似获得群体认同与优势地位的消费中被麻痹,进而逐渐失去自我反思意识。而唤醒消费者的自觉意识,就意味着要促使青年深刻反思消费的本质,摆脱盲目追求物质符号所带来的虚假认同,使青年消费者认识到个人作为消

费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培育其健康向上的消费心态,引导其对消费符号进行祛魅解码,精准识别资本创造的“需求幻象”,自觉回归到商品本身的功能性、实用性以及与个人真实需求上来,形塑青年消费素养,做自我消费的主人。

(二)以强化媒介传播监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

现代媒介技术具有“流量至上”和“逐利本性”的工具理性,其所营造的精致生活幻象让青年错误地认为消费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需求性的活动,而是凸显阶层身份、获取圈层认同的方式。然而,这种基于媒介营造的错觉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实现路径,因此,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对大众媒介的传播监管,不断净化网络消费文化生态。相关部门及时建立健全媒介传播监管体系,加强对各类网络平台内容的审核力度,杜绝不良信息对青年价值观的侵蚀。与此同时,现代媒介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创新价值引领路径,将理性消费的价值观念融入社会消费文化生产体系,在符号解码中培育健康消费认知,于圈层互动中提升媒介素养,不断提高青年的消费意识和辨别能力。

(三)以加强理性思考合理建构“精致”欲望

在消费主义逻辑视域下,“精致”被物化为一种消费,而消费主义正抓住人们对“精致”的无限

渴求炮制出了“伪精致”这一虚假命题,它通过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的策略,麻痹着青年的思想与行动,使其在消费主义所营造的刺激快感与虚幻仪式面前逐渐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所应秉持的自由意志与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当代青年应重新审视自己的“精致”追求,以加强理性思考合理建构“精致”欲望。这就要求青年应摒弃将“精致”简单等同于高消费、高档次商品堆砌的错误观念,转而从精神与物质、内在与外在辩证统一的高度出发,将“精致”欲望锚定于个人兴趣培养、知识拓展、技能提升、文化熏陶等维度,使消费成为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在消费浪潮中保持清醒与自主,真正掌控消费主动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致人生。

“伪精致”消费行为,作为当代青年在复杂社会语境中为自我身份表达所选择的一种特殊方式,深刻映射出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生活态度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的变迁,然而在这背后也体现着青年消费价值观念偏轨的问题。伴随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青年作为肩负着理性引领消费文化潮流重任的新一代消费主力,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认知和坚定的态度,在多元消费文化的浪潮中坚守自我,做推动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郭晓琳,林德荣.中国本土消费者的面子意识与消费行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11):63-71.
- [2] 徐先艳.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表现、成因及引导[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02):62-69.
- [3] 吴灵莉.大学生“伪精致”现象的表现、成因及其应对[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3,15(05):54-58+98.
- [4] 林江,李梦晗.“精致”人设的自我呈现:青年超前消费问题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03):61-67+75.
- [5] 刘威,温暖.从“快乐水”到“社交货币”——Z世代新式茶饮消费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2(06):92-100.
- [6] 敖成兵.“伪精致”青年的视觉包装、伪饰缘由及隐形焦虑[J].中国青年研究,2020(06):75-82.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Elimination Path of Youth's "Pseudo-Exquisite" Consumption Phenomenon under the Operatio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Power

Teng Guopeng, Xie Dengh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ning, Dalian 116024)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seudo-refined" consumption among young people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ist ideology.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ar a significant economic burden in order to engage in this behavi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the alienation of individuals caused by consumerism. To achieve the false and refined image and showcase consumption.

The irrational "pseudo-refined" consumption phenomenon among young people is a deliberate pursuit of the cultural symbolic meaning hidden behind it. In essence, it is the operatio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young people. Only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young people's consumption, restricting their refined consumption desires with rational thinking,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media dissemination to purify the network consumption culture ecology, etc., can young people better escape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power and truly solve the "pseudo-refined" predicament of young people.

Key words: youth; consumer culture power; "pseudo-refinement"; elimination paths

(上接第 68 页)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石立春. 青年数字极简主义的媒介抵抗及其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2024(12):88-94.
- [3] 美团研究院. 从数字生活到数字社会:中国数字经济年度观察 202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1.
- [4] 阎国华,闫晨. 权衡与超越: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审思[J]. 思想教育研究,2023(04):17-23.
- [5] 周海宁. 论互联网时代受众者的数字化生存能力[J]. 出版发行研究,2018(12):23-28+11.
- [6]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2022-05-01(001).
- [7] [德]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

The Emerging Characteristics, Core Conflicts, and Corresponding Coping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for Youth in the Digital Era

Wang Ping

(Changzhou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Abstract: The digital space has provided a novel platform, domain, model, and form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youth. This form of education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exhibits emerg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transcendence of time and space,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dimensions, and data-driven empowerment, all of which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Within the digital realm, the autonomy of learners challenges the authority of educators, the profit-oriented nature of capital constrains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clustering dynamics of online communities limit the pursuit of educational homogeneity. Therefore, educators must effectively utilize strategies such as agenda setting, capital regulation, and team development to reconstruct discursive authority, innovate narrative approaches, establish educational platforms, enhance algorithmic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relevance, effectiveness, and modernity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in digital contexts.

Key words: digital space; digital technology; youth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法律与社会】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吴科谕 高金龙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与关键。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具有全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于乡村产业改造升级、乡村人才提质优化、乡村产业形态创新以及乡村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为破解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培养引进困难、产业结构单一以及生态资源开发困难等现实困境。文章从新质生产力赋能完善科技创新布局,加强数字设施建设;培育数字专业人才,夯实农村智力基础;发挥创新驱动作用,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完善监管激励机制,强化资源统筹配置方面,以期乡村产业发展更好更扎实迈入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产业振兴;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74-05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企业在产业组织中发挥着主体作用,生产力则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在强调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的语境中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并全面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和基本内涵,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为加快科技创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战略指导。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动力。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

(一)技术逻辑: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改造升级

在乡村产业改造升级进程中,新质生产力通过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教育学会在校研究生课题立项“新质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5KXJYSS82)。

作者简介:吴科谕(1998—),女,贵州毕节人,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高金龙(1966—),男,江西临川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技术融合路径,推动传统农耕体系向现代智能农业体系的跨越式演进。这一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领域深度耦合,孕育出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创新生产范式。智能感知设备、数据决策系统及自动化执行装置的协同应用,实现了资源投入的精准化调控,在提升作物产量的同时优化品质指标。其二,生物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基因工程、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催生种业革命,为粮食安全战略实施和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构建技术屏障。技术创新重构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突破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型特征,形成知识驱动、技术赋能的新型生产体系。这种变革不仅带来单位投入产出效率的显著提升,更根本性地改变了产业发展逻辑:从依赖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化发展,从单纯追求产量增长转向品质与效益并重的发展模式。当前全球农业正处于第三次绿色革命与数字化革命的交汇期,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集群与生物技术呈现加速融合态势。

(二)人才逻辑: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人才提质优化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对劳动者提出更高要求,既需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质,也需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这一要求促使乡村地区增加教育投入,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借助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继续教育等重要形式,培养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乡村人才提质优化的核心在于人才结构的优化调整。传统农业对人才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方面,对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要求相对不高。而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现代农业,则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需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具备经营管理能力与市场营销能力。人才需求出现的这种变化,推动乡村人才队伍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单一农业生产型人才朝着多元化、复合型人才的方向转变。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改变了乡村人才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数字化手段以及智能化手段的应用,提高了乡村工作的吸引力,也提升了乡村工作的舒适度,为人才留乡、人才返乡创造出更优良的条件。此外,新质生产力要求构建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等重要方式培养出的应用型人才既拥有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同样不可或缺,政策倾斜、资金支持、平台搭建等措施能够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三)要素逻辑: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产业形态创新

传统农业对生产要素的依赖集中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传统类型,新质生产力则不同,其引入数据、技术、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促使生产要素实现重新配置与优化组合。数据要素的融入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借助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气候变化、土壤状况等信息可被精准掌握,这些信息为农业生产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新质生产力促使农业产业形态发生转变,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逐步过渡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态农业、休闲农业、数字农业都属于新兴农业产业形态。这些新业态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拓展了农业的功能与价值。以休闲农业为例,将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相融合,造就了新的价值增长点;数字农业则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

产业要素的重新配置还体现在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提升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链突破生产环节限制,向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拓展,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的开展,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再到“卖服务”的转变。

(四)价值逻辑:新质生产力富含绿色产业理念追求

新质生产力天然蕴含绿色发展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与乡村产业振兴所需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呈现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绿色化发展路径,依托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达成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的协同统一。在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助推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农业模式兴起,促使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实现协调共进。借助精准农业、节水灌溉、生物防治等技术手段,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用量,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受新质生产力驱动,乡

村产业发展模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产品的绿色化,推进了产业的生态化。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助力乡村实现蓝天白云、促进乡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还尝试推动乡村通过建设美丽家园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城乡数字鸿沟加剧

尽管我国农村的网络和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基站分布不均、信号不稳定以及带宽不足等问题,农村地区5G网络、光纤宽带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率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一差距对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新业态的发展形成制约。农业物联网、传感器设备等智能化设备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范围同样较窄,系统性的数字化改造尚未全面铺开,大部分农村地区依旧沿用传统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工具与管理系统的普及水平偏低。

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城市地区已迈入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快速阶段,农村地区却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始时期,二者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数字技术应用存在较高门槛,既需要相应设备投入,也需要技术支持。农村地区经济条件与技术条件相对薄弱,难以承担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昂成本。这种差距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限制了农村电商、数字服务等新业态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还体现在配套服务的欠缺上。数字化设备的维护、升级及技术支持等服务,在农村地区供给相对不足,导致已投入使用的数字化设备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平台尚未建立,各类数字化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交互与共享,形成“数据孤岛”现象。这一现象也使得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难以充分展现。

(二)乡村人才培养引进困难,数字人才结构失衡

乡村人才短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农村地区优秀人才流失现象突出,大量高素质人才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出现人才空心化状况。青年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群体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谋求就业与发展,这使得农村地区面临人才断层的风险。现有农村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能水平不高,同样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不少农民长期习惯于传统生产方式,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接受程度较低,操作能力也较为有限,在数字化素养与现代农业技能方面存在明显欠缺。

乡村数字人才结构失衡问题表现得尤为显著。既熟悉农业领域又通晓技术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在农村地区供给严重不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既具备农业专业知识,又掌握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人才,但这类人才在农村地区极为少见。农村地区的教育培训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存在脱节,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完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人才培养渠道力量相对薄弱,无法为农村地区输送足够数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农村地区在人才引进机制方面,同样存在诸多不足。农村地区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方面相对落后,职业发展空间较为狭窄,难以对优秀人才形成吸引力。人才引进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与保障措施。

(三)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失衡,产业融合发展受限

目前,我国多数农村地区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农村产业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单一化特征,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产业结构单一不仅会削弱抗风险能力,还会压缩新质生产力的应用空间。多数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产业重心依旧停留在原材料生产环节,深加工与精深加工环节存在明显缺失。这导致农产品附加值处于较低水平,完整产业链条难以构建。

产业融合发展受到限制,是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又一突出问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缺乏系统性统筹规划,政策支持力度亦显不足。各产业之间缺乏内在有机联系,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的形成面临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载体与平台建设同样滞后,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区等产业发展

平台数量不足、建设水平有限,无法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不少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对政府投入与政策支持存在较强依赖,市场机制应有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程度同样偏低。农产品质量标准、生产技术标准等行业标准体系不完善,制约农产品质量提升与竞争力增强。品牌建设步伐缓慢,农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竞争中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

(四)乡村生态资源开发困难,体制机制保障缺位

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农村地区生态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存在矛盾,农村生态环境需要得到保护,以避免过度开发引发生态破坏,生态资源也需得到合理利用,用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如何在保护过程中进行开发,在开发过程中落实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缺乏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其经济价值难以充分彰显。体制机制保障的缺失,是制约生态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然而对应的生态补偿未能到位,这降低了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也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的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同样存在缺陷,统一的生态产品认证、定价、交易等机制尚未建立,导致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难以有效呈现。资源开发的技术支撑不足,形成另一重要制约。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相应技术作为支撑,但农村地区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相对匮乏。专业的技术服务机构与人才队伍的短缺,也对生态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科技创新布局,加强数字设施建设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需加快步伐,5G网络、光纤宽带、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的工作应统筹开展,

确保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达到城市同等标准。农业物联网、传感器网络等智能化设施的建设同样需加快,为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提供技术支撑。农业大数据平台也应建立完善,实现农业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传输、分析与应用。

数字化服务体系属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完善搭建十分必要,可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服务。这类服务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农业生产指导、市场信息服务、技术培训等。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农村地区的合作也需加强,应着手建设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与示范园区,推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需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技术推广网络应建立完善,确保先进技术能及时传至农村地区。

同时,应当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乡村信息服务平台,要加快乡村地区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拓展平台服务功能,增加除信息发布之外的其他功能,如在线咨询、疑难问题诊断、专家远程指导及农产品追溯等服务功能,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互动平台。

(二)培育数字专业人才,夯实农村智力基础

农民是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探索者,所以要把强化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置于优先位置,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强化职业教育,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职业学校,目标是培养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依托各类培训项目,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其专业技能。数字化技能培训应作为重点推进,以此提高农民的数字化素养。

另外,要搭建完善的人才评价体系,对农村优秀人才应给予相应荣誉与奖励。加大针对农村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项目申报、资金支持、平台建设等方面应体现倾斜,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与机会。产学研合作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要加强与农村地区的合作,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派遣专家学者至农村提供指导,也可选派优秀的农村人才至高校进修,通过这些方式提升农村人才的专业水平。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建立起较为庞大且人数可观的农村人才库,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与人才支撑。

(三)发挥创新驱动作用,推动产业融合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同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市场化机制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商平台等市场载体。要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金融支持体系建设也是关键环节。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包括农业保险、农业担保、农业贷款等各类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发展,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产业融合发展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第一是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拓展农业功能。第二是政府部门要设立“数字乡村技术创新专项基金”,重点扶持农机智能化、农业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研究开发,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与农村企业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四)完善监管激励机制,强化资源统筹配置

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支撑,特别是在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要实现创新与规范的有机统一。

从监管理论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适应。对此,要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对新兴业态实行分类监管,既要防范风险,又要留足发展空间;建立监管沙盒制度,为新技术、新业态提供试验场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试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营造诚信经营环境。

激励机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激励理论,要建立多元化的激励体系,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完善财政支持政策,设立乡村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创新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降低创新成本。

从资源配置理论出发,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空间保障;建立项目统筹机制,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部门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参 考 文 献

- [1]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02).
-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3] 何劲松. 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 山西农经,2025(12):51-54.
- [4] 李佳展,农梦玲,刘永贤.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探索[J]. 辽宁农业科学,2025(03):75-79.
- [5] 肖晓. 智慧农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挑战与路径[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5,28(03):70-76.
- [6] 傅羚哲,章力丹.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产业现代化影响研究[J]. 当代农村财经,2025(07):16-21.

(下转第83页)

【法律与社会】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中的生态转型路径研究

吴卓雅 汪晓莺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设人民城市,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规划。基于人民对绿色的需求,为解决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生态转型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数字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协同多方共治力量,巩固生态治理成效;营建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从而实现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生态转型的成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生态转型;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79-05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满足,还要求政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富裕。近年来,部分城市因过于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人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破坏,影响了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严重的甚至还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谋划,满足了人民对绿色生活的需求。由此,研究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实践路径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现代化中的人民绿色需求

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预计达68%,新增城市人口对市政园林、地产景观的需求持续释放,人民

对城市绿色需求不断凸显,主要体现在健康需求、消费需求以及生态公共服务需求方面。

第一,人民的绿色需求体现在健康需求方面。一方面,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量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进入城市,出现热岛效应、水质下降以及大量的工厂噪声等现象,对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城市居民还因环境污染问题感染疾病,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因此,人民对清洁的空气、安全的水源等需求不断显现,要求城市绿色化发展来帮助清新空气、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噪声污染,以获得舒适的宜居环境。另一方面,民众的绿色健康需求除了身体物质方面还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绿色空间是城市居民进行休闲娱乐、社交聚会的重要场所。“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其重要的体现。世界

收稿日期:2025-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明发展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1XKS033);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江西生态文化价值的公众践行研究”(项目编号:21SKJD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卓雅(2002—),女,河南信阳人,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汪晓莺(1965—),女,江西抚州人,东华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而是一种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功能的良好状态”。随着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化,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需要寻求精神上的休憩,对市政园林、地产景观的绿色需求增加,以此缓解心理压力促进心理健康。

第二,人民的绿色需求还体现在消费领域。受新发展理念、“双碳”理念的引领,越来越多的居民追求绿色可持续消费,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购买高污染产品,偏向于购买绿色有机蔬菜、有机水果等绿色有机产品,把绿色消费理念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部分居民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溢价。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62.2万辆,同比增长27.86%,创历史同期新高。

第三,人民的绿色需求体现在生态公共服务需求方面。生态环境是人民进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满足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居民环境意识提升,人民对公共服务的绿色诉求日益凸显,要求建设具有清洁环境基础保障以及基础环境卫生保障的公共绿色服务体系。除此之外,人民更呼吁系统性、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民众要求建设发展型公共服务体系,获取生态知识,以保障代际公平与长远的生态安全。

二、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困境

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虽然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民的绿色需求不断显现有助于推动城市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但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同城市现代化中所存在的特殊性问题相结合,从而找到城市现代化生态转型所存在的城市产业绿色发展动能不足、城市绿色治理机制不健全、城市绿色空间碎片化的梗阻。

(一)城市产业绿色发展动能不足,转型升级速度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担当大国责任,积极投身并引领全球低碳转型浪潮。同时,城市产业也不断由传统产业向绿色化产业进行转变,加速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但仍存在转型速度慢,绿色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第一,传统产业惯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初期,大部分城市被以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所占据。经济体系的构建与传

统产业制造业的发展相关联,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传统产业对城市经济建设的影响。此外,传统产业基数大,转型速度慢。企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向绿色低碳产业转型所需的投资成本高,风险大。第二,市场动力不足。中国绿色消费发展较晚,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绿色生产和绿色供给存在短板,致使绿色产品并不具有充分市场价格优势。并且消费者可能因绿色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尚未完全形成,而寻求具有替代性的其他产品,使绿色产品难以在市场上立足。第三,科技创新支撑性不足。在科学技术为重要竞争力的国际局势下,我国的绿色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部分领域的绿色科技创新人才短缺、数字化赋能融合度较低等都是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绿色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主体单一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但在城市绿色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中,仍存在一些绿色治理难点。

一方面,部门协同治理面临部分挑战与政策颁布的滞后性。城市绿色治理需要进行体系化的构建,涉及生态环境、规划、住建、交通、能源等多个部门,但现行体制下部分部门间存在权责不清、利益竞争的问题,缺乏统一的协调部门,需进一步释放政策压力,推动城市绿色治理体系纵向推进。此外,城市现代化绿色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产生了新的实际问题,而原本的城市绿色治理机制已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政府在部分领域存在“唱独角戏”的现象。第一,市场激励不足。绿色治理成本高、回报周期长,而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覆盖范围有限,企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低,市场作用未完全释放。第二,绿色科技支撑不足。企业对绿色科技的研发力度不够,拥有的原创性绿色科技少,对城市现代化绿色治理提供的支持力度低,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居民参与渠道窄。信息公开渠道少、范围窄,比如环境质量公报、空气质量公报、项目审批公示等,主要刊登在政府门户网站上,消息扩散面窄,城市居民知情权保障不足,易出现“政府拍板、公众旁观”的现象。

(三)城市绿色空间碎片化,生物多样性缺失

城市绿色空间的系统布局,对城市转型发展、城市生态韧性恢复和人居环境改善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不少城市正逐步推进建设城市“绿心”,扩大城市绿色面积,但还有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仍呈现出碎片化现象,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缺失。

第一,城市扩张的空间挤压。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覆被不断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扩张易挤占生态空间造成生态用地退化,导致自然生境被切割为孤立斑块。比如城市交通路网、住宅区以及无序扩张的城市建设用地将森林、湿地分割成“生态孤岛”。第二,缺乏整体规划与协调。城市规划中对生态网络的重视度不足,不同部门规划缺乏协调,导致绿地布局零散,连接性差。同时,各部门的数据标准不一,平台割裂,缺乏有效整合与共享机制,形成数据孤岛,导致城市规划中缺乏系统性协调,易出现城市绿色空间碎片化的现象。第三,历史的局限性。受传统“重建设、轻保护、轻生态”观念的影响,城市规划过程中忽视了生态空间的成片化保护,大量的楼房和道路等不透水面的建设,使城市原本残留的生态空间变得破碎化。尽管有的城市在对土地占有后,又重新恢复土地原本的面貌,但在这一过程中,该区域的生态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土地生态承载力较原来相比呈现下降趋势,碎片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

三、城市现代化生态转型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城市现代化生态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要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就要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协同多方共治力量、营造城市生态空间以推进城市现代化的生态转型。

(一) 坚持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的城市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城市理念,正是其现代化的重要写照。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理念,满足人民的绿色需求。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党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实际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相结合的又一个理论创新,是党对群众路线在

城市发展中的灵活运用。因此,拥护党的领导紧跟党的指引就是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第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方面,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民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建设与治理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的科学总结和创新。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要想更好地坚持人民城市理念,就要在城市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把这个理念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以满足人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绿色需求,构建城市“绿心”的生态宜居城市。

(二)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数字化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要想进一步释放城市发展活力,加快推进城市现代化的绿色生态转型发展,就要紧跟时代,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第一,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对于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使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并严格执行环保、能耗、水耗等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低碳产业培训,增强政策支持,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绿色转型能力。第二,培育新兴产业和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氢能、储能等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第三产业服务业进行结构升级。发展金融科技、文化创意、智慧物流等现代服务业,降低对传统商贸、房地产等行业的依赖。第三,数字化赋能。数字技术驱动城市产业绿色转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建立产业数据平台,促进数据流通,挖掘数据价值;通过数字技术形成数字产业集聚,提升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连通性,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示范和方案,有效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以促进城市绿色生态转型。

(三) 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社会全面动员、企业积极行动、全民广泛参与是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转变的重要推动

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出台,倡导全民参与,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

第一,政策激励与监管。政府应制定城市绿色转型过程中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专项法规,明确各行业减排目标与责任;对绿色技术研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给予税收减免、补贴支持,以激励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同时,加强城市绿色碳排放监管。要求重点企业公开碳排放数据,对超标排放企业实施惩戒。第二,企业积极行动。企业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利用资源突破城市绿色生态转型原创性技术缺陷,以技术驱动绿色生产,推动城市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减排;树立榜样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低碳技术培训、资金支持,构建绿色产业生态,防止企业把绿色科学技术“锁进柜子里”。第三,民众共同参与。民众对绿色低碳理念的践行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出行方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家居选择方面优先选择节能家居等,减少碳排放,以促进城市“双碳”目标的实现;同时,行使居民权利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监督和倡导。

(四) 协同多方共治力量,巩固生态治理成效

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核心要义包括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本质上看,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多治理主体与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

第一,构建多元参与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多元参与的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履责、公众参与为基本框架,通过制度创新和利益共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治理共同体。第二,搭建协同治理平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出现,信息化资源成为城市绿色治理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数字化协同治理平台整合,数据与决策资源,

多方共享信息,以打破部门壁垒,从而激活共治网络;构建开放化协同治理平台,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提高民众认同感,促进民众参与城市绿色治理;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平台,拓宽纵向治理体系,上下级多区域主体协同治理,破解“治理孤岛”的困境。第三,形成多元化评价主体。政府自评,定期发布生态治理白皮书,公开政策目标与完成情况,引入第三方评估,委托高校、科研机构或国际组织开展独立评价,增强公信力;同时,增强民众参与。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投票等方式收集民意,将“公众满意度”纳入考核,实施多元主体评价,避免了单一化评价,以促进城市生态转型,巩固治理成效。

(五) 营建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因此,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统筹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第一,构建“生态+”的产业融合体系。构建“生态+旅游”“互联网+生态”等产业融合发展范式,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实现从“生态负债”向“绿色资产”的价值跃迁。比如安徽淮南“九大矿山”改造为“楚汉文化公园”,通过种植乡土树种吸引松鼠、啄木鸟等动物,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第二,营造社区生态空间。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增加立体绿化、屋顶花园、种植灌木丛等,为鸟类、昆虫提供食物和庇护所,提升生物多样性;构建连接社区、公园、学校的生态步道,使城市生态空间相互连接。第三,构建生态空间线形长廊。通过线形廊道将城市中分散孤立的各类生态斑块联系起来,打破生态空间“碎片化”的状态。

参 考 文 献

- [1] 吴亚楠. 2025年中国城市绿化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EB/OL]. (2025-06-04) [2025-07-19] <https://www.chinairn.com/scfx/20250604/085639745.shtml>
- [2]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62.2万辆同比增长27.86%[N]. 人民日报,2025-07-20(1).
- [3] 孙豪,龙燕妮,毛中根. 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科学内涵、发展逻辑与推进路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2):37-52.
- [4] 施晓辉,梁坤宇. 基于生态供需与土地变化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2025,32(05):423-434.

[5] 辛璐璐. 数字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12): 96-100.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ath in Chinese-style Urban Modernization

Wu Zhuoya, Wang Xiaoying

(Donghu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ople's demand for greennes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tyle urban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urban concept, build an eco-friendly and livable city; optimize th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gr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practic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concept, and promot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collaborate with multiple governance forces to consolidate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create urban ecological spaces and enhance urban biodiversity, thereby achieving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uccess of China-style urb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urban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transition; practical path

(上接第 78 页)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

Wu Keyu, Gao Jinlong

(Donghu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seudo-refined" consumption among young people occu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ist ideology. Young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ar a considerable economic burde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 by consumerism, aiming to realize a false refined image and showcase consumption. This irrational "pseudo-refined" consumption phenomenon of young people is a deliberate pursuit of the cultural symbolic meaning hidden behind it. In essence, it is the operation of consumer culture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young people. Only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young people's consumption, restricting their refined consumption desires with rational thinking,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media dissemination to purif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online consumption culture, etc., can young people better escape the manipulation of consumer culture power and truly solve the predicament of "pseudo-refined" consumption among young peopl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practical path

【法律与社会】

基于期望确认理论的文化遗产景区 游客满意度实证研究

张慧路荣

(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7)

摘要: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和智慧文旅背景下,游客满意度成为衡量景区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文化遗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期望确认理论构建“服务质量—期望确认—满意/忠诚”分析框架,结合 SERVQUAL 五维度开展测度。选取秦始皇兵马俑作为案例,利用携程平台近6个月在线评论(N=163),通过文本清洗、情感分析和 SERVQUAL 映射,采用 Logit 回归与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研究提出智慧化响应体系建设、全龄友好化服务提升及互动传播优化路径。

关键词:文化景区;期望确认理论;SERVQUAL 模型;游客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5)03-84-05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受到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化遗产融入人民群众生活。在“智慧文旅”和“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文旅产业质量。因此,文化遗产景区不仅是旅游消费场所,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

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广泛应用,文化遗产景区的展陈效果与参观体验得到显著提升。如秦始皇兵马俑景区推进“数字兵马俑”建设,利用AR/VR技术强化沉浸感。然而,随着游客需求多样化与接待压力增加,文化遗产景区面临“整体游

客满意度高,但细节短板突出”的矛盾。服务质量不足导致游客期望与实际体验间产生落差,这一期望确认过程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并进一步作用于推荐与再访意愿。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理论或主观问卷,缺乏将 SERVQUAL 模型与期望确认理论结合并利用在线评论数据进行系统实证检验。

学术界在服务质量与游客满意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Parasuraman 等提出的 SERVQUAL 模型,从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个维度刻画服务质量;Bhattacharjee 的期望确认理论(ECT)揭示了“体验—期望比较—游客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的逻辑链条,并被广泛验证。近年来,学者尝试将在线评论大数据应用于旅游研究,发现其能更真实地反映游客体验。但结合 SERVQUAL 与 ECT 开展系统实证研究的文化遗产景区研究仍

收稿日期:2025-03-18

基金项目:2025年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西安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LW8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慧(1981—),女,甘肃天水人,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

路荣(1973—),女,河北巨鹿人,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服务。

较少。

基于此,文章以西安文化遗产景区为研究范围,构建“服务质量—期望确认—满意/忠诚”分析框架,并选取秦始皇兵马俑作为典型案例,利用携程平台近6个月的评论数据,结合文本分析与Logit回归,检验各维度对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改进路径,以期为西安及同类城市文化遗产景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西安文化遗产景区游客满意度现状分析

近年来,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智慧文旅”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下,文化遗产景区游客满意度整体较高。综合文旅部门公开信息、行业研究及相关报道可见:游客普遍对世界遗产地的文化呈现和解读给予肯定,但在客流高峰秩序管理、票务及信息服务,以及面向儿童、老年人和境外游客等特殊群体的人性化服务方面仍有不足,整体呈现出“总体满意—细节不足”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有形性与参观体验的矛盾

兵马俑等景区的展陈效果和数字化体验大幅提升了游客的文化感知。然而,节假日高峰期排队时间过长、现场拥挤,影响参观舒适度与效率。有形性优势与秩序管理不足之间的反差,易引发游客期望落差。

(二)响应性服务不足

部分景区在分时预约、客服响应和特殊证件购票等方面尚不完善,难以满足游客对高效便捷服务的需求。研究指出,响应性缺陷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

(三)移情性服务缺位

无障碍设施、亲子服务及多语种信息服务在部分场景下不够完备,特殊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削弱了人性化关怀感受。

(四)保证性优势与互动传播不足

权威讲解和文化内容的可信度是西安文化遗产景区的重要优势。但如果传播仍以单向灌输为主、互动性不足,难以激发参与感。研究表明,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对游客满意度和口碑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总体来看,西安文化遗产景区的游客满意度基础良好,但在响应性与移情性方面存在短板,需要

通过数字化和管理创新进一步优化。

二、实证分析

为深入揭示“服务质量—期望确认—游客满意度”机制,研究以秦始皇兵马俑为案例,利用在线评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西安文化遗产景区为研究范围,选择秦始皇兵马俑作为典型案例。数据来自携程平台近6个月的游客在线评论,经过去重、剔除无效信息后,得到有效样本 $N = 163$ 。每条评论都保留评分、正文及互动信息用于分析。研究表明,相较传统问卷,在线评论能更真实反映游客体验与情感。

(二)变量与测量

自变量(SERVQUAL 五维):评论文本通过“自动识别+人工复核”流程映射至有形性(TAN)、可靠性(REL)、响应性(RES)、保证性(ASS)、移情性(EMP)。预处理包括去重、分词、停用词清理和同义词归并,对置信度低的样本进行人工复核。

中介变量(期望确认,ECT):基于语义线索识别“达到/超出预期”与“低于预期”等表达,形成期望确认指标。

因变量:游客满意度使用 SnowNLP 情感分析,积极=1,中性/消极=0。持续使用意愿根据评论中是否出现“推荐”“再来”等构造二元变量;否定表达记为0。

控制变量:包括评论字数、是否有官方回复等。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构建“服务质量—期望确认—满意/忠诚”分析框架。五个 SERVQUAL 维度(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为自变量,期望确认为中介变量,游客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为因变量。

研究方法分为三步:第一步文本清洗与标准化;第二步基于 SnowNLP 情感分析和关键词识别进行 SERVQUAL 维度映射;第三步使用 Logit 模型检验各维度对游客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并引入期望确认检验中介效应。模型拟合度通过 $LR \chi^2$ 和 McFadden's Pseudo R^2 评估,Bootstrap 5000 次重抽计算 95% 置信区间, Sobel 检验作参照。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兵马俑景区游客整体游客满意度较高。163 条评论平均评分 4.89(满分 5),标准差 0.35,集中在高分区间。情感分析显示:积极评论

占 92.0%, 中性评论占 2.5%, 消极评论占 5.5%, 负面体验主要涉及人流拥挤和票务问题。平均评论字数为 371 字, 显示游客愿意详细记录体验, 数据具有较高代表性。

这一分布与相关研究一致, 即整体游客满意度高, 但负面体验集中于秩序管理和人文关怀环节。

(五) SERVQUAL 五维度表现分析

基于文本归类结果, 兵马俑景区在各维度上的表现存在差异(表 1, 图 1)。

有形性: 游客普遍提及“震撼”“展陈效果好”等词汇, 显示景区在展陈方式和数字化呈现方面表现突出。

保证性: 评论中频繁出现“讲解权威”“可信度高”等表述, 说明景区在文化传播与知识解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响应性: 不少负面评论集中在“票务预约复杂”“购票排队时间过长”等问题上, 表明景区在服务效率与问题处理方面仍存在不足。

移情性: 部分游客提到“亲子不便”“无障碍不足”等问题, 显示景区在满足特殊群体需求和提供人性化服务方面存在短板。

可靠性: 该维度整体表现中性。游客对景区信息的可靠性已有普遍认同, 因此该维度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相对有限。

表 1 SERVQUAL 五维典型评论归类

维度	关键词/主题	典型评论摘录
有形性 TAN	“震撼” “展陈效果好”	“现场比照片更震撼, AR 体验沉浸感强”
可靠性 REL	“讲解内容可信”	“讲解专业, 信息准确, 不夸张”
响应性 RES	“排队时间长”	“电话永远打不通, 购票排队太久”
保证性 ASS	“权威”“专业”	“讲解很权威, 有官方 背书, 值得信赖”
移情性 EMP	“亲子不便” “无障碍不足”	“小朋友和老人都 不太方便, 服务还需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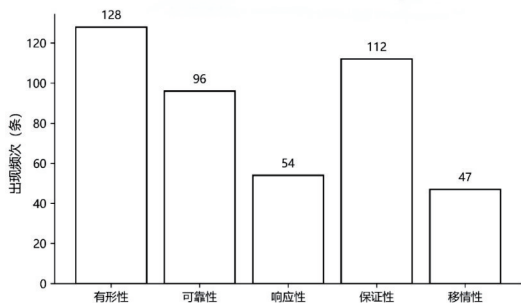


图 1 SERVQUAL 五维评论频次对比

这一结果与黄晨等关于“文化遗产旅游体验质量与游客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发现相呼应。

(六) 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 SERVQUAL 五个维度、期望确认、游客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 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因变量分别设定为游客满意度(1 = 积极, 0 = 中性/消极)和持续使用意愿(1 = 评论中出现“推荐”或“再来”, 0 = 未出现)。自变量为 SERVQUAL 五个维度, 中介变量为期望确认。

1. 回归结果

有形性和保证性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beta = 0.42, p < 0.01$; $\beta = 0.36, p < 0.01$); 响应性和移情性显著负向影响游客满意度($\beta = -0.28, p < 0.05$; $\beta = -0.25, p < 0.05$); 可靠性影响不显著($\beta = 0.08, p > 0.10$)。游客满意度对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55, p < 0.01$)。模型整体拟合良好(LR χ^2 显著, Pseudo R^2 中等水平), 表明游客满意度在推动推荐和再访意愿中起关键作用。

2. 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 结果表明, 期望确认在“有形性→游客满意度”(间接效应 = 0.16, 95% CI [0.07, 0.28])和“保证性→游客满意度”(间接效应 = 0.13, 95% CI [0.05, 0.23])路径上呈部分中介; 在“响应性/移情性→游客满意度”路径上未见显著中介。这表明期望确认是连接游客感知与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桥梁。

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了两方面分析: (1) 有序 Logit: 将游客满意度设为有序变量(1 = 消极, 2 = 中性, 3 = 积极)重新估计, 方向与显著性保持一致。(2) 情境分组: 按节假日高峰/平日分组估计, 高峰期对“响应性、移情性”更敏感, 平日对“有形性、保证性”的正向感知更突出, 趋势与主模型一致。

4. 结果解释

综上, 有形性和保证性是驱动游客满意度的核心因素, 期望确认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响应性和移情性则是主要短板。游客满意度显著影响游客的推荐与再访意愿, 验证了 ECT 逻辑链条, 并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结果表明, 提升服务质量与期望确认水平可有效增强游客忠诚度和再访动机。

表2 游客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游客满意度(β)	模型2:持续使用意愿(β)
有形性(TAN)	0.42 * * (0.006)	0.12 (0.278)
可靠性(REL)	0.08 (0.412)	0.05 (0.533)
响应性(RES)	-0.28 * (0.032)	-0.10(0.296)
保证性(ASS)	0.36 * * (0.004)	0.08 (0.367)
移情性(EMP)	-0.25 * (0.041)	-0.12(0.218)
期望确认(ECT)	0.18 * * (0.007)	0.10 (0.215)
游客满意度	—	0.55 * * (0.001)
控制变量(官方回复、评论字数)	已控制	已控制
LR χ	52.36 * * *	47.28 * * *
McFadden's Pseudo R	0.312	0.288
样本量(N)	163	163

(七)期望确认与游客满意度关系

在整体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期望确认在“服务质量—游客满意度”链条中的作用机制。其一,从语义分析与定性发现,当游客体验超出预期时,常出现“超出预期”“值得推荐”等表述,期望确认提升游客满意度;而“拥挤”“不便”等负面词汇反映期望未达标,引发不满。其二,定量分析与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期望确认在有形性和保证性对游客满意度的作用中,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8%和33%,强化了展陈与讲解权威性对游客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其三,期望确认的双向作用方面,在优势维度,期望确认放大正面体验;在短板维度,一旦体验低于预期,则加剧负面情绪,解释了少数强烈负面评价的产生。最终,期望确认结果印证了ECT理论逻辑,也提示景区应强化优势维度,同时通过动态反馈机制降低负面落差,优化整体体验。本研究通过整合SERVQUAL模型与期望确认理论,并引入UGC数据分析,拓展了文化遗产场景下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研究的理论边界与方法工具。

三、优化路径

研究实证表明,西安文化遗产景区整体游客满意度较高,但仍存在“响应性不足”和“移情性短板”等问题,尤其在票务预约、客服响应、无障碍设施、亲子体验等环节表现突出。有形性与保证性是提升游客满意度的核心优势,其中震撼的展陈效果和权威的文化解读最受游客认可。同时,期望确认

在服务质量与游客满意度之间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既能放大服务优势,也会加剧短板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文化遗产景区应以“巩固优势、补齐短板、持续改进”为总体目标,提升游客体验和忠诚度。

(一)以数据驱动构建动态反馈机制(期望确认)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期望确认在“有形性→游客满意度”和“保证性→游客满意度”的路径中作用显著(间接效应为0.16和0.13)。这表明当游客体验超出预期时,游客满意度显著提升。因此,景区需建立数据驱动的动态反馈机制,将在线评论、问卷调查、现场观察等数据整合为统一平台,通过AI情感分析技术实时监测游客满意度变化,识别服务短板。管理者应依据分析结果快速调整策略,形成“数据收集—诊断分析—即时改进”的闭环管理,使期望确认转化为可操作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实现服务质量持续优化和精细化管理。

(二)建设智慧化服务体系(响应性)

回归分析显示,响应性不足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beta = -0.28, p < 0.05$),负面评论集中在票务预约、排队、客服响应等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景区应依托智慧化手段优化响应速度。一是建设多渠道分时预约系统,合理分流客流,缓解节假日拥堵;二是引入AI智能客服,实现票务、咨询、投诉等需求的实时响应;三是通过大数据预测客流,提前调配人力和设备,建立“预测—响应—改进”的服务链条。智慧化系统可有效解决“慢响应、长等待”的问题,显著提升游客即时体验。

(三)推进全龄友好的人文关怀(移情性)

移情性不足是游客满意度下降的重要因素($\beta = -0.25, p < 0.05$),评论中频繁出现“无障碍不便”“亲子体验不足”等词汇。为此,景区应推进全龄友好化建设。一方面,完善无障碍通道和辅助设施,保障老年人和残障游客的顺畅体验;另一方面,增设亲子互动项目,并在关键区域加强安全提示和设施配备。同时,提供多语种讲解和导览服务,满足境外及多元文化背景游客需求。通过强化人文关怀,不仅能减少负面体验,还能增强游客的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四)巩固展陈与讲解核心优势(有形性和保证性)

回归结果表明,有形性和保证性是游客满意度的核心驱动力($\beta = 0.42$ 和 $\beta = 0.36, p < 0.01$)。震

撼的展陈效果与权威的讲解内容是景区最大的优势。景区应在保持高标准展陈和专业讲解的基础上,引入 AR/VR 等技术,将传统“静态展陈”升级为“沉浸体验”。通过互动传播与场景化叙事,使游客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激发深层次文化体验,进一步巩固并扩大景区核心竞争力。

(五) 推动多主体协同,形成服务质量共治格局

仅依靠景区自身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多

主体协作形成长效机制。景区管理方应承担日常服务和持续改进责任;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推动智慧化和人文关怀建设;高校与科研机构可开展第三方评估与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社会组织 and 志愿者则在秩序维护、文化解说和特殊群体服务中发挥作用。通过“政府引导—景区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建立服务质量长效改进机制,避免陷入“运动式整改—问题复发”的循环,实现文化遗产景区的持续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 国务院网站发布.
- [2] 习近平. 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EB/OL]. 2024-04-16. 《求是》发表新华社稿.
- [3] 文化和旅游部.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EB/OL]. 2021-06-03. 政策附件全文.
- [4] 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R/OL]. 2021-02-04.
- [5] 科技部等六部门. 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8-13. 国务院公报发布.

An Empirical Study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Scenic Areas Based on th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Zhang Hui, Lu Rong

(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7)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smart tourism, tourist satisfa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scenic spots.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heritage scenic spots in Xi'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it constructs an "Service Quality -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 Satisfaction/Loyalt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nducts measurement using the SERVQUAL five dimensions. Taking the Terracotta Army of Emperor Qinshihuang as a case, using nearly 6 months of online comments from the Ctrip platform (N=163), through text cleaning, sentiment analysis, and SERVQUAL mapping, Logit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s are adopted. The study proposes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response systems, improvement of age-friendly services, and optimization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scenic area;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SERVQUAL model; tourist satisfaction